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

民主德国的 政治与变革

[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 著

秦刚 蔡子民 田国良 译

春秋出版社

D751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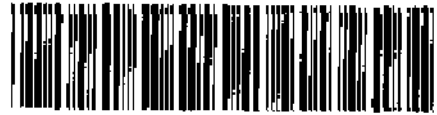
72286

D686/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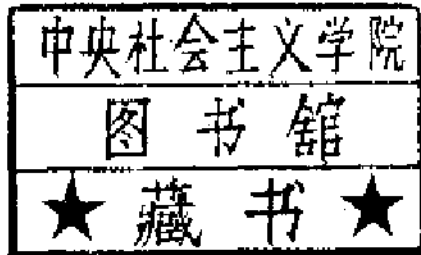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

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

[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 著
秦刚 蔡子民 田国良 译



200053510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Politics and Change in East Germany:
An Evalua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评估)
C·Bradley Scharf
Westview Press, Inc. 1984

民主德国的政治与变革

[美]C·布雷德利·沙尔夫 著
秦刚 蔡子民 田国良 译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25印张 190千字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500 册

ISBN 7-5069-0069-6/D·24

定价：2.50 元

出版说明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活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有九个春秋了。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的日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总体方案。政治体制改革将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纵深发展。科学地总结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有的实践经验，及时了解、正确回答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给以理论的说明，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责任。为配合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科学理论研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向前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

本丛书将系统介绍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与历史沿革，研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律，并介绍其他国家可资借鉴的政治理论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

我们有志于编好出好这套丛书，但限于条件和水平，缺点失误在所难免，热切盼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批评和帮助。

《丛书》编委会

春秋出版社

1987年11月

前 言

写这本东德政治与社会入门书，我有三点考虑。

第一，我想为英语读者提供一本容易理解的研究论著。西德人对他们的东方邻邦还会有许多高明的见解，然而，关于“德国问题”——（绝对反常的）德国的分裂，已有的译本反映出难免的成见。西德作者往往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物质成就落后和政治自由水平低下，这也许表现出他们对自己联邦共和国的昔日与未来有某种无把握之感。与他们不同，我看待民主德国，是根据它的自身条件，并把它作为德国人民断续的政治历史上的又一篇章来考察它的存在。从很多方面看，民主德国是异常的现象，但联邦德国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第二，我认为，比较基准体系有助于对民主德国的理解。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民主德国有其独到之处，但它的许多问题和变化过程又是其他国家共有的。有些论题，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关国家进行比较，是非常有益的；而另外一些论题，比之于西欧、斯堪的纳维亚还有北美国家，同样是很有意义的。除了一些具体的图表以外，本书还一直采用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比较政治科学概念。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研究共产主义制度需要完全独立的分析语言。在我看来，民主德国的政治，作为一定的普遍政治现象之特殊表现，是最易理解的。

第三，本书是由探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族特性这样一个回归主题串联在一起的。寻求这一目标，要求我们抛弃同共产主义欧洲冷战冲突的学术残余。30多年来，人类悲剧的回忆，西方的醒悟，使那一区域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印象一直不能被遗忘。如

今，大多数学者承认了极权主义模式的缺点，特别是它那极度的宣传习惯，使抽象事物具体化和夸张化的倾向，以及它不能识别不同的体制或说明单一体制中的变化。但是在学者圈子以外，早期的印象难以消失。尤其就东德的情况来说，西方人最不愿意放弃肤浅的“极权主义”之说。

比较宽宏的和比较现实的观点承认，现存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至少是四组影响力的复合体。首先，民主德国的人民是德意志人，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既是德国历史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它的背离。其次，民主德国几乎完全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它的内外政策受到严峻的遏制，而且它往往成为东西方对抗的对象和牺牲品。再次，民主德国具有适应熟练劳动和技术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同时，原材料和能源又短缺，所以它高度依赖于对外贸易。持久的经济增长计划，便成为一项严峻而又变化莫测的任务。最后，从各方面来说，民主德国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先进的城市工业社会。这一社会变化，引起了同西方许多国家十分类似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城市犯罪、家庭结构脆弱和对社会不平等的宽容度降低。

德国文化、苏联霸权、经济遏制、社会变化，所有这些因素汇集一起，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日益重要的政治实体。测定各种因素的重要性，评价民主德国人民和政治领袖使这些因素兼容并存的方式，是这本小书的大任务。

1969年我在柏林学习期间，这本书的很多工作就已经开始。我感激几年来给予我指导的许许多多的同事。我特别要感谢阿瑟·M·汉哈特、小哈特密特·齐默尔曼和杰罗·诺格鲍尔的鼓励和令人难忘的帮助。我要向使我顺利完成手稿的西雅图大学表示谢意。十分感谢鲁思·特雷斯尔的艰辛的打字工作，更要感谢我友好忠实的批评家安·沙尔夫。

C·布雷德利·沙尔夫

目 录

前 言

一、民主德国的过去和未来	(1)
1. 复杂的根源.....	(2)
2. 苏联的渗透.....	(7)
3.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11)
4. 社会变革的生态问题.....	(15)
5. 民族特性的范围.....	(19)
二、有指导的民主：人民与政府	(21)
1. 马克思列宁主义.....	(22)
2. 对民主的认识.....	(23)
3. 各阶级合作主义和政治代表制.....	(25)
4. 单一议会制政府.....	(28)
5. 国务委员会.....	(30)
6. 部长会议.....	(31)
7. 地方政府.....	(35)
8. 社会主义国家.....	(37)
三、有指导的民主：党的作用	(40)
1. 关于统一社会党领先地位的两种观点.....	(41)
2. 党员的吸收.....	(44)
3. 基层党组织.....	(46)
4. 党的领导组织.....	(48)
5. 中央委员会.....	(55)

6. 政治局	(58)
7. 政治局与决策过程	(59)
8. 党和国家一体化网络	(62)
9. 小结	(66)
四、经济政策	(68)
1. 中央计划过程	(69)
2. 企业及其领导人	(71)
3. 结构性经济问题	(73)
4. 环境方面的难题	(81)
5. 全面经济变革	(83)
6. 经济实绩	(86)
7. 80年代经济展望	(97)
8. 结论	(99)
五、社会政策	(102)
1. 工资政策	(103)
2. 社会基金原则	(108)
3. 消费和生活水平	(124)
六、一体化过程	(132)
1. 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准则	(133)
2. 儿童社会化	(135)
3. 大众传播媒介	(137)
4. 文学和艺术	(139)
5. 有计划的社会一体化的各种危险	(140)
6. 共同计划 共同工作 共同管理	(143)
7. 参与层序	(152)
8. 一体化与选择	(154)
七、社会政治差别	(156)
1. 合作社农民	(156)
2. 工人和职员	(158)

3. 知识分子	(163)
4. 干部	(165)
5. 社会精英	(167)
6. 各阶层社会地位综述	(170)
7. 宗教界	(171)
8. 持不同政见者	(177)
八、 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	(184)
1. 历史背景	(184)
2. 社会主义外交政策	(188)
3. 华沙条约组织	(190)
4. 经济互助委员会	(192)
5. 其它一体化措施	(196)
6. 联邦德国和西柏林	(198)
7. 欧洲中立国家	(206)
8. 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本	(207)
9. 中东和北非	(209)
10. 第三世界独立国家	(210)
11. 贫困的非洲	(211)
12. 小结	(212)
九、 结论	(215)
1. 社会进步和民族特性	(217)
2. 今日东德的特性	(220)

一、民主德国的过去和未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第三帝国崩溃、欧洲相继分裂为敌对势力范围的产物。民主德国长期被西方视为仅仅是“苏联的占领区”，它经受了外交孤立、经济歧视和政治渗透。它容纳着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西方的挑战表现出忧惧重重。由于国家安全的脆弱，民主德国对公民权利也实行严格的限制。

东德人从西德购买消费品，看西德电视，谴责资本主义，并羡慕西德的显赫和物质成就。他们还从苏联买进原材料，轻视俄国文化，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以敬畏混杂之情看待苏联的力量。

东德的领导者，不论是在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内，还是在一个与其相关的政治或社会组织里，都支持“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发展中的、建立在现有经济和社会平等水平之上的参与管理形式。由于经济和财力有限，军事上依赖于苏联，社会对官方目标的信任不足，对国家合法性不能广泛接受，造成政策上的局限，对此东德领导者同样也有切身的感受。他们也许比知识大众更能深刻地感到来自东西方的牵引，昔日灾难的压抑，永恒未来的激励在消失。

共产党统治的履历上不是没有辉煌之点。尽管存在许多不利的条件，但如今的民主德国，以其高水平的工农业现代化，稳步提高的生活水平，广泛的进步社会政策以及在世界事务中的积极作用，而引以自豪。然而，目前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这些成就现在还不能看作是巨大超群的，尽力解决相互冲突的社会目的和民族特性的观念，还是当务之急。

1. 复杂的根源

多变的民族特性问题，是十分普遍的，大国小国，富国贫国，都受其影响。无论什么地方，历史只要把形形色色的文化揉合到一起，问题就会产生，如北美、苏联以及许许多多欠发达的国家。这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先前统一、现已陷入分裂的地方，如爱尔兰、朝鲜和德国。在上述每一个国家，探求民族特性都有自己的情况。社会伤害的程度不同，个人灾难的范围不同，情况就有差异。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象民主德国那样境况紧张，并深刻地牵涉着世界事务。

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源头来说，民主德国的历史既可以起自雅尔塔和波茨坦同盟国会议(1945年2月和8月)，战后占领区边界是那时划定的，又可以从194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正式建立算起。至于民主德国的历史学者，他们则强调脱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历史，脱离纳粹主义专制政治。西方历史学者，采用相似的习惯作法，描写现在的民主德国好象根本没有历史，并常常有言外之意，好象它的存在是异常的或非法的。两种观点均言而未中。

这个国家和今天组成民主德国的人民确实有着自己的过去，它不能被部分地肯定或否定。如同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德国经受了社会剧变、战争和政治动荡。但是，德国作为一个可辨认的统一体，走过了动乱，存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的一些领土曾经不同程度地被分离过。但德国的历史区域一直包括以中心德国而长久闻名的地区，现在已认定为民主德国。

1000多年以来，形形色色的主权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大致上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罗斯托克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及萨克森早期公爵领地、普鲁士大多数王国。现在的民主德国一度也是霍亨索伦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

主要中心区。在非常实在的意义上，那些城市、城堡、教堂和阵亡将士纪念碑，都是作为昔日政权的遗迹而存在，尽管它们在现代历史著作中可能被一掠而过。

德国文化更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在古老德国的疆域内，文化传播是不难的。因而，以特定的地域来鉴定文化不是容易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不可分割的德国文化，包括巴伐利亚贵族艺术、汉堡企业家的商业精神和特利尔最著名的卡尔·马克思的激进哲学，不独是当代联邦德国特有的遗产，民主德国人民对此也有继承权。

今天，去民主德国观光的人可以访问莱比锡大学，它是在第一批清教徒到达新英格兰的200年以前创立的。这样一些古老而又著名的学校，是世代杰出人民的标志，德国文化和许多的西方文化塑造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又推进了这些文化的发展。因为这里是巴赫、李·瓦格纳、马丁·路德、俾斯麦、亚历山大·亨伯特和麦克斯·韦伯的故土。民主德国的文化历史包含了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朽贡献，更不用说在神学、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成就。精英人物和一般民众理解这种历史的态度，在明确现时目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有现代政府都存在一个培养爱国精神的中心任务。因为几乎通用的公民观念包含国家与公民之间有相互承担的义务，所以，要求个人遵守期望国家行为产生公益的法律。然而公益不可能总是显而易见的，就个人的情况来说尤其是这样。因而，政府必须通过依靠控制力量，通过保存民有善意，来寻求公民依从，这样，公民会自愿地给其政府“虽可疑但无罪”的对待，甚至在困难的时候，广泛地维护法律秩序。这种善意保存带上强烈情感色彩的时候，便称为爱国精神。

那些疆土持久巩固，政治长期稳定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政府很少集中力量培育爱国精神，也许战时例外。爱国主义主题大都作为正常的政治变化过程的副产品而形成，并由非政治的社

会机构来传播。但是，在东德和西德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承受不得这种被动的方法。内部的多样性，外部的威胁，十分有限的公益承诺的兑现能力，使得让民众拥戴成为急需。因此，培养爱国精神已是政府官员的重要任务。在民主德国，官方灌输爱国精神的工作是由统一社会党文化科学部倡导的。贯彻这些工作至少名义上是社会公共和私立机构的责任。

东德提出，爱国精神是比较广泛的“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说法从两个方面结合着过去：一方面联系着文化历史；另一方面联系着政治历史。德国文化的最初巨大成就，在教育内容和青壮年有组织的娱乐活动方面，表现得十分显著，包括对音乐和艺术史的义务指导；国家鼓励参加各年龄组的绘画和表演艺术活动；社会对剧场演出和其它文化事业给予大量补贴。政府对文化活动的支持，继承了古老的德国传统（现在西德也是如此），而这使得探求民族特性有了更大的意义。

早年苏联渗透比较明显的时候，统一社会党曾进行精心的审查，以保证演出艺术限定在“进步的”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范围之内。有时用简单的、似是而非的论证方法，来确定具体作者是否对“劳动人民”表现出过革命的或同情的态度，而不考虑其所处的特殊时代。但到了50年代后期，由于重新认识德国文化历史广度的强烈需要，这种神秘的审查制度取消了。例如，巴赫和贝多芬在德国非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已经得到恢复。近年来，同样可以看到，政府开始重视整修古老的建筑，包括城堡、教堂和修道院。这些建筑虽然是贵族特权和反动道德标准的遗迹，但它们同样也是德国历史性成就的见证。

德国文化的其他方面，有点难于从近来政治历史的涵义中分离开来。外国学者和内省的德国人都注意到，偏爱社会生活的理性和秩序，平衡了德国艺术中突出的浪漫精神。这样的组合，产生了近乎传奇式的德国人勤劳的工作习惯，高效率的行政军事组织。虽然有一定的过分夸张，但普遍赏识的普鲁士“铁的纪律”的

漫画，依然是东德人形象的反映。即使今日，民主德国公民以其公认的效率和自制，可以同他们邻近的斯拉夫人所表现出的懒惰和放任形成对照。反过来，斯拉夫民族会记起普鲁士纪律与希特勒纳粹统治的残忍暴行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文化历史相比，东德政治历史是爱国精神中更为棘手的第二组成部分。官方历史批判了普鲁士贵族统治和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相反，现在的国家则声称有权继承革命的遗产，这份遗产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初期问世——以外，象威廉·魏特林和摩西·赫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都对引起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事变起了作用。这场以德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民选议会为特色的大动荡很难算得上是一次工人革命，相反它是商业中产阶级向贵族夺权的最初尝试。作为民主政治的一次实验，这段插曲不久被否定了。它不过是以普鲁士独裁统治的扩大化而告终。

1863年，随着拉萨尔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公众注意中心很快转向工人阶级。在俾斯麦的意在削弱激进反对派号召力的“开明”社会政策（国家托管残废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影响下，这一更加公开的社会主义进攻不久就衰退了。紧跟着这种策略，出现了反社会民主党非常法。从1878到1890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受到限制。

俾斯麦倒台以后，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重新出现。他们的选举力量虽然增加了，可是他们明显地背离了革命的目标。社会民主党过分稳健的方针，加上为帝国辩护，致使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的更加激进的组织斯巴达克联盟产生。1918年这个组织正式变成德国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几周里，德国共产党创立了一些分散的工人委员会，在几个主要城市鼓动了起义，1919年春在慕尼黑和奥格斯堡领导了一个为期四周的共产主义者共和国。德国共产党也获得参加萨克森和色林吉亚政府，直到1921年秋在社会民主党支持的中央

政府的干涉下被驱逐出去。

由于严重分裂的议会斗争无法抵抗右派分子的压力，军事失败和经济困难接踵而至，德国共产党进入了它的内部分裂期。1925年在获得6.3%的总统选票以后，恩斯特·台尔曼领导德国共产党走向了与苏联共产党更加密切的合作。结果是扩大了在工人中的队伍，增加了在议会中的代表，配合着意在加速魏玛共和国垮台的策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策略与纳粹主义者的相应并行，促进了希特勒于1930年1月爬上总理宝座。

国会大厦被纵火焚烧后一个月，希特勒非难德国共产党，下令逮捕了4000个左右共产党员，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这样，共产党人成为法西斯主义的首批直接受害者。许多比较活跃的德共党员逃到国外，主要去了莫斯科。日后他们在那里组建了10人乌布利希小组。在德国国内的幸存者中，一些共产党人试图于1941年夏天恢复党的秘密基层组织，但直到德军投降前九天乌布利希小组返回柏林时都收效甚微。1945年6月11日，德国共产党重新正式组成，从而在德国开始了向共产党统治的4年过渡。

正如这段简短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德国革命的政治走过了盛衰无常的历程。激进的首创精神，不论是在赫斯、拉萨尔还是在卢森堡的倡导下，总是短命的，又往往是猛烈的，通常跟随而至的是长期的政治压制。这样看来，德国革命者可以被工人阶级理解为不幸的先驱者。另一方面，在议会民主过程中，扩大工人权利的比较稳健的方法导致了僵持和混乱。这些事件除了加剧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对抗，几乎无助于培养德国人对民主政治和政党的信任。有人说不定会去论证德国的深刻社会变革最初已在独裁统治下发生，而其它的政治统治实验所带来的仅仅是混乱。

尝试从混杂的历史中选录爱国主义主题必然是棘手的难题，东德的情形比之于西德也许更是如此。除明显的间断以外，没有

一条清晰的线索可把民主德国所划分的“进步力量”穿到一起。不过，激进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遗产有充足的证据。虽然共产党政治领导者获得的成功不多，但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些共产主义提倡者一直是德国人。有时他们思想很能博得人心。必须强调，德国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苏联占领的产物。尽管共产主义只是德国许许多多的历史主题之一，然而它却是德国的真正推进力。

这种看法决不是降低深远的苏联影响。正如苏联力量贴近，相应的美国和英国政策无疑要阻止共产主义组织在西部区域发展一样，苏联的存在也决定了东部区域共产党政权的形式。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压倒之势的苏联参与，才严重地阻碍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探求不同的特性。

2. 苏联的渗透

作为德国文化与政治历史的现代表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疑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一个德意志民族。但却带有明显的俄国特征，早在20年代苏联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德国共产党产生影响时，这一特征便开始出现。纳粹时期，莫斯科已选定乌布利希小组，来保证战后德国政府能够完全体现苏联的利益。德军投降以后，小组成员立即与苏联军政机关密切合作，设立初期民政机构。

在这一点上，苏联的德国计划只是部分地实施了。看来莫斯科的德国政策最初不是作为建立苏控东欧集团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制定的。相反，倘若重要，德国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俄国人首先决定强求战争损失赔款，并保证消除德国的军事威胁。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签署了波茨坦协定。在不同的条款中确定：（1）奥得河——尼斯河以东的德国土地并入波兰和苏联；（2）批准建立第四个（法国）占领区；（3）成立四强德国控制委员会和四强柏林委员会；（4）授与各占领军总司令本区域内最高权力，同时要求“在可行的范围内，均等对待德国”。

居民”；(5)规定除苏联从西占区拆走重要的工业设备以外(设备价值部分地由交换指定的粮食和原材料补偿),各国必须从自己的占区满足赔款要求。协定还包括根除断定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治与经济之基础的措施。

回顾起来不难看出这些协定难以实行的原故。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粮食交换是盟国间最明显的争执点。另外主要的障碍是法国短时反对任何德国中心权力和英美合并各自区域促进经济复兴的计划。苏联认为这种合并违反波茨坦协定,它离弃了盟国控制委员会,于1948年6月封锁了通往柏林西防区的水陆通道。在随后的11个月里,美国向居民空运了近1.5亿吨粮食,并且坚决地制定了西柏林未来及德国持久分裂的计划。

在日益敌对和相互指责的背后,是苏联同美、英、法之间的根本政治分歧。在苏联看来,波茨坦的责任在于防止法西斯复活,“为在民主的基础上最后重建德国政治生活做准备”。这无异于意味着要毁灭资本主义,逐步采用根据苏联经验改造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则渴求保存私有经济和非集权政体以及竞争选举制度。

虽然苏联和西方的观念都不符合过去德国的实际,但是它们各自在德国历史上都有一些民众根基。各占领政权一面宣称尊重德国人民的意愿,一面采取行动把选择权给予同胜利者目标一致的本地集团。在苏占区,这种公开的偏向往往难以从直接控制分别开来。公民的反感不仅仅是由于彻底消除纳粹分子方案——包括没收纳粹官员和支持者的财产——造成的,还产生于普遍的反俄情绪。在西占区,反美情绪相对来说是最微弱的。应该想到俄国人不但是德国历史上的军事对头,而且在德国人心目中是文化上的低下者。严重的军事占领,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加剧了这些反感情绪。根据西方资料估计,1945—1953年战争赔款达158亿,有些年的赔款数额相当于民主德国国民收入的1/4^①。关于俄国人贪婪、野蛮、懒散和愚笨的故事,仍然在东德人中私下流

传，这说明了人们恶感的深刻程度。

新生的东德政权为使自己与苏联军事统治区别开进行了斗争，但几乎毫无成效。东德共产党不厌其烦地指出，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是负有责任的，这一半是出于服罪，一半是出于想取悦于它的苏联监护人。人民拒绝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号召，而却支持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的最后灭亡不是靠人民起义，而是靠苏联红军的力量。因而，应特别感激苏联为德国人民提供了一次走上革命道路的机会，补偿了历史上失去的良机。但这种感激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苏联的方式方法。1945年6月共产党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这样说：“我们认为，把苏联的体制强加于德国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德国发展的现有阶段。相反，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德意志民族的主要利益需要一条不同的德国道路，一条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权和一个议会民主共和国的道路。”^②

在战后最初的3年里，尽管有占领政府的压制，东德的发展同其有特色的、通过议会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始终是一致的。农业土地改革和大量工业国有化带来短期的社会利益，广泛地赢得人心。4个政党的建立为议会制打下了基础，这明显地背离了苏联的做法。1946年4月，东德共产党与日益得人心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了统一社会党，即时至今日的统一社会党。在合并过程中，苏联公开施加压力的迹象为这样的指责提供了证据，即合并旨在加强苏联的控制，从而使公认的“德国道路”遭致损害。

1946年秋的地方选举，使统一社会党在所有5个区都成为多数。在柏林——这里曾经出现过两个工人政党——的分别选举中（共4个党），社会党获得48.7%的选票，共产党的选票只有19.8%^③。大概是柏林选举把被迫组成统一社会党提上了日程，这使社会主义的选举者失去了反俄的选择。

在柏林封锁的紧张时期，苏联霸权问题显出重要的意义。这

个时期同斯大林试图暗中破坏铁托在南斯拉夫的领导首尾一致，因为铁托在广泛的问题上拒绝接受苏联的权威。东欧共产党受命断绝与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往来，并在自己内部清洗“铁托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气候下，谁不是无保留地赞同苏联的意愿，谁就可能成为铁托分子。一场清洗和审查浪潮随之而起，最后波及到东德及统一社会党。

虽然统一社会党的清洗没有象别处那样进行公开审判和处决，但其影响是实在的。1948年后半年，统一社会党党员人数减少了20万或者说10%^④。大多数先前社会民主党人从全部领导机构中被赶了出来。到1949年1月，统一社会党已经完全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同时，各党派和社会组织的“反法西斯集团”中所有非统一社会党分子被置于明显外围角色的地位。这个受统一社会党指导的政治组织起着德国人民议会的作用，后来成为全国阵线，它发表声明反对成立分离的西部德国，并为即将诞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起草了宪法。

动荡的年月，导致东德的政治体制按照苏联的模式改变，这与早期申明的意旨恰好相反。是否这种变化仅仅是显示出蓄意的欺骗，或者是否采取新的政策以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这都不是特别重要的。统一社会党成员和普通公民无论如何都感到蒙受了欺骗。在整个变化过程中，苏联起了非常明显的作用，熄灭了东德当局最后尚存的合法性火花。

毫不奇怪，由于这些不祥的开端，东德的移民和其它西方的观察家终于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过是乔装了的苏联势力的附属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或民众意愿基础……，是苏联和共产党的命令之创造”^⑤。

这样的描述恰当地突出了苏联对东德体制的渗透，同时却又把民主德国政治领导者的特征和他们对苏联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曲解了。要是同西方的敌对行为和苏联的苛刻要求达成妥

协，东德的领导人，象威廉·皮克、沃尔特·乌布利希、埃里奇·霍恩克，从而也就不会成为受他人操纵的人或利己的背叛者。他们既不会放弃德国的传统，也不会丢掉对未来德国和平与繁荣的追求。同他们的西部占领区的“现实主义”对手一样，这些领导者反而领悟到，大国的支持是东德全部目标实现的绝对必要的条条，包括取得主权，实行社会主义。因为有些东西只能靠苏联提供，所以，获得支持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与联邦德国的情况相比，无疑要艰难得多。苏联的渗透虽然带来了激进的政治与经济变革，但是，现今民主德国同苏联的相似程度是否超过了联邦德国同美国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不过，明显的苏联影响和深刻的反俄情感，给东德领导者探求民族特性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如以下各章节所要叙述的那样，这种探求兼备着对苏联意愿的迁就和若明若暗的使东德利益与成就具有自己特色的努力。

3.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全面引进社会主义可能是东德的杰出成就。简单地说来，社会主义就是政府机构所有与管理经济。现代社会是以某些事业公有——如运输、通讯、电气和教育——为典型特征的。即使在主要私有经济社会，如美国和英国，政府也拥有生产钢铁、汽车、化肥和其他多种产品的厂矿。

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如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公有制的范围、私有经济活动的限度、政府机构对经济的全面计划和管理方面体现出来。在战后早期，社会主义经济是靠保留先前的公共运输和通讯事业，对移民财产实行国有化，剥夺纳粹支持者的土地和企业而建立起来的。有关的法律当然易于误用，而且在引用纳粹“勾结者”的标准时，忽略了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所受到的强制。然而，这些措施得到人们的广泛支持。

到1950年，民主德国国营部门的收入已占国民收入的一半

以上。其中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41%，商业占61%^⑧。50年代，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国家指导下的集体形式，扩展到农村^⑨。通过税收、强制性购买和销售契约，对尚有的小规模私人企业不断地加以限制。由于赢利减少，导致投资不足，又为国家向私有企业投资打开了渠道。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半国营企业。1972年，大多数这样的企业被吸收到国营部门。在此之前，它们将近占国民收入的10%^⑩。

现在，东德的私有企业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仅雇用了0.07%的劳动力，主要是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⑪。私有经济的效率和绝对规模虽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对国家财富的相对贡献在世界上是最低的。由于民主德国显然不宽容非法或半非法的私有经济活动，所以它的私营部门的重要性可能要相对小于东欧国家的私营部门。在这个意义上，同它的伙伴相比，东德的社会主义可以被认为更“发达”一些。

当然，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远不止包含经济政府所有的内容。它还包括政府负责保证稳定发展的原料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分配、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收益的公平分配。根据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直接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最最终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的经济基础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经济障碍。

这种观点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大多数人相当熟悉的。它没有离开这样的主张，即出生的偶然——生来父母贫困、文盲或是少数民族——往往致使个人成为终身歧视的受害者。生活中过早地遇到这样不利的处境，据说会产生心理、社会、经济上的障碍。面对那些有较高的但分外的社会地位的人，年轻人要产生自尊不足和自卑感。他会在教育和职业机会方面受到排斥，进而发现所能得到的仅是那些不允许有个人主动精神的工作。除了工作以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可能没有闲暇时间和金钱，去从事其他人所能得到的智力和娱乐活动。这种社会经济处

境不利的综合症可能引起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一套价值标准，随着世代相传导致一种自我加强的循环。

在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自由民主社会，近20年来已经出现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承认这个理论为出发点的。结果是教育机会扩大，住房和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减少，社会服务活动在解决无形的“穷困循环”现象方面起着更积极的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推进力出自相似的设想，但在原则和实践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最主要的理论差异是统一社会党要把所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归结于经济差别，主要是拥有经济企业的人与仅仅是受雇佣者之间的差别。全部社会不平等待遇甚至种族和性别歧视，在理论上都被认为是导自这种根本的经济差别。其它的主要理论差异集中在私有财产的作用上。在自由民主国家，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要求一般是同法律确立的平等一致的，或者超然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待遇产生的权利要求。在特定的情况下，解决这两类权利要求之间的矛盾，是靠立法仲裁或靠不确定的甚至是随意的司法标准。

相反，东德的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的权利要求无疑是优越的。因而，私有财产权利虽然没有废除，但却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样，所有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和支配，私有财产仅限于个人财物、存款和住宅这类东西。

在民主德国，这一十分认真的社会协调的探求，在实践中产生了三个主要问题或变形。首先，名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表明，中央政府机构直接负责全部重要的经济决策，不管它们实际在何地实施。事实上，当然许多是由地区或当地政府制定的，或者是在工厂和农场制定的，但中央机构保留和行使推翻低层决策的权力。此外，统一社会党——假定起着代表社会利益的作用——最终掌握着负责国家经济工作的机构。结果，基本决策者与必须执行者之间的职权严重脱节。主要决策者及时准确地搜集信息的能力常常不能满足巨大而复杂的国家经济的要求。而且所

有参与者都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知道决定标准会不时发生变化。为了使自已避开不利的高层决策，低级经济机构可能会隐瞒某些情况，这样就使中央作出有效合理的经济决策变得困难复杂。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专断的潜在性加强，它导源于东德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权力一体化。这一结果不乏反常，因为社会主义实行经济公有制的初衷，是为了克服集中的私有经济势力抵制或甚至控制政治权利的倾向。但在自由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与经济的抵消力量——产生缓和或停滞，视人们的观点而定，而在东德却不存在这样的相互抵消的力量。因而，民主德国的统治精英人物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二元性，其行为几乎不受限制，同西方一般的情况相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离要更大一些。固然共产党以前的资本主义精英人物的权力已被剥夺，但这种无权的状况也延伸至工人阶级，而正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大概才输入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每一个依赖于国家和政党精英政治和经济权力生活的人都会发现，在间接的、集中的权力情况下运用个人主权是特别困难的。

东德社会主义的第三个主要缺陷起源于选举过程的非竞争性。总的来说，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通过多党竞争选举能够定期更换公职人员，避免集权的许多弊端。在民主德国，所有选举的官员，无论他属于什么组织机构，都由统一社会党挑选，列入无竞争的选举名单。因而公民不能直接制裁那些被察觉对公共愿望不负责任的官员。有时会引起关系倒置，公民对政府官员过度批评而蒙受处罚。因为这样的处罚通常影响到就业，所以东德人必须同基于政治不平等待遇的潜在经济不利处境斗争——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指责颠倒过来了。

那些能够适应这些情况的人(显然是相当大的多数)，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那里能够得到充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退休保障和其它一些社会福利、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还有普遍取决于个人成就而不是出身之偶然的社会经济地位。

东德社会制度的得失都是 35 年来实验和发展的结果。德国的文化与政治历史，苏联的渗透和民主德国领导者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对民族特性的形成都起了作用。但是其它力量也在起着作用，改造着民族，提出新的问题。

4. 社会变革的生态问题

人类发展的生态或系统观点，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工作与休息，家庭与集体，体力与智力，文化与政治，生活的这些方面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人在某一方面的表现对其他人是要产生影响的。

因为东德领导者是些政治家，而不是社会哲学家，所以他们往往忽略对生态的认识。他们宁愿集中力量解决短期内的狭隘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顾长期的社会后果。可是 60 年代后期，一种比较全面的社会变革的观点开始在一些权威性的著作中出现。这一更为开明的观点既是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基本政治矛盾或多或少圆满解决的象征。它同样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某些生态问题已经开始表现得更加鲜明。

以下各章将概述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努力。现在需要作简要的评介，结束对民主德国民族特性的描述。东德的社会生态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期德国的历史，还有统一社会党模式的社会主义特色。同时，这个国家表现出的许多特点，也是任何现代工业社会所具有的。

东德 1680 万人口居住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俄亥俄州，或相当于英格兰的 $\frac{4}{5}$ 。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每平方英里 402 人（每平方公里 156 人），是美国的 7 倍，但远远低于西德和英国^①。总人口 1947 年接近 1910 万（包括大量的东欧和中欧的难民），后来开始下降，在过去的 20 年里已经接近稳定^②。

这种异常下降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出境移民率大大高于外

来移民率。从1949年到1961年8月柏林边界墙修建、西德和西柏林当局注册的难民将近270万^④。1982年接收难民19.2万，从民主德国到西方的合法移民——主要是养老金领取者，平均每年有1.3万左右^⑤。相反，民主德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是来自联邦德国，平均每年不足5000^⑥。第二，东德的出生率越来越低。1979年，每一千人口中的成活生育率为11.6。美国为14.7，英国为12.1，联邦德国为9.8^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下降反映了现代社会给个人带来了选择机会，包括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妇女就业机会增加，也反映了鼓励生育的宗教价值观念已经弱化。此外，民主德国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已经减少。第三，民主德国的老化人口的比例很高。其中一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青年男子，现在都有80多岁了。由于战争和移民出境的原故，使得中间年龄组的人口减少，这是人口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根据人口统计，年死亡率为14‰，超过了出生率^⑧。

从经济观点来说，这样的人口结构是非常不利的条件。每100个人中，有65人不在工作年龄之内（32个老龄者，33个年幼者）^⑨。这意味着劳动人口担负着赡养其他人的沉重负担。到70年代后期，这种不平衡略有变化，但其影响在随后的15到30年里是难以消除的。此外，年逾40的妇女数量过多。这种状况使赡养老龄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同青年夫妇要求弱化传统家庭束缚的愿望发生矛盾，还对离婚率和结婚率产生影响。民主德国的年离婚率和结婚率分别为2.7‰和8.6‰，是世界离婚率和结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⑩。另一相关的问题，是民主德国的自杀率。虽然没有正式公开的单独统计，但自杀率可能要高达30‰。美国是12.7‰，英国是37.9‰，西德是22.7‰。

高离婚率和自杀率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虽然原因难以解释清楚，但它们同现代城市工业化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样的社会特点是：社会和物质的变动性加快，持久家庭减少，宗教化准则削弱，十分强调个人成就，人们集中于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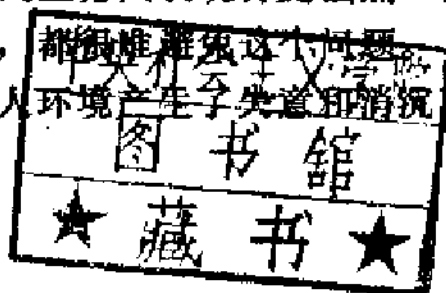
个人的城市环境。社会价值观念和地位标准，已经从个人关系转向物质财产的积累。学者们推断，这些社会变化将使个人在事业和物质方面的“成功”变得更为重要。如果缺少坚固的个人支承网，失败后的创伤是非常严重的。孤独、自杀、婚变是愿望受挫和自尊丧失所要付出的代价。

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时而论及到了精神发展和集体主义道德的问题，然而，民主德国并没有摆脱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病症。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民主德国的社会问题要更严重一些，这是同民主德国处于现代化发展的更高阶段相关的。

东德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时确实超过了西欧发达国家。人口结构异常的复杂因素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有一些颇为思辩的阐述，但是还可以指出三点。第一，在民主德国，成功之路看来被限定得过于狭窄了。的确，青年人在开始的时候是有许多均等机会的，但脱离了当权者特别是教师和管理者指定的轨道，可能会导致永远失去机会。一个人要是表现出过分的宗教倾向，对社会政治持不同态度，或者平时社会品行不良，就可能永远失去有重要意义的个人进步机会。社会对偏离正轨的人不够宽容，不允许有“再次机会”，这大概意味着许多人在生活早期，要经历严重的挫折，丧失机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没有个人挫折和机会剥夺，但它的特点在于，靠艰苦努力和好的运气会有最终克服失败的希望。

第二，同西欧相比，东德人缺少通过沉迷于相对无害的、脱离常轨的、或逃避现实的活动来解脱失意的机会。住房共同管理，娱乐和业余活动设施集体使用，意味着每个人都难以摆脱这样一些人，即那些出于陈旧道德约束或唯恐表现不端而乐于对离经叛道行为提出社会谴责的人。这样的社会压力虽然不是民主德国独有的现象，但在民主德国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变换一个集体，改变一个人的交际圈，

都很难摆脱这个问题。第三，对那些个人环境产生了失意和消沉感的东德人来说，



西德的固定印象，是拥有光明的和可望不可及的未来，这可能会使他们的失望加重，从一个侧面促使社会问题频繁产生。

必须谨慎，这些社会问题的范围不能夸大。显然，东德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在目前的社会价值准则和报酬体系中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挫折”问题的确实程度是无法测定的。但个人经历的充分证据表明，除了一般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问题，一些人还遭受不同类型的压力。虽然受其影响的是少数人，可是这样压力是民主德国社会生态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

生态问题还起因于民主德国自然环境方面社会变化的影响。总人口数量虽然下降了，但工业和技术发展引起人口的大量集中，除了东柏林有110万人口以外，从西部的马格德堡，到西南的爱尔福特，再到东南的德累斯顿，形成了人口集中的三角区域。民主德国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加城市化，但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仅有3个。东德以扩展中等城市群为特色，而不是象西方工业国家那样发展巨大城市。不过，东德同其它工业化国家一样，大量客运、空气和水污染、住房紧张和土地使用规划等问题，造成复杂的生态困境。

另一方面，东德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关键性的发展问题。现有的消耗水平和生产方法，使东德的自然资源极度紧张。可利用的耕地量（按口人平均计算为0.67英亩）虽然超过西欧国家，但在东欧是最低的。土地不足，要求大量施用化肥，而且要依靠进口农用化学制品和粮食。制造业需要不断大量地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全部用量加在一起，民主德国人均能源消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然是最高的，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说，它也属于前列。烟煤生产量虽然很大，但民主德国还是大量地依靠越来越昂贵的国外能源。因此，东德也面临着作出艰难抉择的必要，调整既定的消耗格局。

5. 民族特性的范围

局外人初次力图了解一个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找出一个单独的属性，作为最基本的说明要素，是具有吸引力的。讲英语的诸民族，由于深受其政府同东西方对抗牵连的影响，一直趋向于把民主德国看作仅仅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一个无救的西方历史的背叛者。但是，现实远不是这样简单。从十分深远的意义来说，民主德国是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同时受到来自四方的牵引。它十分清楚德国的过去，而着力追求社会主义的未来。说它是一个西欧国家，因为它有同样的民众文化，有同样的发达城市工业的生态问题，而且联邦德国的存在，又产生影响，形成对比。说它是一个东欧国家，因为它在军事上依靠苏联，或多或少地强迫推行苏联式的政治机构和社会价值准则。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德国处在特性危机之中。同期望的相反，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大的缓和。由于旧的难题依然存在，新的变化只能是再扩大问题的范围。

以下各章阐述东德主要机构和社会政策，它们的产生旨在适应各种影响力量，形成独具特色并广为接受的民族特性观念。

〔注释〕

① 约亨·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奥普拉登，莱斯克，1981年版，第16—17页。又见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英国，西米德，萨克森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② 引自卡罗拉·斯特恩，《1945—1965年统一社会党的历史与政治》，威廉·E·格斯菲思编辑，《欧洲共产主义》，剑桥，MIT出版社，1966年版，第2卷，第64页。

③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科隆，科学与政治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版，第148页。

④ 同上，第950页。

⑤ 引自费恩克·瓦利，《寻求一个统一的德国》，巴尔的摩，琼斯·霍布金斯，1967年版，第23页。

- ⑥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5—6页。
- ⑦ 《民主德国手册》，第1175—1177页，又见罗尔夫·巴德施图布恩尔等，《民主德国：形成与成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报刊，1975年，第196—216页。
- ⑧ 《民主德国手册》，第1180—1182页。
- ⑨ 科尼莱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8—29页。
- ⑩ 西德联邦统计局：《198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斯图加特：W·科尔哈默尔，1981年，第630—631页。
- ⑪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柏林：国家出版社，1980年，第1页。
- ⑫ 《民主德国手册》，第401页。
- ⑬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1年统计年鉴》，第77页。
- ⑮ 同上，第636—637页。
- ⑯ 同上，第637页。
- 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第84、364页。
- ⑱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1年统计年鉴》，第637页。
- ⑲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第1页。

二、有指导的民主：人民与政府

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政治文化，一套人们普遍共有的关于政府特有职权和公民同国家正常关系的信念。任何这样一套信念均有相关的三个层次：（1）官方文化，或称为公立信仰。它以最崇高的和最理想主义的观点，描述政府的宗旨和公民的愿望。（2）精英亚文化。它说明权力的特殊占有，并调整理想主义原则，使其与现实的界限一致。（3）大众亚文化。它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同，倡导不加鉴别地接受那些不大实在的理想。

国家不同，政治文化也大不相同。在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里，官方文化倾向于世代积聚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箴言的松散凝聚。例如，美国人实际上都能记起出自林肯、威尔逊、罗斯福和其他政治领袖著名演讲中的名言。一些著名的文献，象《独立宣言》，《忠诚誓约》，甚至包括自由女神塑像下的铭文，都有助于公立信仰的形成，并常常被援引在历史教学、政治辩论和节日讲演中。这种官方文化缺少哲学的一致性，或者时常不能解释现实的政治行为，但没有削弱它的持久性。同时，美国政治文化的长期演变，明确强调实用主义，国家交往系统具有开放性，逐渐把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官方、精英和大众政治价值观念之间的价值间断，不象那些较新的和不大民主的国家那么严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最为突出的是德国政治历史的间断性——妨碍了政治价值观念的渐进发展，并且采用了同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先前信仰完全背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官方传播信仰的基础。官

方信仰同精英、大众亚文化之间严重脱节，是其必然结果。

1. 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主德国的官方文化或思想体系，是来自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俄国政治领袖列宁思想的混合体。同世界其它共产党一样，统一社会党把这种思想遗产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复杂的遗产导源于大量的著作，按照特定的上下文意作出不同的解释。

在马克思为数众多的著作中，《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与恩格斯合作)和《资本论》(三卷，1867，1885，1894年，与恩格斯合作)最充分地表达出马克思的思想。反映马克思在德国成长和后来在英国观察社会生活的早期著作，主要是社会正义的哲学，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的天赋尊严和创造力，同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恶劣生活状况——贫困、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不断的失业威胁、普遍的不平等和首先是剥夺人们支配自己生命机会的限制性经济政治结构，作了对比。《共产党宣言》把大大简化了的马克思社会哲学的精华，同政治攻击、激励起来夺取资本主义强制机构控制权联系在一起。《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它的罪恶以及资本主义导致自我毁灭的“科学规律”作了详尽充分的说明。

当然，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本身，已经使马克思的许多科学断言受到很大的怀疑。然而，在一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他那强调人道主义道德的早期哲学，还有许多受重视的拥护者。在东德，党的机构虽然谈到要“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任何著作都没有根本缺点。

列宁在反对俄国沙皇的激进派中出现的时候，他从马克思那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但是如何医治一个还没摆脱封建主义的不公平社会，没有实际的指导。马克思的攻击理论，是针对封建主义早已被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取替的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说的。因而，列宁感到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科学规律”作大量的

推论，以便证明在无产阶级人数极少的落后俄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正当的。

依靠巧妙地利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有利条件，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夺取政权。尔后，他又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不足，缺乏创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马克思曾经希望，一次成熟的工人革命会自发地引导一条进步的道路，而列宁发觉，单纯的俄国群众需要坚强的领导。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最优秀的共产党，并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激进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这一有记载的经验，得之于临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过程，补充于后来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政权的某些实践，构成了列宁主义的主体。

为了理解东德的官方政治思想体系，即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相互联系的，但把它们看作是两个独立的部分是必要的。此外，马克思主义大概不具有统一社会党想要赋予的凝聚力和解释力。东德人发觉列宁主义是不大令人满意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落后的俄国条件下的产物，情况与战后德国是显然不同的。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对东德政治文化产生着最强大、最明显的影响。

2. 对民主的认识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统一社会党的政治民主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统一社会党的民主观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普遍接受的民主观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应当提请读者注意。在早期过渡阶段，统一社会党的公告审慎地提到了一些表述不明的民主原则，以便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支持。但是，把后来统一社会党承认民主理想完全归结于欺骗的政治策略，这是一种误解。统一社会党的民主观，产生于对个人主权的重视，反映了马克思的意旨。因此，尽管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经常和明显有妨害个人权利的现象，但官方文化从根本上说不是反民主的。如果说纯粹的民主

意味着全体公民的完全主权，那么，一个反民主的制度就是将全部权力授与专制君主或法西斯独裁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方文化追求民主，而不是相反。

东德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政治民主观，根据这样的民主观，政治机构不可能是使名义上平等的社会集团的各种意愿一体化的绝对公平的机器。期待这样“公平的”机构制定出符合公益的政策，是天真的想法。在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由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和经济所有不可避免地要使政治过程有利于社会特权阶层，所以，竞争的各集团不可能是平等的。这种批评一直没有间断。

选举竞争，立法争吵，利益集团压力，这些被看作是有势力的精英人物的特有职权。这样的活动的确构成了政治民主，但仅仅是对资本家而言。而对工人，对所有其他依靠为大私有企业工作而生活的人来说，“民主的”政府表现出专政的性质。统一社会党认为，这样一个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从属的大多数人可以从这样一个制度中得到社会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人为资本主义的生存提供了人力资源。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工资和社会支出不是什么公正和平等的问题，只不过是生产资源上的精明的投资。只要特权的根基不受影响，实行仁慈的政策也是可能的。

在美国和欧洲，利益集团多元化被认为是民主的现代形式，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谴责说，这是一种“欺骗游戏”。它给予从属阶级替代参与意识，却抑制了阶级觉悟的形成，而这是解决基本权力问题所必需的东西。因此，东德领导者提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如果不是完全否定的话——政治民主观。大体来说，政治民主是一种启发个人和集体主权的潜在的决定性手段。然而，在统一社会党的社会信仰中，这样的潜力只有在精心限定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出来。

东德官方政治文化规定达到“真正的”民主要有两个先决条

弊。第一，个人与生产资料(即所有者及受雇者)关系上的差别所造成的基本经济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制度和特权上的不平等，必须消除。这一要求不能被误解为否定个人能力、兴趣和个性上的差异，正相反，其目的在于消除人为的障碍，创造广泛的机会均等，这样，个人的独特性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第二，没有经济上的焦点矛盾，必然会出现普遍接受的公益，它同所有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正如东德最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家认为的那样，做到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跟列宁一样，统一社会党着重于马克思社会哲学唯意志的一面：“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因而，不能期待这种特殊形式的民主的先决条件自发地产生，它们必须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东德努力创造这些条件，向官方政治文化中心提供财力，满足形成共同政治意志和相应政治体制的需要。

3. 各阶级合作主义和政治代表制

在东德共产党统治的前15年里，政权致力于在全体居民中消除敌对分子，首先是纳粹的支持者，然后是小企业家和社会民主党人。1953年6月出现全国范围的暴动；1957—1958年和工会发生剧烈冲突；1958年统一社会党进行高层次清洗；并接连出现跨越边界向西柏林移民浪潮——所有这些事情说明，国家的协调性十分不强。

但到60年代初，民主德国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1961年8月柏林墙建造起来，移民显著地减少了，稳定了劳动大军。经济发展变得比较稳定，政治对立有了比较全面的缓和。

1963年，统一社会党公布第一个党纲，全面地详述了国家成就和目标。这个文件流露出很大的自信，声称经济改革和全体人民新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打下了基础。社会虽然存

在着许多有着不同需要和能力的阶层，但却出现前所未有的意志统一。于是，统一社会党的任务就是保证各个阶层继续发挥出建设性作用。

退一步说，对东德社会的这种描述或许还不够成熟。然而，这种描述可以说明东德政治体制建立所基于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原则。在统一社会党的论述中，各阶级合作主义一词没有被提到过，因为政治理论家把这个原则同法西斯主义和当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民主政体联系到一起了。但各阶级合作的原则非常符合统一社会党，符合它把全体公民结合到一个单一社会有机体内的尝试，社会的每个部分，象人体的各部分一样，发挥它的基本功能。

在今天的民主德国，各阶级合作与其说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还不如说是一个目标。现实的情况是这样，所有的人都置身于一套政治机构的体系之中。这套政治机构具有金字塔状的、横向的多种链系。因此，各阶级合作的社会形式已经确立起来，但它的实体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计划的形式主义最充分地表现在全国阵线上。全国阵线对所有政治组织来说，是结构松散的伞状联盟。它包括五个政党：统一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党。它还包括四个主要群众组织：自由德国工会联盟；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文化协会。这九个构成组织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利益，独立于全国阵线之外，指导自己成员的大多数活动。

全国阵线本身有着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体现着这样一个目标，即把某种形式的政治责任制扩展到全体公民中去，并求得全部有责任感的公民对单一体制形式的支持。全国阵线在名义上不同于政府和执政党，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提高人们的集体和民族自豪感。其次它的社区分支机构为社区行动做出规划，如定期集市、节日庆祝会和美化运动等，召集组织成员和其他公

民。这同西方民主国家中公民俱乐部所起的作用差不多。

全国阵线的第三个作用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政治特点。它负责选举工作，调整各选举议院的候选人提名，协助公民监督当选代表的活动^②。在各选区，各个党派、群众组织、居民协会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召开全国阵线会议，推荐候选人。经过初步审查以后，把合格的、优秀的公民列入名单，提交到另外的公众会议。候选人是按推荐次序列入名单的，通常要比有效席位的数量多一些。公众会议一般很少改变候选人的名次。

在选举日，选举人可以划掉不想选举的候选人，或者把名单原封不动地投入选举箱。列在选票前面的一些候选人将当选，除非是有人被大多数选民划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席位将让予名单上下一个候选人。非官方的东德资料说明，在以往的选举中，城市的选举人有时否决了许多已经通过的候选人。由于工人选区的支持不够充分，东德“工人”政府曾经不得不公布一些人为确定的选举结果。在过去的日子里，这样的问题已经明显地减少了，这也许是因为选举人的反对，也许是因为改进了提名程序。

根据官方政治文化，全国阵线的政治作用，是为政府官员选举过程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属于一小部分有限的社会经济精英提供保证。作为全国阵线的创立者和最权威的一部分，统一社会党显然要起到保证选举过程公正无私，选出优秀的候选人的关键性作用。当然，不能断言有关的统一社会党官员不把机构的和个人的成见带进选举过程。相反，在运用统一社会党创始的非公开的比例代表制原则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有组织的干预。按照代表制原则，各行政级别的议院席位要同预先确定的分配额一致。结果，由性别、年龄、职业、派别决定的席位分配比例，从一个选区到另一个选区，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显然，这样的结果需要对提名过程进行大量的幕后协调工作。范围比较广泛的比例代表制所达到的最终效果，不是通过比较自发的过程所能取得的。这同样增加了统一社会党的各阶级合

作政体的形象。

4. 单一议会制政府

在政府的正规结构中，各阶级合作原则也得到了反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常见的政体结构：单一议会制。与联邦制不同，东德没有独立行使权力的省或州，区域行政部门只拥有国家政府特别授予的权力。这种体制相当于法国的单一制，也似类于美国的州同市县的关系。与总统制不同，东德在国家一层不搞分权或牵制与平衡，所有权力属于人民议院。这种设置是属于议会至上的那种类型，如同英国一样。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的要求也同样证明这种安排是正确的，体现人民意愿的人民议院是最好的公共机构形式。因此，没有纵向和横向分权的作法，表现出创立一个各阶级合作社会的决心。

因为全国阵线的政策排除竞争选举，所以，拟定了一个正式协议，把人民议院500个固定席位分配给各个全国阵线组织：统一社会党127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党各52席；自由德国工会联盟68席；德国青年联盟40席；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35席；文化协会22席。由于4个群众组织的许多代表同时也是政党成员，所以，统一社会党享有的席位，实际上超过了半数^③。事实上，人民议院的所有投票都是对预先的决议无异议的赞同，党派席位分配相对来说也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

人民议院形式上的作用跟很多现代议会的作用相似。它的会期简短，而且缺少有意义的公开讨论。所以，与其说它的作用象工业化民主国的议会，不如说更象不发达国家的议会。民主德国的代表任期5年，每年参加3次或4次全体会议，一些会议只延续一天。他们正式地选举国务委员会、部长会议、国防委员会主席、首席检查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但实际上所有这些职务都是在议院控制之外的过程中任命的。

一院制的人民议院设立12人主席团，这是一种集体负责机构。这个机构包括有议院主席(霍斯特·辛德曼于1981年再度当选，任期5年)，3个统一社会党的补充代表，还有其他8个全国阵线组织各选派的一名高级代表。主席团只是一个议院事务协调机构。各党派和群众组织的主席不担任主席团的职务，这表明主席团职权相对来说不是很大。因而，人民议院主席团的地位比之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要低一些。

人民议院还设立14个有管辖权的常设委员会，相对于外交、卫生、劳工、社会等主要社会政策领域。这些委员会的活动在报刊广播中的报导不多，有关资料不十分充分。各委员会的规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民议院的代表，通常包括一些任职于有关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国家和统一社会党的官员，构成了各委员会成员的多数。另外的成员是从议院以外选拔的。这些人被选中，原因在于他们是专业行家，或者他们属于受了某种伤害的群体，而不在于他们的组织派别。例如，一个“有代表性”的老年寡妇可能参加审查社会保险法，一个哲学家可能参加审查青少年犯罪确定法。

各委员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政府和统一社会党负责官员的报告，名义上达到了宪法上规定的政府对人民负责的要求。就敏感的政策领域而言，诸如外交或国家事务，人民议院委员会就不能超越这种形式上的合法限度。但在一些思想上不敏感的，对公民个人有着比较直接影响的社会政策范围内，议院委员会有时接受立法提议，并利用工作会议审查和修改提案。从扩大民主和制定更好的法律方面来说，这样做证明是正确的。70年代，议院委员会的顾问协商作用有了加强，同时，民主德国很大一部分法规(如家庭法和劳动法)已经完全公布和修订。这些综合现象是人民议院全面升级的一部分，还是暂时的现象，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清楚。

5. 国务委员会

人民议会闭会期间，它的许多职权委托给国务委员会。1960年，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死后，国务委员会组成，它起着国家集体首脑的作用。它的一些作用类似于西方议会政体选举产生的总统：任命大使；接待外国使节；授予国家荣誉；召集选举；正式公布人民议院法令^①。1960年到1973年，沃尔特·乌布利希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到1971年，他同时兼任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在乌布利希连任期间，国务委员会逐渐扩大了权限。60年代初，部长会议分裂性改组，使许多行政权力归属于国务委员会，它甚至开始发布影响特定部室日常事务的号令。除了对行政部门的干预，国务委员会有时绕过人民议院活动的正规要求，通过比较重要的立法。1971年国务委员会的权力开始受到约束，1974年的宪法修正案使其正式化。部长会议的先前权力得到恢复，人民议院在正式立法方面可以起到比较主动的作用^②。

回顾起来，乌布利希扩大他的国务委员会作用，似乎可以解释为个人权力的滥用。因为统一社会党的大党权力构成了整个政府结构的基础，所以，乌布利希试图不仅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脑，而且也要成为政府的实际首脑，这也许是没有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乌布利希可能把部长会议视为一个主要经济改革的障碍。因此，把权力转移到国务委员会可能是防止行政抵制的最有效办法。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是正确的。

乌布利希在1971年6月被免除了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他的国务委员会主席领导职务一直保持到1973年1月他故去。恢复部长会议权力的主要立法是1972年10月通过的。维利·斯多夫自1964年以来，一直是部长会议主席，他放弃了这一职务，接替乌布利希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从两个机构间权力的再分配立法来看，斯多夫的易位可以被看作是降级，也是突出统

一社会党新领导人埃里奇·昂纳克无可非议地成为主管人的一种方式。保证适当地压缩膨胀的国务委员的编制人员，斯多夫可能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1976年10月，斯多夫又回到他前任的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这一变化使准确的评价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变得更复杂了。昂纳克的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头衔改为总书记，他得到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额外角色。因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是国家的名义首脑，所以昂纳克获得这一职务后可以使他得到执政党领导人应有的外交视野。（第二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进行了类似的变更。）虽然国务委员会的人员过去略有扩大，但没有在损害部长会议的情况下试图重新加强国务委员会的迹象。

1981年6月，全国选举以后，国务委员会由主席昂纳克、3名副主席（斯多夫——部长会议主席；霍斯特·辛德曼——人民议院主席；保罗·弗纳——统一社会党安全问题秘书）和其他17名成员组成。除了其中4人是全国阵线其余党派的代表，其他人全部来自统一社会党，还包括8名政治局成员。虽然比较密集的人员重选显示出国务委员会的威望提高，而实际上国务委员会只是继续履行一些主要的礼仪职责。在其它一些共产党国家，这些职责是由人民议会主席团执行的。因此，国务委员会略有异常，尚在体现着各阶级合作的全国阵线的形象。

6. 部长会议

用议会特有的措辞说，民主德国实际行政权威——“政府”，是部长会议。部长会议包括45个部长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首脑。它比法国和苏联的类似机构要小，但大于英国或美国的内阁。除了另外成立的几个管理国民经济的部和同等的委员会以外，部长会议的职权范围大致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部门。同国防、财政、卫生和司法各部并列的还有化工、电子、机械和建筑各部。因为这些与生产最直接相关的部在法律上和作用上同比较常规的

部不一样，它们在部长会议内，看上去不是那样令人茫然无绪。

关于部长会议的成员，难以作系统的概述。30年来，几个部多次经过大的改组、合并和分设。部长会议本身的权力作用，也经历了最初完全从属于苏联军事统治到如今职权自主这样相当大的变化。部级人员变换无常，一般任职时间，多则10年以上（内政、司法、财政），少则不足4年（农业）。在年轻的国家，人员更迭和政治形势一样，有时变化很快，以致作一般的原则概括很难说明问题。

除了一些相当特殊的情况，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选拔成员，不是以个人的政治才干为基础。我们以英国的内阁为例，可以形成对比。英国内阁由一些多少是卓著的政治家们组成，他们之所以能进入“政府班子”，是因为他们个人声望，因为他们为选举获胜出了力。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将在几届内阁中任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声望更高的部室移进，直到最后以首相一职的竞争者出现。在英国内阁，管理才能、技术专长同政治才干相比，无疑不是那么重要。而就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的大多数职位来说，其标准要求恰好相反。

民主德国的大多数部长，不是基于行政等级组织之上的政治阶层的一部分，相反，他们产生于行政等级组织，是从各层次中提升上来的专业内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仅仅是些有资历但无生气的年老者。在高技术领域，要求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年龄太大也可能是一个不利的条件。例如，沃尔夫冈·琼科34岁时任建筑部长。在此之前，他经过广泛的专门培训，从事6年管理工作，任代理部长3年^⑥。琼科首次被公认的政治地位，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担任4年多部长以后获得的。

部长会议作为一个群体，同其他政治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有27名会议成员，同时也是全国阵线的代表，41名成员是统一社会党党员。大多数统一社会党的部长已经被选进（或将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上升到政府的重要

职位上来。关于这些联系的重要性，待到讨论统一社会党结构时，再作更充分的探讨。

在这里，部长会议这个特殊的小群体值得密切注意。同任何大的机构一样，部长会议也有其比较小的执行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主席团。1972年以后，主席团被授权代表整个部长会议，所以它构成政府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然而，就部长会议的其它方面而言，主席团不全然是一个指导机关。部长会议几乎每周召开全体会议，允许有一些集体协商。主席团与各部长的确切关系主要视其行政权限而定，而极少取决他们的个人声望。

评价主席团，关键在于着眼它的构成情况（这里叙述的是1983年中期的情况）。主席团是由主席（大致地说即总理）和两名第一副主席领衔，他们均在统一社会党机关内担任要职。主席维利·斯多夫是从统一社会党有关建筑、原材料和后来总经济计划机构开始崭露头角的。1952到1955年，他任内政部长，负责建立国内安全组织。1956到1960年，他任国防部长。1960年，他承担起协调统一社会党和部长会议关系的特殊任务。除了短期任国务委员会首脑以外，斯多夫从1962年起，就一直在部长会议主席团任职。他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3年任政治局委员。斯多夫除长期在统一社会党机构任职外，他以其经济事务和安全及国防领域的管理经验引人注目^⑦。

艾尔弗雷德·诺依曼是第一副主席，也是主席团资格最老的成员，他经过12年的努力，进入东柏林党的组织。1958年他成为统一社会党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在部长会议改组期间（1961—1965年），他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取消）主席。1962年以来，他在部长会议主席团任职，平常没有指派专门任务。自1954年起，诺依曼任党中央委员，1958年任政治局委员^⑧。另外一名第一副主席是沃纳·克罗利科夫斯基，他到重要工业区德累斯顿之前，已在罗斯托克专区党的机关几次任职。1960到1973年，他是德累斯顿专区党组织的领导人。以后8年，他在统一社会党经济

部从事领导工作，1976年起担任现职。克罗利科夫斯基1963年任党中央委员，1971年任政治局委员。他的长兄赫伯特是外交事务副部长^⑥。

尽管个人的背景根本不同，但诺依曼和克罗利科夫斯基却有两个主要共同经历：作为党的高级官员长期工作于重要工业区，在领导、决策和吸收人员方面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并集中工作在经济责任部门的高级职位上。这两个人都可以被看作是职业政治家，从某些方面看，似类于西方议会政体中的政治家。他们之所以升迁，是因为他们支持超越自己而有成就的人。但具有同等意义的是，他们以其人格、勤于工作得到人们的支持，并且拥有财力支配权，可以酬劳支持者。

对主席团其余9名成员，可以作同样的概论。这9名成员仅以副主席头衔为人所知。然而，就他们的情况来说，应该更着重于他们的技术专长，而不是党派职务。其中5名副主席是统一社会党成员，4名属于全国阵线中的其他党派成员。这些人都担任党派职务，并都有经济计划和管理经验。同斯多夫、诺依曼和克罗利科夫斯基不一样，主席团其余各成员都在一个特定委员会内任职，如国家合法法庭，司法，运输工具和农业机械，原料供应，环境和水力经济，国家计划委员会，通讯，科学技术，经济互助委员会等等。除了司法部长（一个先前私人企业的专家）以外，所有副主席都直接负责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

若是立法规定主席团为整个政府的领导集团，这样片面地向主席团选送经济官员是出人意料的，但同时也使人明确了一些事情。看来主席团事实上不是整个部长会议的协调和指导机构。相反，主席团作为管理和计划国民经济最权威的政府机构，行使职责是比较有限的。如下一章要讨论的那样，这样的专门知识集中暗示着统一社会党在经济问题上行使权力。各委员会机构处在经济领域外部，行政监督主要落在主席斯多夫和第一副主席以及部长会议主席团工作人员的身上。

各部按照专门法规行使职权。70年代,许多法规重新修改,使已经扩大的部长会议权力得到反映,为各部的政策产生提供了更多的手段。欧洲大多数行政体制盛行的权力等级原则,得到重新肯定。法则还包括为各部长配备较多的个人工作人员的规定。这些工作人员是正规指挥系统之外的小团体。这些变化是否显著地改变了部长的权力,关于这一点还不明确,这要更多地取决于部长在选拔个人工作人员方面的自决程度。

部机构的另一个变化是计议委员会的复活。计议委员会在60年代初曾经废而不用。各部首长定期召开的计议委员会会议,包括部长、公务秘书、部室首脑,必要时还有来自政府和党外的顾问。其实,最初建立计议委员会,是促进检查部长工作,现在则着重于使计议委员会起到论坛作用,解释部室政策,交流有关改革草案的效果情况。如果这种描绘准确的话,那么民主德国的部属计议委员会可能要相似于西方议会政体中隶属于各部的顾问委员会。

7. 地方政府

在国家政府机构下面,民主德国有3个区域层次:15个专区;219个县;约9万个乡镇。各级政区的特点是,有一个选举产生的议院。它的构成受全国阵线地方委员会的控制。全国阵线地方委员会的指导方针比起人民议院选举采用的原则,要有更大的灵活性。议院的支柱,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围绕地方的有关政策成立的。它们包括议院代表和非议院代表。大约500万居民(每28个成年人中有一人)担任各级议院委员会委员,其中20万是议院代表^①。官方资料骄傲地指出,这一比例体现了比西方民主国家更高程度的公民参与。这种参与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如果地方官员能够公正地引导,那么,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很可能产生出较好的政府、较高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公民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在公民协商

委员会方面进行新的尝试，特别是在城市区域，旨在帮助缩小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参与的效果自然要受到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实际上由更高层的官员选拔——的权力和中央政府限定的狭窄的活动范围的严格限制。地方政府没有独立制定政策的权利，地方的所有政策必须通过明确授权立法或国家的行政指令才能产生出来。同样，地方的行政开支也都要通过统一的中央预算渠道。在这方面，民主德国类似于单一制的法国，同联邦制和比较松散的英国单一制政体大不相同。

但是，东德的地方政府不只是中央拨款的被动接受者，它们也是预算过程的参与者。各专区相互竞争，以便能获得较大的拨款份额。比较富裕的区要求依据生产总收入的比例进行分配，而比较贫困的区则强调要制定补偿或均等的分配方案。各县和各社区通过中央各部门的追加补助金，如住宅补助，争取特别规划的资金。这些努力的结果，要看以往的工作如何，部门领导的机敏程度，高层机关中是否有自己的朋友。

无论资金的来源如何，地方开支一般都得在竞争中分配。哪一个剧场将要整修；哪一条街道将要修补；哪里要建立新的住宅、学校或饭店；家务的负担怎样才能减轻；青少年犯罪怎样才能减少，这些问题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公民参与的地方体制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起到实际作用。

近年来，上层政治权力机构已经对地方政府相对软弱的抱怨作出了反应^①。中央预算拨款一直不够充分，有点无法预计，导致一些社会规划几年内没有完成。经济部门的扩大给公共事业带来更大的负担，而地方政府的资金却没有相应的增加。部长会议正在作出规划，保证地方在较长的时期能够处理资金。这样看来，在几年里可能制订出广泛详尽的方案。已经有了新的法则，强制生产企业承担部分公用事业的费用。虽然工厂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协定早已存在，而现在地方政府的法律权利得到了加强，

可以对工厂管理部门违反协定提出控告。这样一些变化，是否能使东德的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可以发挥实际作用的职能机构，还有待于观察。

除了财政上和政策上的限制以外，地方政府的不利条件还在于对很多行政人员没有控制权。执行委员会名义上由地方议院选举，行使行政职权。这些地方官员受托管理同地方事业有关的各种政策领域。他们虽然在形式上对地方议院负责，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由东柏林中央各部门招收、培训和任命的。中央各部实际上掌握着自己的文官系统，向全国选派专职受训人员。地方政府没有行政人员的独立来源。用法律上的措辞来说，一个地方行政官员，既对地方议院负责，又对中央部门负责。因为中央各部可以安排一个人的出头机会，所以，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能够轻易地推断出，应该在哪里投置更多的忠诚。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活动，仅仅是对中央官僚传递下来的政策的任意运用。中央官僚高高在上，反应迟缓。把地方执行委员会作为集体协调机构的尝试，是徒劳无益的。行政官员向地方议院负责，可能不外乎对于公民愿望无法满足的原因作无止休的解释。

官方的社会评论表明，公民对地方政府的感觉，常常是如此。地方政府的低效率，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对合法性的寻求，这是众所公认的。应该按照两个渠道加以改进：必须给予地方政府官员更多的控制权，管理自己辖区内的各种经济和行政事务；必须使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和动力，对公民代表的要求作出直接实在的回答。

8. 社会主义国家

栖息于马克思和列宁遗教中的民主德国的官方政治文化，显示出对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双重矛盾的认识。这两个概念在原则上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历史揭示出，国家权力总是被用来

剥削和镇压大多数人民。而且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民主德国这样的新国家，也曾经被迫采取压制措施，针对大多数人中那些不理解社会和经济迫切需要变革的分子。

但如今根据官方政治文化所言，那样的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已经被消除或已经顺从于新的秩序，广大劳动人民肩并肩地参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权力不再是镇压性的，因为它如今取得公民的完全拥护。政府行政机构同人民代表制的议院密切结合，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这样，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加强人民主权，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这是德国历史上的首创。或者说得更深刻一些，只有扩大人民主权，国家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各项任务。

抽象地看，这样的观点好象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试图摆脱列宁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朝着国家与社会关系更加互惠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初期阶段，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完成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后来，新的社会反过来改变着国家权力的特性，使它更加关心民意。这一共生关系的结果是，循环式的变化进程，逐渐把两种力量吸引到一起，直到它们成为一体。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说，这一过程的终端，将是国家的完全“消亡”。

虽然民主德国的官方文化时而援引这种近乎诗一般的形象化描述，但常见的评价则是比较现实的，并且不是那么乐观。应该承认，现存的国家权力机构是不完善的。政府机构往往不够协调，效率很低。它们从狭隘的、利己的观点出发，确定工作任务，而且通过主观官僚主义的方式方法进行管理。同时，在表达民意，查询责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分担管理任务方面，人民主权的议院不能尽职尽责。代表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人物太容易满足于纯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们再次提到了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相互增强的作用，但着重指出了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作用只能是追求合法性的障碍。

这一章阐述了政府的正式机构，它们是东德政治体制赖以形成的政治基础。官方政治文化认为，这些机构是一个统一体的合理有效的组成部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民主的社会的意志。然而，前景不是那么乐观，问题也很复杂，这是现实。前景之所以不是那么乐观，是因为社会和政府都有许多引起分裂和竞争的因素；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少，并能获得好处；坚信民主信仰的人不是很多。本章提到的近来组织机构的变化，是对这些缺陷的默认。这些变化意在进行合理化分权，对更大范围的参与者负责和开放。现实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必须使许多机构同无所不在的执政党的职权结合到一起。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603页。（译者注）

② 冈特·尼尔布等：《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科隆：西德意志人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119页。

③ 同上，第118页。

④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科隆：科学与政治出版社，1979年，第1038—1039页。

⑤ 西格弗里德·马佩尔：《民主德国法律修订》，《德国文库》，第9卷，第11期（1974年），第1152—1157页。

⑥ 冈瑟·布克：《民主德国的重要人物》，柏林：J·H·W·迪茨，1979年版，第141—142页。

⑦ 同上，第313页。

⑧ 同上，第226页。

⑨ 同上，第174页。

⑩ 中央统计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柏林：国家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

⑪ 克劳斯·西夫金《民主德国地方政策与法律》，《德国文库》，第6卷，第11期（1980年），第1163—1174页。

三、有指导的民主：党的作用

在东德的社会生活中，统一社会党处于支配地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它的实际影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当然，外人很快就可以看出，统一社会党同美国或英国的政党根本不同。但因而断定统一社会党与其它常见的政党完全不同，是一种误解。西方人往往试图把统一社会党归结为一个搞阴谋的典型，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害怕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颠覆的反映。有人以为统一社会党成员以秘密基层组织的形式集中，策划欺骗手段，并借用政府的力量，达到把他们奇异的理想强加到不情愿的民众身上的目的。这是无意识地设想了一幅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漫画。

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方式是多样的，由于历史的多变，结党密谋的类型也确实得到了认可。然而，这种类型完全不符合东德的情况，即使在战后初期也是如此。从苏联占领德国开始，德国共产党人（最初称为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就是非常公开的。德国共产党公开宣传自己的目标，在全体公民中寻求支持，而不是进行秘密策划。因为政党和政权是同时建立的，并且串联在一起，所以，不存在“夺取”政权的阴谋。

如今，新的政治体制已经建立起来。统一社会党居于政治体制的中心，并在实际上进入了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组织来说，统一社会党十分庞大，内部多样化，这更多地反映了它所生长的那个社会的多样性。由于它的运行方式和所坚持的某些基本目标，它改变了东德的社会状态。但是，影响是相互的，东德社会的特点，对统一社会党的形成也起一定的作用。

1. 关于统一社会党领先地位的 两种观点

统一社会党是“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马列主义政党”^①。这是官方政治文化给统一社会党下的定义。根据这样的定义，统一社会党需要全体人民的支持，因为仅有的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已经被排除在“劳动人民”的范畴之外。统一社会党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为“逐步过渡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②创造条件。因此，它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最进步、最有才能、最勇于献身、最爱国的成员。这些优秀的公民共同协作，沿着变革的道路前进，并为基本方针政策的实现，提供关键的人才资源，鼓励他们为所有人创造富裕的生活作出贡献。实际负责的党员，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社会公仆，他们要承受个人牺牲，为崇高的事业作出更大的努力。这些对自己的目标确信无疑，坚定地依靠组织的力量，除此以外，他们是美国人所说的社会领导者和“优秀的公民”。

所有担任或准备担任社会职务的个人，包括担任政府公职、工会领导和其他社会组织工作的人，或者在经济部门起着重要领导作用的人，都需要考虑承担统一社会党党员的义务。加入党的组织，不仅是公开地宣布拥护国家目标和现存的政治制度，而且还要经常向党组织交纳党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家服务。这样的责任不是轻而易举能承担得了的，每一个党员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是他人的榜样。

正象这里所叙述的，统一社会党党员的特点也许看起来太高以致难以令人置信。然而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人在其它社会里也确实存在的。在社会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中是可以找到的。他们在慈善和公共机构、青年组织及宗教协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没有这些人的贡献，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将完全是不同的样子。东德社会虽然是按照十分不同的政治原则管理的，

但无疑存在着类似的利他主义特点和社会服务方针。当然，统一社会党对这些特点的体现程度，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在今天的民主德国，出现了一种舆论，即政治上的“反主流文化”，它对统一社会党领先地位的理想主义说法尖锐地提出了质疑^③。这种反对观点认为，统一社会党保留了军事占领时期的基本特征。在那个时期，声名狼藉的乌布利希小组同莫斯科达成默契，使东德的主权完全服从苏联的军事和经济需要，以此换取党的精英人物的权力虚饰。随着政党的扩大，先前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可靠的共产党员的存在，使最高层次精英人物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直到所有的人都被迫承认现实的艰难。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固然开始实行一些政策，改善经济工作，扩大人民的社会利益。但是，实施这些政策，总是要首先保证苏联的盟主地位，加强中央政治精英的权力垄断。“建设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因为它不过是对苏联政策的简单模仿，而没有顾及到对东德社会的作用。统一社会党宣称“仿效”苏联，沿着它的“革命道路”前进。这被看作是愚蠢的行为，因为民主德国比起它的斯拉夫教父来，要先进得多。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统一社会党党员的动机也直接受到非难。现今，几乎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了理想主义的天真。由于理想主义者事事遭到失败，批评者说，统一社会党现在主要被机会主义者所包围，他们入党是期待获得物质报酬。党员资格可以带来优先的住房机会、特殊商品和娱乐设施。它还可以带来难得的个人关系，依靠这种关系，一个人可以为其子女安排进升机会和享受特殊教育的机会。整个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一个裙带关系和腐化行为盛行的系统。个人成功靠的不是功绩，而是庇护人的身份。官职越高，分赃越大。这种持异议的观点认为，现代的统一社会党，其特点不是利他主义，而是权势上的自我扩张。

关于统一社会党和它高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表现方式的两种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统一社

会党拥有 220 万党员^④。毫无疑问，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带着各种动机进党内的。

除了官方政治文化，还存在精英亚文化，它是许多党员共有的信念。在维护长期理想的持续作用的同时，这套社会价值准则考虑到对日常生活要有比较现实和实际的态度。如果维护权力和从属苏联霸权常常看起来比民主和社会平等更重要，这是因为后者是永远的模糊的事情，而前者是有形的现存的事情。此外，无论哪里政治家都懂得，既然要贯彻某种政策，首先必须掌握权力。这种实用主义也承认物质报酬分配的不平等。因为民主德国是一个不完美的国家，它不是由天使神差管理的。平凡的人承担非凡的责任，需要特殊的报酬。设法使个人家庭过上富裕的生活仅仅是精明而已。政治领导者贪心程度没有超越其他公民，只是在机会方面超过了他们。同时，虚饰的生活方式是必须避免的，因为那样会引起人们的忿恨。

大众亚文化对统一社会党有另一种看法。大众一般不认真地争论党的支配作用，认为这不过是生活的现实。但对统一社会党也不象对国家那样表现出过多的积极依附。在公众看来，党和政府精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在一起，作为一个疏远的、渐渐冷漠的“既成权力机构”而出现。东德人认为，他们所起的作用同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统治精英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通常人们批评最多的，是统一社会党不能减轻苏联带来的比较明显的影响。

大众亚文化没有对统一社会党党员特点作出概括。党员作为公职人员、雇员、同事和邻居，可以天天遇到。一些人证明是勤奋的，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一些人则自我放纵，浮夸得很。合在一起，他们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自然，党员享受特殊待遇，这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些是不应得的。但是，不平等是每一个社会都可以理解的特点。至少在民主德国，大多数人被存心排除在党外，但对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并愿意付出代价的人来说，进入

党内的大门是敞开的。

占居重要地位的统一社会党，从这里看还不够明确。总结两种对立的观点，概述大众和精英亚文化致力于把这些观点与现实调和，是可以的。这些感性认识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但是，要更好地认识统一社会党，还须着眼于党员的客观属性，考察组织结构，说明它的实际作用。

2. 党员的吸收

统一社会党希望影响整个社会并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所以，它的成员吸收过程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⑥。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还需要吸收最有技术、最有知识的公民，因为未来的政治、行政和管理领导者要从这一部分中选拔。吸收高质量的党员，党不仅表现得更有力量，而且还增加党的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和党员的威信。这样就反过来促进后来吸收有才干的青年人入党。因此，党员的标准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

除了代表性和质量问题以外，党员吸收还受到潜在成员本身自我选择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合格的人都选择加入统一社会党这条路。尽管入党有好处，但有些人认为党员义务难以承担，有些人认为入党同个人的信仰不相容。对年轻人来说，加入党的组织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那些在学校里表现出色，而且同当局没有任何磨擦的人都清楚，他们总有一天会被允许入党的。个人的发展方向也左右着他们。这种发展方向主要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得来的。正象美国的一些父母设想他们的子女将来要进入大学，东德的许多父母设想他们的子女成人后要加入统一社会党。这样的青年都懂得，“前进就是成功之路”。随着更多的青年在民主德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这种适应性的发展方向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吸收党员也会变得更加常规化。

党员吸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次要的活动。党员人数增长十分

缓慢。每年大约仅有1.2万名党员故去或退党(纪律开除者很少)。每年增加的新党员为6.5万名^⑥。吸收党员是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基层党组织目前已有7.9万多个^⑦。因为一个学院或大学的基层党组织一年可能吸收2至8名预备党员,很明显,有些基层党组织几年里可能没有发展党员。

一半以上的新党员是刚从大学或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人要在学校里成为预备党员,需要有良好的学业成就,至少还要有共青团正式成员的履历,并证明是愿意做社会服务工作,以往没有同警方和校方发生公开冲突。还需要有地方党的书面推荐。有影响大一些的家长的支持可能是很起作用的。作一个不太确切的类比,典型的预备党员有点象那种要求选派到美国军校的人。

青年组织和工会的上层人员以及职业军人,入党的机会更多一些。对他们来说,学业成就不是那么重要,而更强调他们确有的领导才能。除此之外,其余标准是一样的。

在一年的预备期里,要求未来的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自愿承担额外的任务,兼学政治或技术培训课程,带头实施一些共产主义教育或社会服务义务计划。大多数预备党员在满一年预备期后通过考察,转为正式党员。

每8个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人中,有1个是党员或预备党员,成年人中每6个有1个是党员或预备党员。如果把党员人数作为衡量政治参与的尺度,那么这样的比例与自由民主国家的情况相比,体现了相当高的政治活动水平。这还表明统一社会党扎根于——而不是分离于——全体民众的程度。

统一社会党当然不是在全社会中均匀分布的。统一社会党致力于从总体上按照同国家相称的比例保持党员的阶级出身。如果根据父亲的职业来划定阶级出身(西方的普遍作法),那么,将近有75%的党员来源于工人阶级;如果以个人入党时的职业来划定成份,那么,根据官方断定,约有56%的党员来自工人阶级^⑧。这个比例数相当于工人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若

不是农业工人党员数量过少，政府和专科学校中的党员过多，统一社会党的构成状况同民主德国的社会构成状况相差无几。从统计数字意义上说，统一社会党的代表性远远超过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任何主要政党。同西方一样，在民主德国，妇女党员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妇女党员占党员人数的1/3，而她们人口数量却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即使是这样的比例，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也是不错的。

由于统一社会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自己的认识，它把重点放在工人身上，致力于达到这样的阶级平衡。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变革很可能会使这种平衡在未来失去重要的意义。首先，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不久会开始下降；其次，工人阶级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这意味着吸收党员着重于教育条件与重视工人阶级的代表越来越发生矛盾。结果，主张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社会党，必须依赖于“工人阶级”范畴的重新限定。由于职业结构的分化和现代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往往要大于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从纯粹的社会学角度来说，民主德国正处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之中，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义正被引人注目的社会统治集团——英国社会哲学家称之为“英才统治集团”——所代替。这一社会统治集团以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为基础。英才统治的准则虽然还谈不上改变整个统一社会党，但在党的年轻一代身上已经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3. 基层党组织

统一社会党的组织有两个不尽相同的系统，两者并不是密切相联的。它们是基层党组织系统和政治领导组织系统。

统一社会党有220万党员，对大约98%的人来说，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几乎是党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哪里有足够人数的党员，哪里就建立一个基层组织，一般基层组织拥有27名党员。中学、大学、工厂、医院、饭店、零售商店、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都

有基层党组织存在。在农村，小工作单位中的党员很少，地方党组织不是按行业而是按区域组建的。

党员密度(即党员与工作人员总数的比例)因地而异。总的来说，在那些职业要求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地方，党员比例也高。因此，在农业工人、店员、邮递员和理发师中，党员密度最低；而在大学教师、高级政府官员和军官中，党员密度最高。在党的专职机构，党员的比例当然是百分之百。

在党员比例很高的机关和其他一些工作单位，每月的基层党组织会议同一般工作人员会议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与此不同的单位，基层党组织则是工作人员中的一个小集团，基层组织的人定期在一起检查本单位为实现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所作的贡献。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单位的正常工作计划。他们也可能考虑重新分配工作任务的办法，考虑如何加强同其他单位的合作，怎样改善工作条件。他们也许通过一些计划，提高工作质量，或者提高职工的士气。

统一社会党还要求各基层组织讨论基层组织为地方社会规划和全国阵线活动做哪些工作。个别时候，还要求基层组织讨论公众(即同事和邻居)对大事的反应，诸如限制供暖燃料的决定，波兰工人罢工的后果等等。

基层党组织还负责收纳党费，推选预备党员。关于基层党组织活动的季度和年度报告，原则上要提交县级党的组织机关。基层党组织的事务，由选举的不支薪的书记管理，他同工作主管人或单位领导不一样。有的时候这会形成难以应付的局面，基层党组织书记要对自己的上司，也是基层党组织中的成员，进行工作评价。有证据表明，虽然基层党组织书记很少迁就任何事情，但对上司提出批评是非常谨慎的。

每两年半，基层党组织选派一名代表，参加县级党代会，听取关于党的成就和存在问题的报告。会议正式选举县级党的领导。但很清楚，这些官员或多或少是由上级党组织选拔和任命

的。

对多数党员来说，党的活动在工作单位起始，在工作单位告终。富有事业精神的党员有时可以利用党内渠道解决工作上的难题。大胆的人利用这个方便找人帮忙调换工作，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只有那些很有才能、决断力很强的人，还有那些依靠有权势的亲友的人，才能脱离基层党组织，进入党的领导组织。

4. 党的领导组织

低级领导组织

统一社会党的各级领导组织，拥有接近 2.5 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在有指导的民主发展方面，各级领导组织起着不同的作用。统一社会党的领导组织，由县、专区和国家三级领导机构构成。县和专区两级领导组织大小不一，除此以外，形式差异不大。

每隔两年半，129 县各自举行基层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15 个专区也各自举行县级代表参加的会议。但党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第一书记和另外几名书记（4 至 6 人）手里，他们有专职党务人员协助工作（县有 10 至 20 人，专区有 200 人左右）。党组织书记定期召集扩大会议（在县一级参加人数 10 至 12 人，在专区一级参加人数 14 至 16 人），参加会议的有地方政府和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官员，还有地方工会、青年组织的首脑。这些领导组织有权批准党内成员自愿建立常设和特别委员会，组织党的特别活动，研究同地方有关的问题。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可以利用这些委员会，扩大个人联系，争取进入党内负责岗位的机会。

大体上说，县党的领导组织和专区党的领导组织，是各自区域内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运行的轴心。因此，人们普遍都把县和专区党的第一书记看作主要的政治权威。就县级党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权力受到专区党组织的严格限制。专区党的领导对县党的领导的控制强弱，取决于专区第一书记的个人作风，县同专区所在地的自然距离，以及县的主要经济活动与专区的经济

活动相联系的程度。专区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同县级相比，有所不同，前者在数量上往往更多一些。这一事实说明，就党的大多数活动而言，专区是指导工作的有效机构。例如有这样的事例，县党第一书记在领导自己手下的书记进行工作时，会发现这些官员实际上更对专区组织中他们相应的官员负责。

我们已经对县和专区两级领导组织之间的差异作了说明，下面再来看看低级党的领导组织五项主要职权。县和专区行使这五项职权，有所不同。

五项职权 把五项职权划为两类，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第一类包括人事和社会化两项职权。它们体现出统一社会党是一个新型社会政治制度的创立者。作为这样一个创立者，统一社会党选拔和培养最优秀的公民，担任政府和社会机构的领导工作。为了使社会体制按照一体化、协调和进步的方式运行，统一社会党还为人民提供必要的文化知识和社会价值准则。当然，要是统一社会党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这两项职权，那么，推理而论，它就会取消自己的领导组织，停止做原来的事情，因为它可能已经建立起马克思所展望的那种乌托邦的、自我更新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将由清一色开明幸福的人组成，按照共同的意志联合在一起，靠无私的、有能力的社会公仆来管理。

因为民主德国的现实还远不具备这种太平盛世的²条件，所以，统一社会党的领导组织必须贯彻执行另外一套职权。第一类职权显示出统一社会党是一个社会机器的制造者，而剩余的职权则表明，主要直接操纵这台社会机器，观察设计上的缺陷，并时而进行紧急修理。在这里，统一社会党不是站在社会之外，相反，它是直接的参与者。其余三项职权是这种参与作用的体现，即监督体制运行；协调体制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进行直接控制。

人事 选拔和培训政治行政领导是统一社会党最重要的职权。很明显，这也是自由民主国家政党的一项职权。在民主德国，这项职权高度集中，同时还明显超出了政治的范围，扩展到

了经济管理部门和所有的社会组织机构。

统一社会党的人事职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需要认真选拔人员的要位，其人事安排由党的高级领导机构确定。统一社会党、政府和经济部门以及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的职务名单，都分门别类地列出来。各类名单按照区域级别再作进一步划分。

第二，各级党的机构都要建立人事档案，以便为各个组织机构补充干部。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由县党的领导机构负责。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员；承担了额外政治任务的人员（如自愿为城市委员会或全国阵线委员会工作的人）；由于工作成绩卓著而受到表彰的人员，秘书处都尽可能地记载。所有新党员通常都包括在其中，也有一些是非党人员。20岁左右的青年，格外受到重视。谁在个人进步上失去兴趣，包括党员在内，最终要从后备干部中被除名。剩余的人被推荐到学校去进行深造和被提升。许多人在有了出色的成绩以后，被传送到专区作为后备人员。在那里再重复上述过程。

统一社会党除了在自己的领导组织内行使所有管辖权以外，它还分担非党机构的人事职权。各政府部门、经济部门和群众组织，都有各自的人事管理方法，它们的范围很广，一般与统一社会党没有直接关系。党的人事职权在这些组织里相对小一些，并且集中在显要的领导职位上。居于这样职位上的领导，是在党的一个特定机构所负责的范围内工作。因此，县党的书记将主要选拔地方工会的领导和市政委员会的成员。而专区党的书记则主要选拔县级党的领导、市长和工厂的领导。

大部分职务任命，都是各个组织机构的正常提升，是党的官员干预所产生的结果。党的官员时常只是被指派批准由相应的非党官员和主管人提出来的人员变更。党员同非党员相比，一般提升得快一些，高一些，这是事实。之所以这样，不是由于党的干预，而是因为党员通常是最合格的人选。

另一方面，时有发生某些党员提升不公正的现象。这是政治恩惠产生的结果，党内不正常的关系网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有权势的人有时可以利用个人关系，使其亲友便利地进入特殊学校，得到有地位的工作。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违反统一社会党的人事职权原则，但却是民主德国社会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一部分。这如同在一些人们知道怎样利用个人“门路”的国家的情况一样。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消除职业结构的政治色彩显得特别重要。

社会化 新一代公民和政治领导者在现存的社会体制中协调地履行职责，需要必要的知识和社会价值准则。社会化是指他们获得这些东西的主要过程。一个新的统治政权试图进行共同的社会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政治领导集团同家庭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社会价值准则差异很大，社会化职权显得特别重要。民主德国在最初同传统的农民国家相比，社会价值准则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价值准则体系与工业化德国先前的社会价值准则是一致的。虽然如此，统一社会党为了使人民能够适应党领导的政治前途，适应经济和社会不断变革的需要，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为了履行社会化职权，统一社会党利用各级专职机构，保证在社会大部分交流领域一贯地反映恰如其分的社会价值准则。学校教育和社会新闻媒介，都在社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且相对易于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价值准则教育可以通过青年组织、工会和类似的群众组织，逐步进行。

典型的县级党的领导组织，有5名书记，其中两名主要负责社会化工作：一位负责教育和文化；一位负责鼓动。这些官员同非党机构密切合作，保证使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价值准则和爱国主题的特征。除了宣传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及积极地靠近统一社会党，社会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公益服务、自我修养和个人奋斗的社会价值准则

上。因此，县级党的官员提供财力，通过全国阵线支持自愿实行的社会规划，通过学校、青年组织和工会促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这样，社会化职权与人事职权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监督 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统一社会党不仅要培训和选拔人才，而且还要不断地监督所有机构的工作。为此，统一社会党的许多组织机构成了收集情况信息的大型服务机构。县级党的官员要编制基层党组织提交的书面报告，并且要经常同担任重要职务而且可信的人相互交流信息，补充情况。

至少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个过程为县党的第一书记了解本区域的主要活动提供了多种渠道。例如，来自地方工厂的定期情况报告，是管理人员、工会领导、青年组织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提交的；来自市政部门的情况报告，是部门首脑、工会官员和基层党组织书记提交的。在非常的情况下，补充情况也可以由地方警察或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提供。情况来源的渠道很多，但这种事实未必能保证县党的领导能够获得准确的工作情况。由于各种情况报告都是日常工作的反映，所以提交报告的人都愿意用正面的、调和的词语来叙述自己和他人的活动情况。

不管怎样，县党的领导所了解的情况，可以满足他们执行人事职权的需要。许多关于经济工作、公用事业和其他一些活动的情况，经过筛选转，送到专区党的机构。这是广泛监督行政和社会工作的一部分。最后，选出的情况经国家机构送至中央委员会各部。

尽管德国以其效率闻名，但这个信息系统有这样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情况信息从基层向高层传递，由日益变异的党的官僚机构处理。县党的第一书记可以召集少量的工作人员对地方事务作出综合评价，但到了专区党的第一书记那里，就不得不安排更庞大、更零散的一班人马来做这件事情。这个特点在国家一层更为突出。第二，党的各级机构都不愿意向自己的上级领导组织报告缺点。即使缺点存在于党外（如地方政府或地方工厂），党的低级机构也会由于让问题得以扩展而受到上级的责备。

几年来，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制止这种隐瞒现象。现在，民主德国的工农检查机构代表公众的利益，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工农检查机构是按层次等级组建的。关于检查机构实际工作情况，很少公布。在很多地区，它可能仅仅是一份若干党派、政府和社会机构的代表名单，停留在纸面上而已。很明显，检查机构的宗旨同党的组织的监督职权完全相同，所以，地方党的官员必须保证检查机构的工作不会严重地损及党的领导组织本身的名誉。换句话说，如果工农检查机构揭露出党在监督工作上不称职，那么就没有多少理由去期待获得成功。

协调 尽管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共同的社会，但是民主德国大多数机构的运行方式却严重地倾向于一个垂直的指挥系统。因此，地方工厂通常作为区域性企业的附属单位进行生产活动，但地方工厂反过来要接受国家各部的指导。地方工会同样要受专区和国家部门的领导。地方新闻媒介由中央当局管理。即使是公营事业，如教育和卫生，也是高度集中管理的。

结果，任何县的地方事务，都是中央指令的最终产物。这些指令是顺着许多不相干的指挥系统传达下来的。矛盾和分裂的潜在因素是实际存在的。举例来说，假如计划在一个中等城镇的郊区建立一个食品罐头厂，地方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要大量增加。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柏林各部将要求食品工业、运输、建筑、教育、文化、卫生和治安等部门分别采取行动。由于所有这些行动必须通过各个权力结构贯彻落实，所以，很可能在地方会出现计划难以完成，实施不够协调，时而引起矛盾等问题。

县党的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协调这些地方活动。地方政府委员会和市长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力做好公用事业的协调工作。只有县党的领导才有权指导大范围的相互联系的活动。除了通过固定渠道收集情况以外，第一书记还可以建立一个由有影响的团体代表参加的特别协调委员会。哪里的规划以最小的矛盾，以最小的拖延和最少的浪费完成，哪里的第一书记就会得到专区

高级官员的信任。靠这样信任积累，第一书记可指望在不久被委派到更重要的县去工作。

干预 尽管统一社会党不断地进行吸收和培训公职人员，监督他们的工作，协调他们的活动，但有时还是要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企业系统相互依存，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使经济活动受到危害。维护不善，资金使用不适当，会阻断公用事业。工会领导不称职，失去工人的信任，也会妨碍工作的正常进行。严冬酷暑，也可能会带来供暖燃料耗尽的危险。

这都是一些十分紧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迅速采取措施，而且问题的发展往往会超出一个社会机构的权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县党的第一书记具有直接干预非党机构的非常权力，他的指示可以代替正常主管人员和官员的领导。例如，第一书记可以要求地方工厂的维修人员援助修建公用设施，或者可以随时宣布煤炭定量供应的方案。

对第一书记来说，作出破坏正常职权机构的决定，要承担风险。首先，行使干预职权，可以被认为是履行人事、社会化、监督和协调职权不力的表现。其次，再三干预非党机构会损及非党机构领导者的工作。一个经常受到党的官员压制的工厂领导或行政官员，不可能使人们尊重和服从。由于行使干预职权，县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要直接负责工厂或行政部门的工作，这会减少他用于党务工作的时间。第三，在任何时候，第一书记干预非党机构，到后来都必须向上级和受干预机构的中央机关证明这样做的道理在哪里。如果干预立刻解除了危机，第一书记会受到表彰。要是干预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第一书记可能就要失去晋升的机会。很显然，作为一个县级党的领导，其精明程度在于是否具有正确判断这些风险的能力。

高级领导组织

统一社会党县级组织的五项职权，同时也表现了专区党的工

作的特点。对专区党的领导组织来说，人事工作更为关键。社会化职权的范围比较狭窄，重点放在区域交流和专门教育机构上。监督和协调职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行使干预职权比较谨慎，在处理县级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时，尤其是如此。另一方面，专区党的领导干预地方政府和县党组织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是经常的事情。

专区党的领导组织对上也有影响。负责主要工作的第一书记和专职书记，都有接触国家一级党的官员的机会。实际上，有许多专区党的官员直接参与制定国家政策。

统一社会党的最高机构，对执行党的职权全权负责，包括五项职权在内。因为党和政府的权力都比较多地集中在上层，所以，党政可以保持比较协调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的特点因政策领域而异，但不是平等的。最终由统一社会党而不是由政府来确立基本政策目标。因此，制定目标，是统一社会党的任务。

5. 中央委员会

在统一社会党的组织结构中，中央委员会一直是被西方人误解最深的一部分。战后早期，中央委员会是由一些卓越的可信赖的干部组成，他们可以被指派担任行政和经济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领导工作。那时的中央委员会被认为是一个以苏联为保证人的政治精英集团，它被置于东德社会之上，致力于使现存的机构服从新的中央权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几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央委员会同社会沟通，不是它向下延伸，而是社会向上延伸，社会中有政治头脑的公民，不断地被吸收到党的领导组织中去。中央委员会不再是社会“异己的”部分，相反，它是由那些立足于社会的人组成。他们通过各党派和非党机构已经成为不同领域中的领导者。

中央委员会成员资格由每5年召开的党代会批准，但是实际上，中央委员是依据职务、区域、部门的固有代表资格委任的（经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的同意）。中央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职权

机构，反映了东德社会各阶级合作的思想。它不仅包括党的各级官员，还包括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一切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因为他们担任了不同一般的职务。它是东德社会的一种指定的“既成权力机构”，是一个“筹划指导委员会”。因为所有中央委员会成员在晋升到这个显要的位置之前，就已经进入党内很长时间，所以，他们以党的主要机构形式集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奇异的事情。从象征性的角度来看，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可以证实，统一社会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是社会杰出成员的集合体。

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81—1986)^⑩共有213名委员，其中候补委员57人。(在党代会之间只有候补委员可以当选为委员。)这些席位是这样分配的：党的专职官员占38%(约半数是国家、专区或城市党组织的书记)；政府官员占26%(半数以上是部长会议成员)；工农业方面的经济管理干部占9%；群众组织的领导占10%；科学文化方面的行政官员占16%；其他方面的人员占1%。在过去的的时间里，这些比例有了一些变化，党的官员所占的比例略有下降，其他方面的比例有所提高。在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约有90%的前中央委员再度当选，连任的比例很高。由于有的委员故去和退休，并且又有12个新名额，中央委员会扩进30名新委员。这些新增补的成员，大都是中央机构、军队、外交部门和新闻宣传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还有一些是有发展前途的艺术家。

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2—3次会议，会期3—5天。每次会议的特点，是对具体问题(通常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作详尽的介绍，再加上党的其他活动情况的例行报告。经常是提出一些计划供会议讨论，但会议期间的自发争论很少。党的活动报告要提交会议正式通过。报告遭到否决的情况不存在。但中央委员也有自己表示不满意的方式，他们在会外非正式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中央领导一般要经过事先协调，确信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会正式地宣布一项政策。党的领导人都很明智，避免同中央委员

会大多数成员发生抵触。中央委员会毕竟是一些有才干有影响的人物组成的，最高领导人要依靠他们去实现党的目标。

中央委员会各部

统一社会党的中央机构组织约有 2000 名精心选拔出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工作于中央委员会的 40 个部门，这些部门被人们非正式地称为“中央机构”^①。许多部门的首脑是统一社会党中资历较深的第二梯队官员，他们有时有权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报告。各部室的主要工作，是从低级党的机构收集情况，时常对低级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提出“指导方针”，监督国家政府各部的工作，为党和非党机构的高级职位培养后备干部。各部室中资历较浅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一些正在向上发展的年轻人。他们近期毕业于高级党校，被安排在权力中心外围工作，然后担任党和政府以及其他领导组织的中级职务。

中央委员会各部的职权分配，同部长会议的职权分配大致相应，只是中央委员会各部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小一些。这些部门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相对来说更多的人员参与对统一社会党特别有影响的事务，如教育、文化、交流和外事。10 个部门同政府 30 多个部委相应负责经济事务。只有 3—4 个部门参与政府的一般事务，4 个部门是明显负责党的内务的。各部首脑均是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统一社会党专职官员的最高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有 10 名成员。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管理党的全部机构组织。领导人是总书记昂纳克。其余成员指定具体负责范围。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务，党的机关，农业，文化和科学，鼓动工作，贸易，妇女和社会政策，经济，宣传，还有国家安全等。

书记处成员的连任期很长，平均任期 16 年以上，而且除 3

人以外，其他人至少从1963年起就一直是书记处的成员^⑧。从职业出身可以看出书记处成员的一些专长。现任的5名书记曾经担任过共青团的高级领导职务，包括昂纳克在内。3名在党内负责过安全事务的工作。2名是通过做宣传鼓动工作被提升上来的。还有3名有过县和专区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经历。另外2名几乎一直都在经济计划部门工作。

中央委员会各部明显受书记处的领导，除此以外，关于书记处与各部的关系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然，各部人员调换频繁，而书记处的成员任期较长。10名书记掌握控制党的专职人员的大量权力。因此，他们支配着一个收集情况和执行政策的庞大机构。

书记处的权力首先表现在所有10名书记都是政治局成员这一事实上。

6. 政治局

如果说中央委员会是社会领导力量的缩影，那么，反过来政治局就是中央委员会的缩影。政治局共有25名成员，其中候补委员8人^⑨。他们代表党的领导组织、政府和群众团体。

党的官员占政治局的多数。书记处10名书记都是政治局成员。自1963年以来，经过实践考验，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人。政治局一直包括党的监督委员会的首脑。监委会是一个党员权利问题上诉的机构。还有两个专区（柏林和科特布斯）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是政治局成员。工会和青年组织的首脑也代表群众组织参加政治局，他们都做过党的领导工作。

政府官员是政治局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部长会议现有政治局成员7名，包括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其他一些成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机械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部长。后两名是新近增补的成员。有些令人不解的是政治局中还有农业部门的代表——新勃兰登堡专区农工联合企业的负责人。政治局最后

两名成员是人民议院主席和党报《新德意志报》主编，后者也是新近增补的成员。

对政治局选拔成员应该作一点说明。同书记处成员相比，政治局成员的平均任期要短一些，这一最高政治机构的人员调整也是很多的。因此，确定它的补充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体上说，可以有这样三点：首先，许多职位是依据职权补充的，这是共同代表制原则所要求的。书记处中资历较深的成员，部长会议中居首位的8名官员和工会领导人属于这一类别。这一原则还保证至少有一名妇女成员。其次，新任总书记需要把一些忠实的人安排在政治局内，以便维护体制的最高权力。在民主德国，由于这种原因而产生的变化，其程度同其他国家相比实际上要小得多。例如，一位新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就职，即使党派没有变化，随后总是要进行重要的人事调整。第三，政治局尚有早年革命时期的痕迹，那时它主要是一有纪律的通才群体，其成员不时地被派到其他机构的战略性岗位上，致力于保障党的统治地位。这种“派遣”原则是共同代表制原则相对应的一面。现在的政治局吸收成员，反映了这三种原则的综合情况。

7. 政治局与决策过程

政治局是东德政治体制中的最高机构，它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国家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的体现。政治局的全部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政党老将，他们已经习惯于特殊的权力和工作的重负。所有的人都承担着这样的基本义务，即维护党的领先地位的现存格局，首先是维护政治局本身的各种权力。在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人民的进步社会利益等一系列广泛的目标方面，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目标一致不象30年前那样意义重大。在共和国的早期，统一社会党的观点使领导者同社会其它成员形成分离。而今，大部分人已经认识了党的宗旨，党的目标已经得

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因此，党的领导中的共同社会价值准则不再是一种结合力。假设管理现代的东德社会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那么在特定的条件下，共同的社会价值准则的存在，比起确定各个目标的相对优先权所产生的分歧，也许不是那么重要。

政治局宣称对所有社会发展事业集体负责。当然，对许多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导组织来说，政治局实际上主要是一个权力象征。各个机构组织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但各自又有不同组织系统和工作的重点。政治局很少直接参与大多数机构的事务，相反，它通常要求这些机构主动工作，自我调节。

政治局每周召开会议，对所有社会组织的工作作出评价。有些列入议事日程的议题，如年度经济计划，定期提交会议讨论。而大部分议题是随时发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客观原因或者是行政和经济部门悬而未决所引起的。这样的议题可能包括苏联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东非的骚动对东德技术援助顾问的影响等等。处理这样一些问题，如西德游客增多，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者在外国新闻媒介中频繁出现，莱比锡可能出现工作中断，格外受到重视。更多的时候，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引人注目的，如怎样克服化肥运输不畅的问题，怎样解决农业部和粮食加工部之间的矛盾等等。补救行动通常有：对一项社会政策作系统的阐述说明；普遍推广大有影响的机构工作改进经验；指派某一政治局成员跟踪解决问题。一般来说，政治局行动试图坚持已经确立的指挥系统。政治局集体不愿意阻遏成员的个人权力。

在政治局之下，有效的管理主要产生于主席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和书记处领导下的中央委员各部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关系总是受党的机构左右，但这种看法根本是一种误解。归根到底，统一社会党的支配作用与其说是基于特定党的机构对其他部门官员的控制，不如说是基于党员担任所有社会公职这样的事实。一个政府部长（如教育、国防或外贸）总是“低于”党的领导组织中相应的一个官员，对此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这

样来阐述权力关系的特点，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样，设想政策完全由党的官员决定，而最高政府官员只是“执行”党的政策，这是一种谬误。

在国家一层，政府各部同党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合作，而不是对立。虽然一方侧重于它的监督职能，而另一方侧重于它的执行职能，但主要的政策决策，可能是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涉及到共同的政策领域，政府和党的官员就会进行合作。因此，教育部和中央委员负责教育的部门密切合作，保证学校教育资金的优先权。司法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政法部门同样会首先考虑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在民主德国，大部分政治问题都有社会优先权的调节问题，所以，政治争议往往使一方党政联合同另一方竞争。

这一过程可以用美国政治中类似的现象来加以说明。为此，可以在东德各部和美国内阁各部之间作个对比，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和美国国会常设委员会之间也作个对比。在两个国家中，后者机构都监督前者的工作。美国的教育部也常常同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合作，要求扩大学校教育支出。

在民主德国，各个“党政联盟”之间的政策争执，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得到解决的。每一次出现政策上的合作，都可以得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配合。问题争议的结果是趋向于意见统一，而不是趋向于对立，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争执过程并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当意见不可能达到一致时，必须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最后裁决。各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在一个问题上形成了对立面，这时，政治局就成为对立观点的公断人。

我们对民主德国的政策形成有了基本的认识，要使认识更充分一些，还必须注意到，主要的政策变为正式的法规，通常需要比较长的过程。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解决了争端以后，由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新的法规。然后，人民议院安排讨论程序，并提交全体与会者。在最后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新法规总是

在起草的党政官员指导下在人民议院通过，并且最终由他们负责贯彻执行。

8. 党和国家一体化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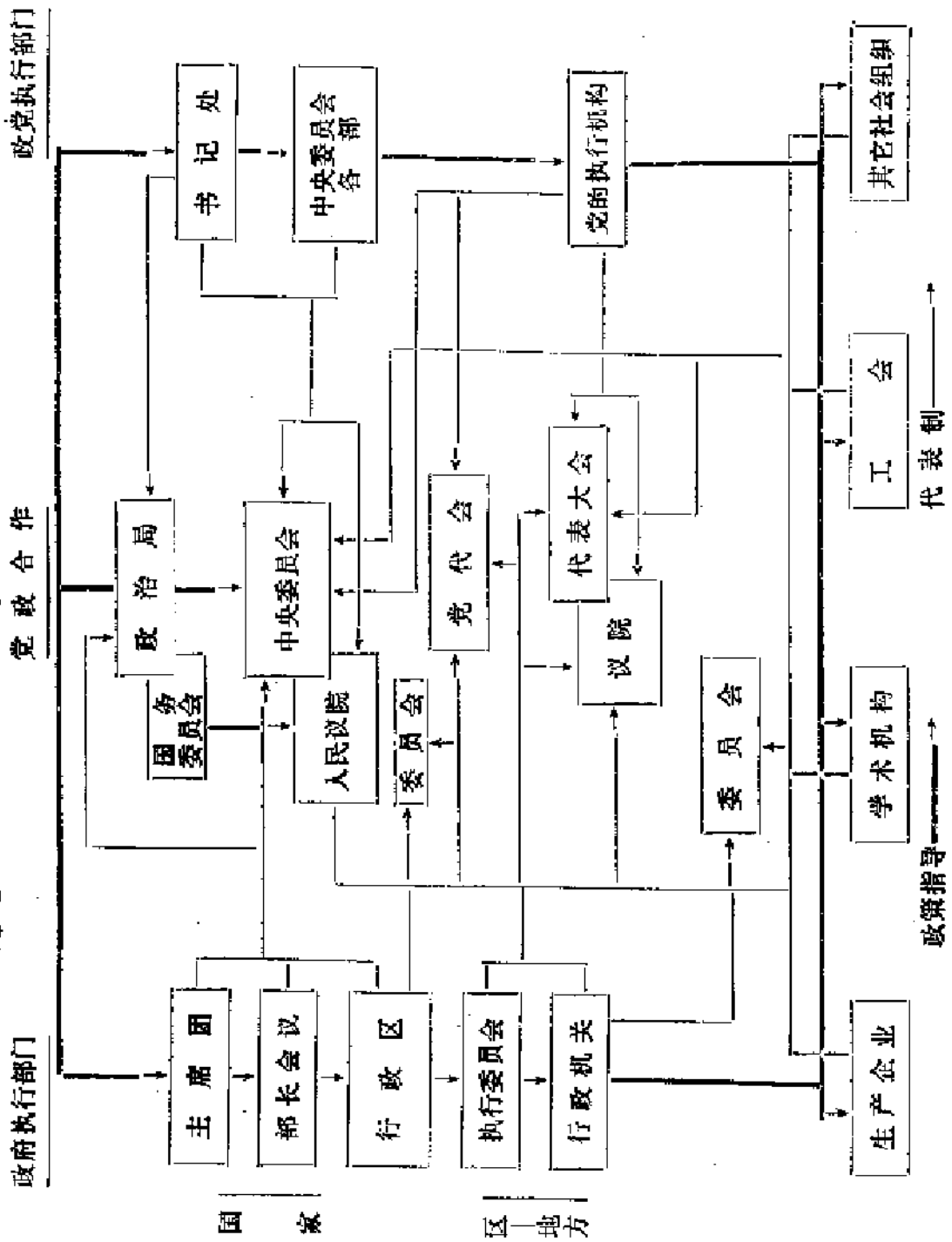
就这个问题来说，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统一社会党的存在及其领导阶层的权力浸透于整个社会。它的人事和社会化职权实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党的官员对政府和社会领导机构的监督、协调和干预，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这些职权尽管没有十分精确地执行，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政治事务的可断定性，这方面超过了其它大多数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统一社会党的政治精英设想和实施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在它的中心，是一个专门化和一体化的系统。这一系统在下面的图表中得到了反映。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图解，旨在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部组织结构中的主要关系。

图表中最底端是生产企业、学术机构、工会和其它社会组织（如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德国农民党）。这些组织构成了大多数人处理社会生活所处的背景，同时也是未来的领导者产生和成长的环境。这些组织的多样性，反映了人们的多样性，也反映了这些组织所起的社会作用的多样性。各个组织本身，往往体现着极大的内部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例如，工会联盟内有部门和区域的派别，其复杂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统一社会党的结构。

如图所示，经济、学术和社会各个组织，都是从四个方面同国家和政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所有这些组织都是依政府法律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法律和政策指导的范围内活动，这些法律和政策指导来自政府执行部门的领导组织。对规模较小层次较低的组织来说，政策指导是由市县委员会及其行政官员传递的。较大的组织和其国家一级的官员，从地区政府或部长会议得到政策指导。因此，国家直属的工业单位以及工会全国委员会，直接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



最高行政官员进行联系,通过它们自己的领导组织向下传导政策,越过中级和地方一级政府。当然,这种格局不是相互排斥的,信息交流会大量重复现象。

其次,经济、学术和社会所有组织,都在党的执行机构的总监督之下工作。由于各个组织必须按照各自的方式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所以它们的活动要受到党的官员的监督。地方、专区和全国性党的执行机构利用各个组织中的党员这一媒介,检查定期工作报告,指导工作,以便使党的工作真正适应于各种组织的情况。各个组织的政策指导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的,依组织的大小和级别的高低而定,同政府指导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社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受党政领导机构的政策指导所支配,所以,关于各个组织的相对重要地位,可以作这样的概括。一般说来,一个组织的职权越是具体,并且要较多地依靠专门知识去履行,那么,它从政府机构某一部门得到的主要政策指导就越多。相对职权比较分散的组织,主要依靠党的机构来领导。图表已表示出这种差别。专业化较强的经济、学术组织被置放在图表左边,更接近于政府机构。工会的职权类似于统一社会党,近乎是综合性的,把它同其它社会组织放置在图表右边,更接近于党的领导组织。

再次,社会组织同领导权力机关的联系,是通过“公众代表机关”体现的。市、县、专区议院和人民议院,图表都已标出。它们是双重中央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前一章指出的那样,全国阵线机构的作用是审查和协调各级议院的候选人。因为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全国阵线直接或间接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们在各级议院中都有代表席位。在低级议院里,社会组织的代表占多数,而在人民议院里,它们的代表占少数。地方议院和人民议院中其余的代表,来自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

最后,统一社会党定期召开各级代表大会,也存在着相互联

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代表大会几乎是同议院相对应的，因而，被列为双重中央核心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议院和党代表成员构成上有点差异：第一，非党成员可以被选进人民议院（大多数地方议院的代表是非党成员），而只有党员才能当选为各级党代会的代表，有资格参加中央委员会；第二，同议院相比，各级党代会把更多的席位分配给政府和党的官员，把较少的一部分分配给经济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代表。

虽然有各种交叉现象，但无论是各级议院还是党代会，都采取三重代表制，即各自包括政府机构的代表，党的机构的代表和经济、学术和社会组织的代表。有的时候，这些部门的个人同时可以作为议院的代表和相应的党代会的代表。这样，中央委员会各部的一些首脑，既是人民议院的代表，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同样，地方工会的成员可以参加市议院，同时也可以参加市党代会。结果，出现相当多的成员交叉现象，约占总数的1/3到1/5。

成员交叉有助于协调两个代表机构的工作。两个机构都不需要大量的时间，全体会议简短而又不是经常开。这样，不论是参加议院还是党代会，对于在其它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都是有帮助的。党和政府的代表机构，其意义不在于制定政策，而在于为其成员的非正式协商网络建立一个机构控制点，为表达比较重要的舆论提供一个论坛。

总的来说，这种相互联系而又交叉的机构复合，旨在提供一体化的政策指导，使社会生活各个组成部分都得以充分的体现。实践的效果自然取决于某些障碍的消除，其影响因时因地而异。领导中的自以为是，官僚主义专断行为，信息渠道不畅通，消极不合作等等事例，在党刊和各主要社会机构期刊上时有披露。但是，这些消极现象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社会全面一体化的支持和信心。

9. 小结

这一章篇幅较长，目的在于澄清人们对统一社会党领导作用的错误认识。诚然，统一社会党同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但在职权和行为上仍然有一些类似和可比之处。这足以说明统一社会党不完全是一个与其它政党相异的组织。

西方的观察家有时忽视对东德政治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断言“统一社会党决定一切”。这个断言当然没错。在社会所有领导岗位上任职的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因为党员遍及整个社会，所以，统一社会党必然参与具有社会意义的一切活动。

另一方面，把统一社会党说成似乎是一个单一的、一致的统一体，并不符合实际。至少必须看到，统一社会党的基层组织和正式领导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县、专区党的组织同国家一级党的机构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统一社会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的数千名党员担任了政府和其它非党机构的领导职务。

一旦认识了各级组织和各类党员中的差异，就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各级组织和各类党员中，关于短期步骤可以实现党的长远目标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从这一点上，可以对东德政治进行真正的研究。

〔注释〕

① 《民主德国的新纲领》，《德国文库》第9卷，第7期（1976年），第744页。

② 同上，第747页。

③ 见《“明镜宣言”与民主德国的反映》，《德国文库》，第11卷，第2期（1978年2月），第199—219页。

④ 《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议定书》，柏林，迪茨，1981年版，第133页。

⑤ 以下讨论主要取自格特·J·格莱斯纳和伊尔明德·鲁道夫，《知识的力量，教育政策、教育制度和民主德国干部培训的关系》，奥普拉登，西德意志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27—110页。

⑥⑦ 根据第十次党代会议定书资料推算。

⑧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科隆：科学与政治出版社，1979年版，第950—951页；又见《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议定书》，第183页。

⑨ 关于统一社会党结构的讨论材料主要取自《统一社会党章程》，柏林：迪茨，1976年版；又见《民主德国手册》，第946—950页。

⑩ 约翰尼斯·库珀和西格弗里德·库珀：《党代会的连续性》，《德国文库》，第14卷，第7册（1981年），第714—737页。

⑪ 《民主德国手册》，第1205页。

⑫ 同上，第715—717页。

⑬ 同上，第715—716页。

四、经济政策

民主德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简而言之，就是它不允许重大的经济活动由私人把持。应当指出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私有经济制度会产生异化现象，会剥夺工人劳动所应得的那分利益，同时会使政治权力变为社会不平等的保护伞。那么，当然而合理的结论就是：公有经济制度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先决条件。

原则上说来，公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一个特定的经济单位——一个工厂或农场，它可以属于自己的工人所有，也可以象在南斯拉夫那样属于地方共同体所有。在苏联模式里，如在民主德国，公有制意味着中央政府所有制。中央政府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人民“代行”占有，而事实并不是名副其实的。

民主德国中央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出于这样一个观念：国家从事着反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生死搏斗，为了防止失败，珍贵的国家经济资源必须统筹安排地加以利用。就民主德国而言，这种观念早已扎根于现实之中。紧邻西德并且面对着它的英美盟国，这些无疑对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形成了威胁。结果，在民主德国的领导层里（即使一般人不是这样的话）造成了一种同战时动员期间笼罩着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那种危机气氛相类似的紧迫感。

东德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逐渐地被中央政府吸收了。只有非常小的私有部门依然存在，这些部门主要存在于食品生产、手工业和专门的、个人的服务方面。有些人除了正常的政府部门的工作，还合法地从事私人经济活动。此外还存在着一个“第二经

济”，它是由商品和劳务的物物交换构成的，这里是计划和税收人员力所难及的。当这种活动偶而牵涉到盗窃公共财产和进行黑市交易时，它就是完全非法的了。但是，整个看来，民主德国的“第二经济”被认为小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大约 98% 以上的经济活动包括在国家计划之内。

与美国的间接财政金融控制体制或法国的指导性计划体制相比，东德政府实行的是中央指令性经济。这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基本分配、原材料的使用、商品生产的种类以及消费价格基本上不是供应与需求相互作用或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的结果。相反，整个经济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那些予以优先考虑的项目所左右的，这包括多少国家财富分配于生产和消费，多少钱用于发展特定的商品种类，每一类职工或雇员的收入应是多少。如此，民主德国的消费者不可能单纯通过自愿付出较高价钱这一方式来刺激录音机的扩大生产；录音机的生产量取决于中央计划决策中为该项目调拨的资源。同样，东德的工厂不可能单纯通过提供比其它雇主更高的工资来招收较好的工人；工资额是由中央机构规定的。

1. 中央计划过程

民主德国的经济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一个带有县和专区下属局的庞大国家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最高政治领导密切磋商，不断制定出完善的经济发展的计划；考虑物资和劳动力的使用效果；预测技术进步、外贸潜力和生活水平正常提高的需要。这些都体现在中期目标（5 年计划）和短期任务（年度计划）之中。

对于每个经济部门来说，临时计划指标按年度与国家计划分开并上报中央经济部门。在这里，计划指标再进一步分解并送达下级部门。

在中央部门下面有几种组织形式，第一种是联合企业，这是一种纵向垄断企业集团。推理而论，它包括所有从事相关的商品

种类生产的工厂(如汽车、照相机、电缆),其中大部分是为最终产品制造半成品的工厂。联合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单位出现于由“新经济体制”(1963—1967年)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是朝着纠正宏观经济不平衡所迈的第一步。这种不平衡产生于分权试验中经营自主权贯彻执行的不平衡。在互有关系的企业之间,联合企业为某些关键性行业提供更为密切的生产和投资上的协作,因为,主要权力是从企业经理到联合企业总经理这样自下而上地再分配的。在这一时期末,联合企业形成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到1981年底,大约130个联合企业已成为中央控制下的工业部门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第二种形式是较小的工厂和服务性企业,尤其象面包店这样的生产当地消费品的企业,其活动是与中央部门及联合企业相脱离的。不过,这样的企业要受“专区地方工业委员会”领导,而地方工业委员会又依次隶属于国家的一个有关部委。第三种形式是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它们受县和专区农业粮食委员会领导,而这些委员会同样也受国家的一个部门领导。

计划指标通过各层机构下达到基层生产单位。每一层次作出一项计划,都依对初步指标所需要的财力物力的预算为基础。工人通过工会的代表参与这一过程。原则上说,工人的作用在于能使管理部门增产节约,提高工人的收入。管理部门和工人的计划汇总在一起,通过部长会议再上报到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这里,计划的各种要素必须加以综合,初步指标和汇总来的计划之间必须加以协调,同时,“物资平衡”必须得到保证。物资平衡是最棘手的部分,因为它牵涉到决定全部最终产品所需要的物资材料的数量。也就是说,涉及到确定生产各个中间环节直至生产全过程以及原料生产和进口所需要的物资材料的数量。

一旦这个过程结束,部长会议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就向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议院提出扼要的报告。在考虑了党的高层机构的进一步意见后,国家计委就以平衡和指标的形式把各个经济部

门的计划固定下来。其内容包括对总生产的估计，对生产能力的投资和研究投资以及平均利润率的估计，对技术改造、工资、津贴、奖金、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利润税的支出等等。计划指标经过完善，下达到各级领导部门，正象前面提到的计划指标下达阶段一样。在基层，实际年计划还要进一步划分为各个生产单位的季度和月计划。

2. 企业及其领导人

所有从事实际生产的民主德国的企业，无论是独立的工厂、联合企业、国营农场或者农业合作社，都是合法实体。它们自己拥有设备并雇用自己的人员，它们签订合同购买供应品和服务，同样也销售自己的产品。它们能控告别人，也能被别人所控告。它们能收进自己的收入，也能支付自己的支出。它们创造利润，筹借资金，也交纳税收。在这些方面，民主德国的企业犹如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公司。

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是中央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东德的企业领导人是由中央经济部门挑选的。工资和物价是由中央决定的，财政税收的分配，投资和职工收入都被法律准则严格限制着。没有股票持有者和股息，没有企业间的销售竞争，所有的产品更新和改进都要经过中央批准，所有的经营管理决定都必须符合国家经济计划。当有必要处理紧急的经济困难时，经营管理权可由上级政府官员或党的官员接管，也可以由二者共同接管。

由于企业是在计划范围内履行职责，因此，观察家们便认为，民主德国的经济特征是“指令性的”。在战后重建时期，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中央当局的严密控制，这时说它的经济是指令性的，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中央作用机制已变得更为复杂、更为间接了。企业领导人的工作已不再是单纯执行指令。当统一社会党的各种目标实施于企业生活中的

时候，对之进行解释便进而成为企业领导人工作的一部分。这些目标中最重要的是在降低劳动和材料的消耗的同时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为此目的，企业的成绩是按照计划指标的完成情况来衡量的。原则上说来，计划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到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奖金及前程。完不成计划并不等于犯罪，而只会导致收入降低，前程暗淡和士气低落。

理想地说来，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应该是一个讲求效益的领导人，因为，奖金应由投入最少而产生最高的企业得到。但是，一个企业领导人也需要其它技巧。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会讨价还价从而得到较低的生产指标，那么，该企业计划的完成就较为容易（于是该企业得到的好处也就较大）。如果一个企业领导人能有把握得到一个重新修定的、优惠的产品价格，那么，该企业的收入就会更高。如果企业领导人能够迫使供应厂商及时地交付所需物资，那么，整个产品的产量就有了保证。如果签订合同的买方能被说服在购买较高质量的产品时搭配购买劣质产品，那么，销路就会得到改善。这样，成功的企业领导人们就必须力求结交上级机关并同其它部门的头头们进行创造性的“交易”。

另外，一个企业领导人必须能够以外交手腕去应付来自地方政府和工会的要求。一个大型企业的存在，对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和需要，都有着深远影响。企业的资金被用来建设住宅和补充政府的开支。市政府总是请求企业更多地花钱，但又力求防止企业的需要压倒地方群众的需要。如希望作出合理的运输计划，减少空气污染。为了避免同地方官市发生冲突，需要有老练和机智的头脑。

同样，企业工会有抵制企业管理部门的合法权利。国家立法为工人提供了查询管理部门某些决定、抵制任意解雇、免费工作培训、安全工作条件、取得与工作相称的津贴和工作地区的文化娱乐福利等等权利。与所面临的一整套已经很复杂的任务相比，企业的领导人也许把工会的要求仅仅看作是对自己有效地进行管

理的自由所给予的一个更为无关紧要的限制而已。既然旨在加强这些权利的主要是工会，那么，企业领导也就力图最低限度地去照章办事，一旦能说服工会的代表们——这需要通过个人名望和复杂而有技巧的争论——那么全体工人也许能够进一步屈从于更低的收入。

确实，企业工会、地方政府，甚至基层党组织都能向统一社会党上层提出主张和异议。事实证明，一个在完成计划方面有着良好纪录的企业领导人是很少害怕有人向外面的权威人物告状的。

3. 结构性经济问题

管理复杂的经济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对于统一社会党来说，这个任务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力量是全部期望中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关键。另外，经济活动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判断统一社会党统治主张的一个简单而又最明显的标准。

结果，经济管理成了民主德国政治中无孔不入的、予以优先考虑的事情。巨大的财力物力被用于对人民进行经济教育及对其杰出者进行管理训练。经济问题几乎在所有的报纸和政治讲话中都占压倒地位。国家的一些出类拔萃的人们研究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合理的刺激体系和合理的投资使用，可是，根本问题依然存在。下面的问题是民主德国自己的经济专家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问题说明集中指导下的经济所具有的困难^①。

计划的不精确性 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包括 8000 多个工业、农业和服务性企业，外加无数的政府机构。关于已往情况的报告是所有计划的基础，纪录资料保存的绝对复杂化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对每个企业来说，计划至少包括 30 项，其中许多要汇总到国家计委文件中去。在基层，这些资料极少是经过计算机处理的，因此，尽管可以设想提供报告的机关是没有倾向性的，但是，基础资料仍然有着导致差错的潜在可能性。

然而，倾向性确实存在于这个体制中，因为，企业在了解它们的资产，或者在报告它们的工作时，往往感兴趣于尽量把最好的方面摆出来。仅仅由于编制计划所要求的时间就足以使计划变得更为不确切。例如，1985年度的计划要在1984年里系统地提出，这个计划依据的是1983年的实际资料，而这些资料中有些还是不完整的。事实证明，到了计划的制订即将结束时再去修改那些基于估计的资料以适应现实经济活动是非常困难的。

缺乏短缺价格 民主德国的国内物价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反映商品的短缺和供需的波动。由中央部门确定价格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避免通货膨胀，“社会无用消费”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弊病的一种手段，但经常使经济效益难以估算。到了试图用价格来反映生产成本的程度，而生产成本的变化往往又过时了。除此之外，确定和计算成本的方法随着竞争的政治和经济标准的变化而变化。结果，久而久之，商品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显著的分离。

尽管口头上强烈地赞成把国民经济重点转向更有效率的（也是更能获利的）部门，但是，价格体系的僵化和差异使得相对有效率的经济预测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例如，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可以停止生产钢材，用省出的财力物力生产较高级的金属，再用较高级的金属换取波兰的钢材，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好处。这样做的关键当然取决于对钢材生产的效率和高级金属生产的效率的相互关系的仔细分析。但是，这种相关效率的分析离不开对生产要素的实际成本所进行的精确计算。有时，也确实进行过这种结构性转变，但往往由于太晚和太无计划而未能在效率上产生预期的好处。

价格问题也干扰了企业经理和联合企业总经理为追求企业最佳成就而做的努力。以往的改革常常把利润作为企业行为的综合衡量指标，作为补贴收入和管理人员职业升迁的主要标志。而有能力的管理人员需要在不真实的国家价格的基础上估测获利的可能性，最大利润的取得往往是通过扩大商品生产——这是政府不

希望的——和增加原材料消耗——这是政府所要控制的。由于无法使全部价格反映最新的市场关系以及不愿对市场力量放弃价格控制，政府只好通过制定无数额外的经营管理限制（更多的计划指令），在衡量企业行为时把利润降低到次要地位，来防止生产上的畸变现象。

原材料的浪费 国内自然资源的枯竭，进一步开发煤及矿产品的艰难及由此导致的开采成本的增加，世界原料价格的上涨，这些意味着民主德国象所有其它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一样，面临减少生产中浪费的紧迫需要。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地告诫人们要节省资源，但是，相比之下，东德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在许多对基本计划补充的指标中，有微不足道的财政支出用于鼓励减少原材料的耗费。然而，生产的增加要比原材料更有效的使用所得到的好处大得多。因此，这种体制实际上是鼓励浪费。除此之外，不存在短缺商品的价格的自由浮动，意味着企业的某些原材料的成本有可能和世界市场价格严重脱节。在某些情况下，生产企业发现使用短缺的但却是人为地压低了价格的材料要更合算些，甚至在有大量材料可被替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东德的生产厂家并不急于象西德资本家那样转向使用某些合成材料，比如在消费品方面就是这样。

人力的浪费 民主德国的工厂有两个很好的理由保留超编工人。第一，有影响的劳动立法保护工人不被随便地解雇。在这里，至少工会常常坚持，申诉不满的程序应予以遵守。如果某个地方被证明可以减少劳动力，那里的用人单位仍要负责安排新的工作，需要的话，还要负责工人们为适应新工作所需的再培训。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一样，东德的工人用不着负担结构性失业的包袱。资本主义的瑞典实行的也是全面待业政策，但其费用的很大一部分由保险和政府系统来分担。相反，民主德国的政策性亏损却由独立的企业承担。因而，在工资名册上保留着额外

工人，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了。第二，民主德国繁重的供应系统偶而会使原料交货推迟，从而耽误生产时间，这就需要随后加速生产以便完成计划。当企业拥有后备工人时，就能更好地实现阶段性的突击生产。在正常生产时或生产淡季，这些后备工人必须被看作是就业的。从整体经济角度(而不是从企业角度)来看，这种状况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面对东德长期的劳力短缺，这种人力浪费具有讽刺意味。(保管和看守工作、修理工作和其它服务行业中“暂时性”劳力短缺已成为常规现象，甚至可持续数年之久。)1966年以来，劳力短缺现象已经部分地由外籍工人所掩盖(这些外籍工人大部分来自波兰、越南和匈牙利)，这是一项与联邦德国“外籍工人”政策出奇相象的政策。随着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外籍工人在民主德国劳动力中所占比重降到了6%^②。

资本生产率低 资本生产率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与由这些投资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比率。当投资费用超过新产品产量的价值时，对新的生产能力投资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在民主德国，当新增产品的价值被过高估计时，或者当由于没有计算建设中的延误以及设备费用增长而过低估计了新添设备的费用时，上述情况就会出现。计划投资的资源(如主要生产设备和人力)被“暂时地”调拨去支援其它某个落后于计划的企业时，就会出现延误的情况。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象在苏联那么严重，但是，基础设施及设备的利用不足，是东德资本生产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近来大大压缩了新设备投入使用的计划指标，并且强调对现有企业的现代化的投资，而不是资助新建项目。

增长的不平衡 在60年代中期和后期，企业计划的安排目的在于更为重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这个重视是与扩大企业领导人的自主权的实验是一致的。对于那些领导才能高，商品价格有利，或者一直有大量投资的企业来说，这个实验使它们从条件不

大有利的企业那里吸引紧缺供应品和较好的工人。由于这些高利润企业集中于高技术的工业部门，所以，它们的增长速度加快，而其它企业却落在后面。最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终于变得明显了，这种不平衡的增长使整个经济发展速度慢了下来。

在乌布利希领导的最后几年里，对最大限度的利润已不再强调，中央部门重新掌握了更多的投资权。新投资集中在被称作“结构限定的工业”部门，这些行业大部分还是高技术领域。结果又一次造成了后果相同的不平衡增长。

忽视基础结构 从广义上解释，这些不平衡的一个特别原因是持续地忽视经济的基础结构。这包括不够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商业立法体系以及(按发达的工业化经济标准来看)与此相关的通讯传播和信息资料处理领域的不利条件。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相对地忽视了运输系统(尤其是汽车运输)和能源、供水系统的发展。单是这些缺陷就足以造成大量的上述浪费性投资。比如，许多例子表明，由于电力不足，新设备的能力只能部分地得以发挥。

技术革新缓慢 1963年以来，民主德国把经济发展同“掌握科技革命”联系起来。科学技术的概念有时被广义地解释为包括管理“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但是，它在生产革新和改进生产方法上，尤其是在农业、化学、冶金、工业激光使用以及其它高级尖端技术领域，运用得最为广泛。

大部分研究是由中央投资并组成专门机构来进行的，这些机构已经由于未能在与生产相关的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而受到批评。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出资进行的比较独立的专门项目研究，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最近，向大型生产组织——联合企业——的转变已经使专门研究单位转属独立的联合企业成为可能，研究机构归经理领导，并作为联合企业整体运行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予财政拨款。

这样的非集中化措施不会有助于克服生产企业已形成的阻抗

转向新的生产方法上来。创新就要冒风险，新工艺的采用意味着在短期内减产，因为设备是现代化的，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发现和解决。由于计划重点在短期指标上，所以这样的减产就意味着失去奖金和其它福利。一旦新工艺成功地运行，由中央决定的价格就会以现有生产成本为基础制定起来。在有些情况下，会在头三年里为新产品安排一个有节制的价值附加值，但是，用老方法扩大生产仍然常常比采用新工艺和新产品能得到更多的奖金。

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央贸易体系所提供的贸易保护使民主德国的企业有可能阻碍技术革新而不受外国竞争的惩罚。当然，僵化的中央价格体系则是更为深刻的因素。

使用“机器人”是通过自动化生产节省劳力的技术革新方式。这个变革有其自身的抑制作用，因为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减少会导致较低等级的管理工资和削减一定企业的拨款，而这些又会导致压缩就业人数。

不明确的权力划分 在争取更大的经济成就的不断努力中，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从未就决策权力的正常划分达成过一致意见。问题涉及到如何最好地在以下三套关系之间划分权力：（1）部长会议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经济部门之间；（2）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计划的人和部长会议中负责经济和官员之间；（3）部长会议、中间层次（联合企业、专区委员会）同生产企业之间。

在第一套关系中，即在党和政府相互作用的国家这一级上，已经可以看出中央委员会经济部门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干预在逐渐减少。但是，这个改进并非是持续不断的。党的最高机构的特别干预还不时发生。在诸如农业和零售贸易这些麻烦的部门尤其是这样。党的较为全面的干预适合于重大的经济改革；这一点在1961至1965年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主要的经济部门或多或少地直接从属于统一社会党书记处。但是，从1965年开始，往常的经济部门形式又恢复了。它们的权力在1972年的部

长会议全面改组中得到了加强。然后，又通过 1976 年的人事变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正如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现在的部长会议主席团是经济计划和行政官员的有威望的集体。

随着统一社会党经济书记巩特尔·米塔格的离任，党的机构已无法在专长和资历上与部长会议主席团相匹敌。虽然党政通过非正式联系和政治局会议仍能保证紧密合作，但是，已经出现了责任划分的迹象，在这当中，部长会议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掌握了较大权力。

在第二套关系中，计划制定者和行政官员的关系在昂纳克领导的头几年曾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那时，对以前经济政策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党的领导人对他们那“控制论的”社会观念变得过分钟爱。按照这种批评^③，乌布利希和他的伙伴们以其理论创新的热情说服他们自己：国家经济已经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一个“控制论的”体系，因而，为了让经济体制获得成功，只需塞进适当的经济指标就行了。这个观点导致了计划活动和经济管理之间的尖锐分歧，因为，根据这个观点，计划制定者不许干预不断发展着的经济活动。

在昂纳克看来，乌布利希“控制论的”想象是一点都不现实的。它没有考虑到不可避免的发展不平衡，并且妨碍了及时的补救性的干预。早先强调的体制概念——“新经济体制”（1963—1967 年）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68—1973 年）已经消失了。今天，在民主德国只提“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早先提到的“计划和管理”任务现在已经变成了“管理和计划”任务，这反映了计划要统一和服从于中央指导下的各级领导原则^④。

第三套关系，涉及三级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国家基本的经济问题许多可以归咎于权力过分集中。事实上，1963 年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努力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在管理决策上给联合企业和基层企业更大的自由。

但是，畸形增长的出现终于导致 1968 年和 1970 年中央控制的卷土重来。

计划僵化的问题依然存在。最近迅猛地发展联合企业，就是一系列寻求理想的地方机构形式的一种尝试，这种机构能够把决策权力和实际管理结合起来。

组织上的不稳定 考察了民主德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缺点后，人们对这点不会感到吃惊，即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在最近 20 年里，经济管理一直受三次重要的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每次改革都未能圆满完成，每次改革都带来了某些新的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到发展顺序和决策权的划分的问题。另外，调整时期的特点是计划指导和刺激体系几乎不停地变动。企业领导人无法根据一年的情况确切地知道到下一年他们的成绩会怎样得到评价以及奖金会如何计算。

培养新的经济管理学院的学院发现，它们的许多课程在学生们结束对它的学习后就变得陈腐过时了。工会的学院曾设想培训工会代表，使他们起到同企业管理人员协商合作的作用，但也因改革的复杂性而告吹。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这种混乱全都应归咎于一种形式主义。管理部门、工会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力求尽可能好地遵守正式规定。企业经理准备年度计划；工会准备“相应的计划”；基层党组织则召集所有规定的会议。既然只有从事这活动的人中的少数几个人对这些活动的后果拥有影响力，那么，这整个活动就缺乏意义，就只能取悦于更高权威们而已。在形式主义的外表之下，所有的参与者都力图使企业的实际状况保持不变。如果墨守成规不可能取得进步和大的好处，那么，它至少可以避免走上一条航线不明的改革之路。

也许，昂纳克领导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结束了狂热的、有点过于幻想的经济改革。70 年代以来，经济管理人员享受了相对的组织稳定状态。中央计划变得更为谨慎，也更为现实。虽然现在的

政府似乎经常公正而直接了当地提到上述许多问题，但没有一个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⑤。国民经济效率仍然因价格僵化而受到损害，管理任务也仍然由于许多不相容的计划指标而变得繁重不堪。经济体制也许正在更有预见性地发挥着作用，但是，某些方面进一步改革的需要仍然是很明显的。

4. 环境方面的难题

民主德国目前经济方面的许多困难可以归咎于中央计划管理体制的缺点，但是，另外一类问题则与之无关。适应自然环境和调整世界贸易这类永久性因素，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忧虑，这些忧虑加重了结构性问题，并且同时也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象其它工业化国家一样，民主德国也已经切实意识到了自然环境的恶化^⑥。现行的宪法把环境保护规定为国家的一个目标。1971年成立了环境和水资源部，这个部有着广泛的协调权力，它是“经济内阁”，即部长会议的一部分。乍一看来，民主德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这项工作仍然是分散的，而且投入的人力物力也不够。

水污染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主要因为可以利用的水量按人口平均计算要比欧洲平均值低30%^⑦。东德的资料说明，他们水资源的消耗率是所有工业化经济国家中最大的。大部分水被消耗于工业用途上。多年来，工业废水一直被排入河流中，特别是在哈勒、莱比锡和马格德堡专区境内更是如此，那里是化工企业集中之地。这种情况毁掉了大量的淡水渔业资源，并给饮用水供应带来危险。按照规定的使用标准，只有17%的水能被用于饮食。另外，盐碱污染已经顺流而下，毁坏了邻近的联邦德国的农业。在汇集到波罗的海的含有硫化物的废水中，也有民主德国的一份，这废水造成了毁灭渔业的后果^⑧。

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资料就一直认为，肺癌和呼吸道

疾病死亡的大幅度增长与空气污染有关系。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还毁坏了建筑物、谷物和森林，在科特布斯和马格德堡周围尤其如此。工业生产是罪魁祸首，而水泥、煤炭和采矿业又是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主要依赖国产轻质煤以供家庭之用，这样，在每一个城市中心都有大量的烟雾生成。汽车排放的有毒气体是空气污染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⑥。

在民主德国，由噪音引起的听力损害是最常见于报道的职业病。城市居民最常抱怨的是噪音污染，他们忍受着在修建得糟糕的街道上那繁忙的交通带来的噪音。医学研究已力图证实噪音过大的机器，隔音不好的住宅和普遍的城市拥挤给人们身心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露天采矿也是导致环境毁坏的原因，这主要发生在煤藏丰富的东南部。这种采矿已经使优美的景色和娱乐场所、大面积农田和森林遭到了破坏。要恢复这一切将是缓慢和代价沉重的。

虽然民主德国先于许多邻国颁布了法律和条例来对付环境污染，但是，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环境和水资源部负责制定允许污染的最大极限和防止污染的指导方针及准则，还负责卫生、劳动保护、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和其它经济部门的协调工作。然而，环境和水资源部必须依赖其他人来执行其新方法并加强反污染法规的法律约束力。

在1971—1975年度的计划中，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水的储存和净化，煤矿用地的采后再垦植，清理禁占场地，以及一些长期试验和研究项目的投资。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一个追加的环境规划中。这种特别的关注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显著地减少了^⑦。原料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使生产成本大为增加。这就加剧了工厂使用过滤和水的循环利用系统的困难，这些系统使生产速度降低并消耗额外的能源。同样，进口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加重了政府财政的额外负担，结果，用来支助和检验反污染措施的财力就更少了。

在开初的一阵热情冲击过去之后，生态科学发现自己再度处于冷落地位。由于无法用文献资料来证明环境变化的社会代价，生态学家当时被认为是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人。环境保护很快就落后于其它工作，因为那些工作的成果可以按国民收入来计算。

5. 全面经济变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现在东德这块土地，在与德国其它地区或外国的商业来往中输出自己一半以上的产品，并输入自己一半以上的消费品。战后德国的分裂，加之产品强行输往苏联，使贸易格局大为混乱。国土的狭小，原料的匮乏，以及历史上生产的重心是工业专门化，这些都要求大量进行对外贸易。

今天，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居第15位，按人口平均的对外贸易额计算在东欧集团中是最高的^①。对外贸易的国内意义可按出口率(出口货物占国内总产品的百分比)来衡量。70年代末期，民主德国的出口率超过了25%，这同联邦德国大体相当^②。这个出口率低于匈牙利和波兰，但却大约是苏联或美国的3倍。如此大量的对外贸易意味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规划直接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从50年代中期到大约70年代，世界原料和成品的价格结构特别有利于有着强大工业基础的国家。相对充裕的原料意味着低落的价格，然而，对重要工业品和消费品需求的迅速增长又使其价格随着销售的增长而扶摇直上。与西欧邻国相比，尽管东德在这个优惠的价格结构中的受益是有限的，但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由于国内经济的间断状态和紧张状态，民主德国没有多少潜在的剩余产品又进入新的国外市场。通常，现有的和即将生产出的剩余产品都已被指定要出口到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即使进行这种贸易，世界价格结构对东德还是有利的，因为，它主要是出口制成品和进口原料。在社会主义集团内部，欠发达的国家反对把自己刚获得的独立纳入民主德国的轨道之中。地区性经济组

织——经互会安排了大量专门协议，在这些协议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常常着重于用初级产品换取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工业产品。罗马尼亚提出反对这样做，理由是这样的安排将会使某些国家的经济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它带头抵制了苏联与民主德国使东欧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企图。

尽管最初东欧贸易的价格对民主德国是有利的，但是，长期价格协定使社会主义集团的很多贸易与世界市场价格的进一步变化隔绝了。在60年代初，世界价格的变化更加有利于工业化经济。这样，东德发现扩大的东欧贸易是一个有保证的市场，但是，占有这个市场要以放弃世界市场贸易中的更有潜力、更大的利润为代价。

这样的安排非常合乎大多数民主德国领导人的胃口。同欠发达国家贸易的潜力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由于这种贸易要求从有限的国家预算中筹措到可靠的信贷。同工业化西方进行的贸易常常由于民主德国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受到妨碍。妨碍同西方进行贸易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东德的领导人害怕西方国家用政治操纵贸易关系来努力削弱统一社会党的政权，这是一种在过去许多情况下西德曾经屈从过的一种诱惑。

到了1963年，在围绕“新经济体制”进行的广泛讨论中，提出了关于对外贸易在民主德国经济发展战略中作用问题的不同看法。扩大同西德的贸易，目的是想通过同国外产品的竞争来推动技术革新和获得新技术。为了维持更为长久的生产发展和用于新的开支的年度收入的增长，贸易的全面增长就是必不可少的。

一般说来，更为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允许有限制地实行这个方针。从1960年到1975年，东德的对外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7%，高出国民收入增长率一倍还多^⑧。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同工业化西方之间的贸易，从民主德国整个贸易额的19%跃升为27%^⑨。

总的来说，给国内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比预料的要少些。东

德没有能力使内部生产组织同新购置的工业生产资料充分地结合起来就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结果，例如在民主德国的工厂，进口的西德机械对劳动生产力所起的作用大大小于同类机械在西德工厂所起的作用。

另外，民主德国对进口西德工业生产资料依赖的增长使自己的经济直接面临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的某些最坏影响。大约在1968年以后，有利的世界价格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许多原料价格开始比成品价格增长更快，于是，20年以来的趋势逆转了。这一转变促使1972—1974年间的农产品、工业原料和石油价格猛涨。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集团的贸易协定起了缓冲作用。东德进口原料和能源的大部分来自与之有长期价格协定的苏联和东欧，而这些协定总是在耽搁地反映世界价格。就石油而言，这种有利的耽搁在1975年明显地减少了，当时苏联强迫社会主义集团其它成员接受一个能密切反映世界现行价格的新的价格协定。

然而，民主德国以间接的方式受到了更大的冲击。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反对几个西方国家而进行的石油禁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油价格大幅度地上涨，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导致了更高的生产成本和普遍的通货膨胀。目前同西方贸易关系的扩大使民主德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作为反应，东德的公司减少了它们对西方工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但是，为了从以前购买的机械中获益，就需要加速主要依赖于从西方进口的矿产品和化工产品为原料的商品生产。这些项目和消费品进口价格的上涨给东德的经济以全面震撼。

虽然在1974年以前的10年中，民主德国的贸易通常都有着一定的顺差，但是，全球性通货膨胀很快使民主德国的贸易在1974年出现了赤字。象其它东欧国家一样，东德能够保证从西方财团得到贷款作为支付进口西方技术、消费品和从世界市场短期购买石油的手段。在全球性经济衰退加深的时候，民主德国把

进口的技术转化为增加了的出口，这样的成功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还需要提供支付从西方市场进口原料以及增长着的美国谷物进口的保证。到1981年底，民主德国的西方货币外债（不包括欠苏联的）已超过86亿美元^⑥。按人口平均计算，这些债务甚至比极度恶化波兰经济危机的赤字还要高。幸亏断然和大力压缩第二年的进口，才使一场严重的偿付危机得以避免。在波恩政府的鼓励下，西德银行家们率先于1983年春给民主德国安排了大笔新贷款。

6. 经济实绩

集中经济管理的复杂，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竭尽，伴随着对外贸易条件的变化，所有这些都给民主德国稳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带来了严重障碍。其中某些问题与工业化自由民主国家目前越来越多地遇到的问题在主要方面是相同的。这些国家都在各自寻找政治上能够接受的、表明政府有责任影响经济行为的方式。

虽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几乎无限纷繁的数据资料来衡量，但是，任何对经济成果做出评价的企图都可能是盲目的。盲目性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只能选择为数不多的指标和参考点。例如，一个经济可以通过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资本投资的周转来评价。如果经济活动可以如此理解而不是归结于它本身，那么，国民经济就应该可以通过它的保持“适当的”积累与消费平衡的能力、为公民提供“满意的”生活水平的能力、或是促进社会平等的能力——一切高尚的主观标准来判断。

当人们在可选范围广大的指标中挑出几个指标后，仍然需要把国民经济同某些参考点相比较。“好的”经济情况是相对的。相对于什么呢？所选择的参考点不同，做出的评价将会大不相同。今天的民主德国可以和自己以前相比较，例如，可以和1939年、1946年、1960年时相比较；也可以同任何与其面积或自然资源

状况相当的国家比较；又可以和经互会其它成员国相比较，这些成员国在主要的经济、政治特征上与之相同，但在其它许多方面与之不同；还可以同自己的西欧邻国相比，民主德国同这些国家的文化及战前工业发展水平是相同的，但其现有的政治经济特征及国际联系又与这些国家明显不同。

正如所料，没有哪个国家同民主德国在经济环境方面是真正可比的。再者，所有进行数量比较的努力都会受阻于国民统计资料(如国民生产、总投资、公众消费)中基本概念的定义不一致以及用以转换为可比条件的有效资料的缺乏。尽管外国经济分析一般认为民主德国的统计资料的差错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公开发表的民主德国的报告系统地删去了有关收支平衡和受国内消费品进口冲击影响情况的重要资料，这些年来，对其经济的精确评价变得更加困难。

形成可比资料的一次最全面的努力已经通过“东、中欧国民收入研究计划”着手进行。该计划的报告提供了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见表4—1)。按照这项计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所有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中是最高的，略微高于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⑥。在非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中，民主德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分别是美国、西德和日本的四分之三，大体上与英国相同，大约高出意大利四分之一。

1965年—1980年，民主德国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1%，与东欧的平均数大致相同，但明显高于美国的2%的记录^⑦。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时间里，日本和几个主要的西欧国家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率。很清楚，人们对这些成就的满意程度要取决于他们的参考点。

了解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总水平，也就不会对其增长了国民生产总值中大部分来自工业部门，特别是能源、化工和电力部门感到惊奇了。同时，增长率最高的部门是个人和专门服务行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国民生产总值中来自政府行政管理

和公用事业的产值略有下降，而农业产值则明显下降。到了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形成了如表4—2所示的轮廓。

表4—1 1965、1982年东欧和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按1981年美元的不变价格计算)

	1965年 (美元)	以美国为100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1982年 (美元)	以美国为100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美 国	9 344	100.0	12 436	10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6 086	65.1	9 898	79.6
捷克斯洛伐克	6 356	68.0	9 028	72.6
罗马尼亚	2 355	25.2	4 403	35.4
匈牙利	4 168	44.6	6 091	49.0
波 兰	3 569	38.2	4 866	39.1
保加利亚	2 413	25.8	3 963	31.9
整个东欧	4 126	44.2	6 159	49.5

资料来源：萨德·奥尔顿等，《东欧经济增长：1965、1970和1972—1982年》，纽约，国际金融研究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表4—2 1980年六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

	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	捷克斯 洛伐克	波 兰	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	英 国	美 国
农 业	13.7	16.1	24.4	2.8	2.5	2.8
工 业	43.5	39.1	33.6	40.7	30.6	29.0
建 筑 业	5.3	8.6	6.3	6.0	5.7	4.4
商 业	8.4	8.7	6.3	9.6	8.9	17.9
运 输 业	8.4	7.1	8.3	6.0	7.4	6.5
服务业及其它	20.7	19.8	21.1	34.9	44.9	39.4
总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摘编自萨德·奥尔顿等，《东欧的经济增长，1965、1970和1975—1980》，纽约，L·W·国际金融研究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1—14页；联邦统计资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1979年》，斯图亚特，W·科尔海默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702—705页。

该表是以每个国家的现行物价为基础计算的。如表所示，民主德国居于它的东欧邻国和西欧邻国之间，前者侧重于依赖农业，后者则有着更强的服务行业的倾向。但是，（西柏林）德国经济研究院的赫伯特·威尔肯斯坚决认为，由于不同的价格关系，这种比较会令人误解^⑩。民主德国服务行业相对较低的工资及其明显地较高的农产品国定价格会造成对实际情况歪曲的反映，对这些歪曲进行修正后，可以看出，民主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显示出与联邦德国非常接近：服务业上升为大约 25%；而农业则降至 4%。如果按照资金和劳动力的有效使用来评价民主德国的经济成就的话，这样的修正是很关键的。

正如可以料想的那样，对民主德国经济所做的最详细的分析，都已涉及到了与联邦德国的比较。这些比较展现了在国民经济执行情况方面二者的许多相似之处（如表 4—3 所示）。但是，美国和英国的观察家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轻易凭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如表 4—2 和表 4—8 所指出的那样，西德的经济结构在许多重要方面，包括更加依赖于工、农业生产部门和更高的年

表 4—3 四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使用情况(%)
(1976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英 国	美 国
个人消费	45	55	60	65
国家开支	29	22	22	19
投 资	25	21	19	17
净 出 口	1	2	-1	-1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摘编自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英格兰，威斯特米德，萨克逊·豪斯出版社 1979 年出版，第 97 页；联邦统计资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 1979 年》，斯图加特，W·科尔海默出版社，1979 年出版，第 702—705 页。

投资率，不同于美国和英国。

同西德、美国和英国相比，民主德国在个人消费方面投入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要少得多，而与此相对照，却在国家开支和投资方面投入了较大份额。正如要在下一章中说明的那样，应该对这种明显的数字差距做出某种解释。原则上说来，东德国家开支配额包括了许多在西方国家是直接由个人收入来开支的项目，这样的事实要求对那种明显的数字差距做出修正。民主德国较高的投资率反映了一个事实：任何重大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通过增加就业来实现。民主德国的人口增长是极低的，有工作的人口的百分比（就业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没有未加利用的潜在劳动力了。于是，经济计划者们必须依赖于增加对生产力的投资，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组织的效率来获得经济增长。

德国经济研究院估计 1960 年到 1975 年民主德国的经济只增长了 6%，这是因为劳动力增长的规模太小，大大低于世界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要求投资添置更好的机器和设备供工人使用。经济增长的 36% 是依靠替代劳动力的那部分投资，还有 58% 是依靠广义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可以包括从新的生产工艺流程的应用到各种减少原材料浪费，消除人力未充分使用状态以及减少机器闲置时间的措施等方面的内容^④。

这种增长因素的分布同人们在较为发达的西方经济中看到是相似的。结果，民主德国近来在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生产收入与资产的比率）两方面都有了提高。在这两个方面民主德国同自己的西方邻国相比显得有利。但是，这种有利的估价仅仅适用于汇率，而不适用于实际水平。应当强调的是，与西方工业化经济相比，民主德国的经济长期受困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的实际水平。虽然目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民主德国的中央价格体系及有缺陷的管理刺激体制一直未能阻止较大的劳动力浪费和无效投资的趋势。

民主德国经济成就和缺陷的全部纪录就是在各个相互依赖的

部门的作用下发生的各种变革的纪录。除了要尽力解决总产量、生产率和劳动组织效率等一般问题外，民主德国的经济计划者还要进行探索，以便在若干种相互有关的活动确定和实现最恰当的平衡。一项部门发展的调查描述了这种努力及尚待完成的任务^②。

机械制造和机动车辆 这个部门的产量占全国工业总产量的25%，而该部门的工业资产仅占工业总资产的17%。这个部门的生产包括机械工具、农用机械、化工成套设备和其它工业品。因此，它的生产情况对整个工业生产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其它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一样，民主德国这个部门的资金生产率也经历了一个轻微的下降过程，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下子过多地开发了新产品。通过对重要的西方技术的有效利用，民主德国加强了自己在东欧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业品供应者的作用；但是，这项战略也仅仅使它只有作为整体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地位。这个部门拥有工业劳动力的30%，它仍然是民主德国工业的最大部门^③。

电子和电气制造 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就是电子部门，它已经超过了化学工业而成为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劳动和资金投入的增加已与生产率的良好增长同步起来（至少按民主德国的标准是这样），这个部门显示出了特别与众不同的成功。如果实行更为全面的轮班工作制，这个部门将能够达到高得多的资金生产率，目前，该部门在这一点上落后于其它工业部门。特别高的妇女就业率是电子工业的特点，由于妇女们过多地担负了家务，而这个部门又不能提供舒适愉快的工作环境作为报偿，因此，会阻碍促使工人上晚班和夜晚的努力。

对这个部门格外的政治关注使得电子工业面临的双重压力变得明显了。首先，电子工业尤其是微电子工业的发展是决定民主德国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已争得的工业用品、耐久消费品和信息处理设备市场，由于民主德国的生产者未能坚持转向小型化而受到

损害。这个部门50%的产品旨在出口^②。这是压缩国家对外贸易赤字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国家经济计划人员期待着电子工业在这个五年计划里获得巨大收益。国家设想在1985年自己满足微电子组合元件的生产，这些元件能够加速各种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并因此而节省能源和人力。预计在这个五年计划里，大约25%的增长额来自电子工业的成果^③。

化学工业 在战后时期，东德的化学工业发展极为缓慢。早期热情发奋地努力的成果（因巨大的施韦特精炼厂而显得格外突出）大多被用于开发这个部门的出口潜力。医药、化肥、农药以及工业化工材料的自给经常受到石油涨价的威胁。由于更多地用进口化工产品替换下国产化工产品要付出昂贵花费，结果某些生产线在生产率降低的情况下也保留了下来。因为用于投资的资金有限，民主德国现在选择了跳过某些化工生产的早期阶段，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口化工材料半成品的做法。70年代，这个部门获得了可观的投资，目前，以尽可能高效率地利用这一生产能力自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冶金工业 这是又一个由于战前德国工业地区性分布不平衡而被严重忽视了的部门。于是，迅速扩大钢铁生产对于保证民主德国最初阶段的发展是必要的。最近，由于进口粗钢已变得更为可行，钢铁工业已经转向生产更加特殊的品种。这样以来，就要求再给予新的投资，同时，也面临了跟上快速发展的技术革命的挑战。虽然这个部门的增长低于工业平均增长，但是，它适应目前经济发展要求的能力是电子工业、建筑业和消费品工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消费品生产 尽管近来的政策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家具、体育用品和其它日用商品的生产增加了，但是，消费品工业仍然未取得显著的增长。对这个部门的投资一直低于平均投资水平。不过，纺织业除外，因为转向合成纤维生产增加了纺织业的出口潜力，所以，这个工业得到了一些重视。该部门就业水平

的明显下降已超过了自动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和纺织品生产增长带来的新的就业所能抵销的程度。食品工业受到了较大一些的重视，同时，它目前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已接近于整个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但是，长期以来对它的相对忽视几乎没有消除。

能源 持续性地不能满足动力和燃料的需要已经成为阻碍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将近80%的电力是靠褐煤发电厂提供的^②。虽然褐煤比其它燃料效能更低，污染更重，但它在民主德国相对来说还是很丰富的。进口的无烟煤，水电和核电站提供了剩余部分的电力。民主德国的核发电能力于70年代末扩大到总发电量的12%，接近于西德的水平^③。1960年以来，东德发电量的增长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不能满足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的需要。停电意味着工人和机器的闲置，结果是生产率下降。电力增长需要的投资非常大，而且在民主德国，增加的产量的价值一般低于增加了的设备的成本。但是，为了保持能源密集型工业的发展，还必须得拿出这些投资来。

石油消费的紧张状况则更为明显。按人口平均计算，民主德国的石油消费量大概仅为西欧的一半^④。（由于东德不用油来发电，更着重于依赖煤和天然气供热以及更少地使用机动车辆代步，所以这是可能的）。结果，民主德国也就比其它工业化国家更少地蒙受世界石油价格上升的打击。但另一方面，进口苏联能源的价格（约占能源进口的77%）也大幅度地上升了。70年代里，苏联石油的价格上升了5倍多；近些年来，平均每年上升20%。此外，长期协定限定了民主德国1981年石油购买量的90%^⑤。

总的说来，民主德国能够用国内资源满足能源需要的65%^⑥。这一点与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是一个有利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是通过适当的保守方式取得的。1975年，民主德国主要能源的人均消费量比联邦德国高出18%^⑦。和美国一道，东德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具世界领先地位。这并不是由于浪费性消费所致，而是因为低效率的工业的缘故。同在苏联

观察到的类似情况相同，民主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一定的生产过程在民主德国要比在工业化西方国家多消费 20% 的能源^⑩。（同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东德的较高能源消费率不是由于不同的生产效率，而是由于在民主德国，能源密集型工业所占比重更大）。要想确定能源浪费中有多少是由于过时的生产设备，有多少是由于管理不善是不可能的。从任何情况来看，显然，虽说能源供应不足对经济增长是一个严重威胁，但是它也是具有明显潜力的发展因素。

建筑业 象能源供应一样，建筑工业也是促进商品生产部门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早期加速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建筑业在民主德国多年来遭到忽视。但是，60年代中期以来，建筑业的投资年增长率通常都超过了整个工业投资平均增长率。另外，工业建筑的比重降低了。建筑业重要的增长出现在农业建筑上。住宅建设就相对意义而言减少了，而政府和公共机构建筑则明显下降了。

农业 由于环境因素具有更大的易变性，所以对农业情况的评价就比对工业情况的评价要困难得多。但是，大多数的估计认为，东德的农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959—1960年紧张而又极其错综复杂的强迫性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目前农业财产的分配状况：5%属于私人；10%属于国家；85%属于合作社^⑪。集体化计划很快同改变投资重点联系起来，这些投资重点旨在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推广使用现代农业技术。随后的变革就是巩固农业合作社，使其发展成更大的组织规模；并且对改革后的市场、科研和保障性服务的合作形式进行实验。

农业生产发生了许多变革，某些东德合作社成了东欧和欠发达国家效仿的榜样。化肥的使用量也在世界最高之列。某些机械设备，尤其是收割设备，被认为比西欧的同类设备有着更高的使用效率。民主德国已经创立了最具生产性的、空前发达的农业合作社制度。不过，一项范围广大的农业资金生产率的比较（每英

亩产量或每头家畜的生产) 显示出民主德国相当于西德水平的 85%^④。劳动生产率也显示出了同样结果: 与东欧相比是高水平, 与西方相比是中等水平。尽管有了稳步的改善, 但是, 部分农业劳动力, 特别是那些不愿意离开乡村的老年合作社社员, 还显得就业不足。劳动力的自然损耗将逐渐导致提高生产率。

农业成就的取得是以某种社会代价为前提的。最初是出于合作化的动机, 后来是出于现代化的动机, 东德政府制定了相对高的农产品生产价格, 同时补贴较低的市场销售价格。当然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在耗费用于公共事业的资金, 在某种程度上还说明粮食价格是不真实的和歪曲了的, 而这种情况已经在波兰造成了数度的政治动荡。

改善农业状况的努力牵涉到新的建设, 主要是推广使用不断复杂化了的农业设备, 促进目前还落后的牲畜、家禽和奶制品生产的机械化。全面地说来, 东德的农业提供了国内粮食消费的大约 85%^⑤。增加粮食自给程度的做法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来可能是不合算的。相反, 更为合理的做法是把农业劳动力投入到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中去。

运输业 在民主德国, 货运和客运主要依靠铁路。铁路线密度很高, 但只有 20% 的线路是复线的^⑥。内燃机动力占优势, 但已经在努力把电力牵引从目前的 12% 加以扩大^⑦。按照西德的水平, 民主德国的汽车运输和内河航运是相当低的。公路运输还因为缺少多车道和限制随意上路的高速公路, 以及没有专门的以长途拖运为主的卡车运输部门而受到阻碍和限制。实际上, 大多数卡车都归生产部门拥有, 用来在有限的地区运输自己的货物。和美国长途卡车运输网以及个体卡车司机体制相比, 民主德国面临的是卡车运输能力利用不足和更多的重复搬运装卸, 因为长途货物必须装上火车车皮。由于河流都是通往易北河和奥得河, 而这两条河流现在是民主德国边界的组成部分, 所以, 水路运输受到了限制。良好的海港现在属于外国了。海运业集中于罗斯托克,

维斯马和斯特拉尔松。给海运业的投资是可观的，因为它是国家的门面和赚取外汇的手段。尽管没有任何大的内河与这些海港相联，但海运方面还是取得了稳步的成功。提高公路——铁路——海运联运系统效率是以采用集装箱运输为特点的，民主德国还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运输业卡脖子的地方还是老问题——许多部门劳动力和设备的闲置，这一点在运输业的基建部门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民主德国，客运平均地分属于国营和私营（在联邦德国私营比例大约占80%）^⑨。两轮摩托车和机动脚踏车是汽车的两倍之多，但是，汽车有着明显的增加，城市交通拥挤在上下班时间是很常见的。虽然事实上车票价格要低于公共运输实际成本的一半，客运量也仍然保持未变，但是，私人机动车辆的使用却逐年增长。

表 4—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1976—1980年执行情况和
1981—1985年计划的部分指标(增长%)

	1978—1980年 执行情况	1981—1985年计划
产业的国民收入	25.4	28—30
工业生产	32.2	28—30
工业劳动生产率	68*	28—30
建 筑	27	18—20
货物运输	25.9	11—12
对外贸易	40.7	36
个人净收入	20	20—22
社会基金	42	26
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	23.7	21—23

*为1970—1980年执行情况。

资料来源：《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一卷第52—63页。

7.80 年代经济展望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81年4月召开。和通常一样，国民经济在主要发言人的讲话中处于中心地位，他们总结了1976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提出了1981—1985年度的计划纲要。总书记埃里克·昂纳克的经济报告（其中所依据的资料的含糊和模棱两可之处值得考虑）很好地阐明了对国家的强处和弱点的官方看法。表4—4就是在昂纳克报告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的。这些资料同本章前面提供的资料是不可比的，应该基本上把它们看作是政治性陈述。

上述图表和昂纳克报告的总口气里有着一种明白无误的温和意思^⑧。与近来取得的明显成就相比，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多数综合指标是较低的。另一方面，据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计算，计划中的增长率要比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实现的增长率高得多，而且也比民主德国自己最近的增长率高得多。

考虑到已经出现的相当严重的压力，国民收入将有重大增长实际上是非同寻常的。昂纳克突出地指出了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障碍：（1），进入劳动队伍的熟练工人数量暂时的绝对下降，以及主要由此产生的60年代初政治和经济的无变化无常；（2），由于世界市场价格上涨和需要减少与西欧贸易的逆差，能源和原料进口计划增长的实际终止；（3），华约大幅度增加防务费用以对付北约的相应发展的决定^⑨。

为了解开这个可怕的谜，昂纳克主要依靠更为合理的投资政策和技术革新，他非常强调这样做。为节省劳动力而进行的投资似乎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工业自动化是特别期待的焦点。总书记坚持认为，以前计划增长的9000台“机器人”必须增加到40000至55000台^⑩。这一巨大变动实现的关键在于微电子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微型电路技术的生产。恰当的投资办法的详细内容并未提出，但是，无论如何，离开大幅度增加对西方专利技术和西方自

自动化仪器设备的购买，自动化的如此增长是不可想象的。规定急剧削减从硬通货地区进口原料的目标与此有关。

总之，通过自动化和把由此而节省下来的工人转移到扩大了便利条件的多班制岗位上去，新的投资将被局限于减少劳动力需求的生产，从而过时的技术将被淘汰，将不会有更多的“绿地”在发展生产中被占用^④。自然资源必须予以保存（这一点过去从未注意过）；在力求物资的“循环”使用中，废旧金属和化学品必须达到完全回收的程度；不仅能源的消费必须削减，而且新的着重点将集中到原子能和水电、“生物汽油”以及“新电子化学”能源上来。

缩短新建项目从开工到投入使用的周期可以带来极大的节省。昂纳克建议，应该把预期的工期标准定为两年，并把这作为一项规则。如果民主德国想跟上工业、石油化学和电子诸领域里技术革命的步伐，那么，如此迅速地转入新的生产是基本的要求。除了不断发展尖端的生产技术外（其中的某些技术出售给了西方），还必须利用引进西方技术的办法来生产高质量商品以便向东欧和世界上发达程度不高的国家出口^⑤。从道理上来讲，假如能够审慎地选择产品和市场并且国内的卡脖子问题能够解决的话，拥有高技术水平劳动力的中央计划经济应当能够有效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正是这项战略渐渐成为东德发展目标的特点。对于只讲稳定，不求增长的糊涂建议，昂纳克拒绝接受，他说：“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类的需要——我们社会主义的需求是不断地增长的，而且也只有业已生产出来的东西才能分配。”^⑥

东德社会主义的财富如何分配是下一章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应该特别引起注意，就是与上一个五年计划相比，1981—1985年的计划要求增加个人收入。社会基金——政府花费在为公众消费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上的费用将比1976—1980年期间增长得更慢些，不过，这仍将对实际收入的计划增

长有所贡献^⑨。

8. 结论

象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一样，东德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关键，这一点由于东德把自己的作用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样板”而变得更为明显。在追求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方面，经济成就就是最高要素，因而，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民主德国在世界十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的地位。

这个引人注目的成就今天已经受到了世界经济中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技术革新的飞速发展以及加剧了的世界市场的竞争等不利的变化的威胁。一个国内资源贫乏但却有着高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国家对这些变化尤其敏感。对国际经济的应变能力为东德保持其成功纪录提供了唯一的希望。但是，国内的障碍，包括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在投资和供应结构上的固执刻板，使国民经济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这就要求对效率水平来一个完全的，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史无前例的实质性突破。

〔注释〕

① 曼弗雷德·麦尔泽尔：《制约于效率压力和缺乏想象之间的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见亚历克·努乌埃、汉斯——赫尔曼·赫曼、格特劳特·赛登斯戴克编著：《70年代东欧经济》，伦敦：巴特沃斯出版社，1982年版，第45—90页。

② 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英国，西米德：萨克森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③ 哈特穆特·齐默尔曼：《70年代的民主德国》，《共产主义问题》27（1978年），第2期，第15—18页。

④ 同上，第7—8页。

⑤ 麦尔泽尔：《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第88—89页。

⑥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第2版，科隆：科学和政治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1—1099页。

⑦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11页。

⑧ 康斯坦丁·普利策：《欧洲内部及德国内部关系中的环境政策》，《德国文库》，第13卷，第8期（1980年），第834—843页。

⑨ 汉斯耶尔格·F·布克和布尔恩德·斯宾德勒：《民主德国因有毒气体泄露而造成的空气污染》，《德国文库》，第15卷第9期（1982年），第943—958页。

⑩ 赖奈尔·雷斯特鲁普和托马斯·魏玛《“有罪的只是资本主义”：民主德国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德国文库》，第15卷第8期（1982年），第834—844页。

⑪ 约亨·贝特肯哈根等：《民主德国与东欧》，奥普拉登：莱斯克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⑫ 齐默尔曼：《70年代的民主德国》，第23页。

⑬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35页。

⑭ 同上，第239—240页。

⑮ 贝特肯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第188页。

⑯ 萨德·奥尔登等：《东欧的经济增长，1965、1970年和1975—1980年》，纽约：L·W·金融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第8页，第26页。

⑰ 同上，第28页。

⑱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83—93页。

⑲ 同上，第94页。

⑳ 同上，第100—159页。

㉑ 中央统计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柏林：国家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㉒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纪录》，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㉓ 同上，第72页。

㉔ 沃尔夫冈·斯廷格勒瓦格纳：《民主德国的褐煤工业——通往原子能时代坚固的桥梁？》，《德国文库》，第14卷，第12期（1981年），第1297页。

㉕ 同上，第1300页。

㉖ 贝特肯哈根等：《民主德国与东欧》，第64页。

㉗ 西格弗里德·库伯：《计划的迟钝性：论民主德国与苏联未来经济关系的发展》，见《德国文库》，第13卷，第8期（1980年），第225—228页。

㉘ 贝特肯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第62页。

㉙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08页。

㉚ 麦尔泽尔：《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第77页。

㉛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32页。

㉜ 同上，第140—141页。

㉝ 同上，第142页。

㉞㉟ 同上，第148页。

㊱ 同上，第157—158页。

㊲ 《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纪录》，第51—75页。

㊳ 同上，第64—68页。

㊴ 同上，第71页。

- ⑩ 同上，第 72 页。
- ⑪ 同上，第 73—74 页。
- ⑫ 埃里克·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1 年 4 月 11 日），见《德国文库》，第 14 卷，第 6 期（1981 年 6 月），第 646 页。
- ⑬ 《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纪录》，第 60 页。

五、社 会 政 策

昂纳克时代，东德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断强调作为经济政策的归宿的社会效果。“经济政策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现政府提出的一个坚定口号。政治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强调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改善社会福利的手段。德国统一社会党1976年新党章宣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迅速发展，效率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①

经过斯大林时期的曲解之后（当时流行着“吨位观念”，只按产品数量来决定成果），现在已明显地恢复了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关心生活质量的态度。价值不仅同产品的质量有关，而且也同生产的条件以及产品所用于的目的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把政策和政府计划的焦点放在人们活动的两个主要领域“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作为政府政策的对象，人口被设想为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的。虽然在概念上二者截然不同，但是，它们的作用是紧紧地相互依赖的。除了老幼之外，公民们都是一身而兼二任。对生产和消费相互关系更进一步的理解——无论就整个社会水平还是就个人水平而言——是以乌布利希统治末期寻求社会理论上的突破为基础的；这是社会“控制论”模式的一大发展，这一发展在60年代末受到了极大关注^②。在目前有关经济和社会政策统一的文献中，表达了一种尽管不那么做作但却是相似的关注。

在东德的词汇中，社会政策是一个特别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三个要素^③。第一，主要注意力放在收入政策上，其目的是根

据个人对国家生产指标的贡献大小给予不同的报酬，同时，减少非正当理由的收入不平等。这里所关切的也正是影响收入的最终分配的税收政策。第二，众多的旨在提高公共福利的计划是在“社会基金”的总项目下混在一起的。这些国家支出使就业人员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不是劳动力一部分的人都增加了收入。社会基金包括收入保证、家庭资助、卫生保健、住房、教育、职业培训、文化娱乐和交通等项目。第三，就保证达到实现满足人民需要和逐步消除基本的社会不平等这一理想目标来说，社会政策的概念涉及到收入和社会基金使用的最终效果。这个时期的成就，据料在职业人口(指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口——译者)中还将达到更高水平。进一步的经济成就就会导致具有更进一步影响的社会政策，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1. 工资政策

职业人口大约有 870 万人^④。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原则上说来，一个国家的工资政策旨在达到四个目标：按劳取酬；奖励获得更高技术水平；使劳动力在经济部门之间合理地分配；逐渐消除社会集团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在向这些目标迈进时，会遇到大量的实际困难。

和其它国家一样，社会主义的东德也不可能制定出劳动贡献的普遍标准。于是，按劳取酬的原则就不可能合理地用于使跨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公用事业、行政等部门)的工资率保持一致。甚至在同一个生产部门，这个原则也提供不了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经理人员之间的合理的工资级差。作为结果，实际收入率已经通过一个增长过程出现了，这个过程开始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工资差别进行的、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基本调整。这些调整包括事实上消除非劳动性收入、相对增加一定的熟练劳动者的工资和相对减少某些种类的职业性工作的工资。另外，公有制也消除了曾存在于私人雇主之间的不同的工资标准。

表 5—1 各经济部门就业者的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1955 年	1965 年	1978 年
工 业	105	103	101
建 筑 业	100	107	104
农业和林业	74	89	97
运 输 业	101	105	110
邮电和通讯	76	90	90
商 业	87	84	87

资料来源：根据中央统计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计年鉴，1981》，第109、137、152、169、217、232页计算得出。

后来，各经济部门之间工资差别的变化和贡献大小无关。表 5—1 的资料说明，和平均工资相比，建筑业和运输业工人的地位改善了，过去两个工资水平最低的部门农林和邮电通讯部门的工资已极大地接近了平均水平。这些变化很可能与技术水平的变化有关。虽然技术进步在所有部门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与建筑机械的增长和空运的发展相符合，同技术发展有关的劳动力的比例在建筑业和运输业可能是最高的。技术革新对于农业和通讯也有着重要意义，所以，用工资鼓励追求更高的技术是正确的。另外，这些部门也许反映了一种与减少工资不平等有关的政策。

在经济部门，尤其是商品生产部门中，工资已经通过各种试验用来刺激完成更高的定额。基本工资由工业主管部门和工业工会之间的协议来确定。在 1960—1976 年间，基本工资增长幅度极其微小。工人收入确实增加了，但主要是通过“超产工资”的形式增加的，这些“超产工资”只有在达到生产指标之后才能付给。虽然，超产工资似乎是按劳取酬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形式，但是，它同工人的实际劳动成果上有着微弱的联系。最为经常的是，只要一个企业的有能力的（以及政治联系广泛的）领导人能够得到宽松的指标、雄厚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在供应紧张的状况下有可

靠的路子，这个企业就有资格得到超产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越成功的就越成功，于是，超产工资也就具有了固定的月工资的组成部分的性质，到了70年代中期，有些行业已达到基本工资的80%。在有特权的行业中，熟练工人的年工资是由大约50%的基本工资、40%的超产工资和10%的年终奖金构成的^⑤。

这种情况反映了民主德国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计划的结构中，过去的经济成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大型和高利润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在“决定性结构”行业中的企业，有着较大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工资政策。虽然工资政策要接受工会联合会——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审查，但是，在较为成功的行业中，对基层工会的不正常的影响在自然增长着。特权行业中企业领导人和工会领导人结成的联盟在牺牲全面地调整工资额的情况下，使超产工资逐步扩大。

在非农业部门，这种“走后门”增加工资的方法起着一定的不良作用^⑥。首先，在企业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工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取决于工人的努力劳动，而是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路子。其次，甚至在较为成功的企业中，某些专业人员，如职员和行政人员，也只能最低限度地分享超产工资。改变了决定工资额的习惯做法，结果使这些人的收入相对减少了，使这些人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的刺激也减弱了。最后，由于“超产工资”没有普遍地在非生产性部门(如：商业和服务行业)中采用，因此，这些部门的工人被吸引到工业部门寻找工作，从而把劳动市场搞得很不正常。

昂纳克1971年就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以后，工会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提出对工资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旨在克服积弊已久的不平等现象。开始于1976年的逐步改革的目标是把基本工资恢复到总工资的大约90%^⑦。在各个经济部门中，改革后的工资差别明显地体现了大力鼓励人们从事专业性技术工作的方针。这项政策设想技术占有和实际工作是基本一致的。虽然分解开来的各项任务指标并未取

消，但是，超产工资的取消将使劳动收入中的可变部分减少到年工资(含年终奖金)的8%到10%^③。

缩小工资差别的做法常常与使用工资政策来奖励成就、鼓励掌握工作技术以及合理分配劳动力相矛盾。然而，政府还是采取了让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比高收入工人的工资有更快的增长的政策。另外，对法定最低工资实行了阶段性调整。1967年以来，法定最低工资为平均工资的大约42%到45%^④。

社会阶层之间的工资歧视，特别是性别歧视是非法的。“同工同酬”是民主德国工资政策的一个明确原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同这项原则相抵触。然而，妇女大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工作岗位上，因而她们的平均收入大大地低于男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脱离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存在和抚养孩子的实际情况造成的，这些都限制了妇女们选择特定职业和追求较高的就业职位。就大多数社会阶层而言，已婚夫妇仍然把丈夫的事业利益置于明显的优先地位。

工资政策的一个主要手段是对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所谓可支配收入就是在应得的收入额中扣除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之后拿回家中的收入。个人收入按照适当的累进税率纳税，累进税率在10%到20%的范围内，有些收入(如奖金、加班费)可免税或按更低的税率纳税^⑤。最低的税率适用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长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已婚夫妇。较高的税率适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赚取收入的人，如独立职业者、手工业者、神职人员和私营店主。1975年，“民主德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实际税率为7.2%”^⑥。除了对于拿最低工资的人来说，个人所得税再分配的影响是很小的。月收入达到600马克(这个数目低于平均收入)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税为月收入的10%^⑦。月收入600马克以上的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地交纳额外的税款，以便获得领取追加的退休金的资格。有大约65%的合乎条件的人在追加计划上登了记。社会保障税总额占收入的6.6%^⑧。因为，部分较高收入未列入义务项目

中，社会保障税有一个总体上逐渐递减的特点，这在工业化国家中是很典型的。

1975年，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的扣除总共使东德的典型工资减少了大约13.8%。相比之下，联邦德国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扣除的总数达总收入的27.4%^④。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这种扣除要更高。和民主德国相比，这些国家更多地运用累进税制作为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手段。

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是决定生活水平差别程度的一个因素。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家庭都是主要的消费单位，收入的差别通常可以用家庭收入来衡量。家庭收入是由工资水平和每个家庭中职业人口的数目决定的。东德的家庭收入数字反映了劳动力中非常高的女性就业率。

民主德国关于收入分配的资料没有欣然采用一般常用的方法。表5—2是（西柏林）德国经济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计算得出的。要达到完全平等，每个家庭等级个人收入应达到20%。表中显示出，两国较低收入的等级所占收入百分比从1960年到1974

表5—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分配的五个等级比较(%)

家庭收入等级	净收入分配			
	1960年		1974年	
	民主德国	联邦德国	民主德国	联邦德国
第一等级	31.7	39.8	29.9	38.3
第二等级	23.4	22.8	23.2	22.1
第三等级	19.2	16.4	19.8	17.0
第四等级	15.3	12.6	16.2	13.3
第五等级	10.4	8.4	10.9	9.3

资料来源：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英格兰，威斯特米德，萨克逊豪斯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年间有了微小的增长，与此同时，较高等级所占比例降低了。这些变化标志着收入差别的缩小。从粗略的比较来看，1974年东德距完全平等的分配的总差异是联邦德国的2/3。由于联邦德国在收入差别上要小于西欧和北美，因此，东德在减少收入差别方面在工业化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除可支配收入以外，其它因素对经济福利的平等与发展水平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2. 社会基金原则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特别是在社会福利制度高度发达的
西欧国家里，群众生活水平包括就业收入和复杂的被称为“社会收入”的公共收益。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社会收入包括货币、商品和服务三种形式，这些都是由社会基金支付而由个人消费的。因此，社会收入不包括纯粹的共同商品和服务的花费，如国防、外交关系、公共道路和一般的政府行政开支，但包括具体的用于收入保证(社会保障、福利补助)、卫生保健、教育、住房以及文化娱乐设施的政府支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似的概念——“社会基金”——指的是用于个人消费的政府开支。与西欧、北美的社会收入类别相比，社会主义社会基金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基金的概念非常广泛，包括一切能够概括在一般概念中的各种形式的政府支出。外加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为了保证消费品低价和稳价而支出的繁杂的补助和津贴。第二，社会基金并不是政府独家关注的事情，在民主德国，国家提供了社会基金开支的大约75%，另外的25%是由生产企业和社会组织，主要是工会联合会提供的^③。由于东德的社会收入不包括教堂、神职人员和其它服务性组织的开支，所以，第二个差别是两种制度下得出的资料不可比的一个主要原因。

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是逐渐增加由社会基金

提供的消费品份额。尽管就业收入仍将是职业人口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的主要手段，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原则，由社会基金提供的消费要比个人收入增长得快。从意识形态上来讲，社会基金增长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创造基础。社会基金占职业人口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的比例从1960年的24.9%增加到1978年的33.4%^⑥。对于不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标准的四口就业家庭(如抚恤金和养老金领取者，病残者)来说，社会基金的重要性自然要大得多。

下面对现在的社会基金主要内容做一简要叙述。

收入保证

社会政策最古老、最广泛采用的形式就是收入保证。收入保证计划的目的是至少部分地替代工人由于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而失去的谋生手段。第一个这样的国家计划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一项创举，当时以社会保障而为人知晓。今天，社会保障还被继续推行并在一些方面有所补充和改善。

东德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义务性的和普遍性的：85%的人口(这些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人口)由工会计划来负责，自谋职业的和集体单位的职工由单独的国家保障计划负责^⑦。特别是在工会保障计划中，重点强调“自治”。由于专职的工会工作人员管理以地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系统，所以，工厂社会保障系统的管理就由自愿人员来承担。权利上的争执由工人和地方工会选出的领薪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仲裁。自治的目的在于更大地加强工人的责任感和阶级团结，也在于减少行政开支和(无疑地)对工会组织推行一项更为积极的方针。

和大多数社会保障制度一样，东德的社会保障计划要把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同工作年限长短及长期的收入水平相联系。无论如何，每月110马克的基本生活费是有保证的，工作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退休金最少是每月270至340马克^⑧。在义务性

保障计划中，最高退休金为 600 马克（1978 年最低月工资是 300 马克，平均月工资是 897 马克）。在有亡故开支、未成年子女、学生和需要特殊医疗的情况下，给予追加补助。1971 年以来，就业者可通过自愿交纳额外的社会保障金而领取追加的退休金。战争牺牲者，为国家服务而获得荣誉者，以及某些从事特殊职业的人（如矿工、科学家、教授等），可以以更高的比例领取特别退休金。

多年来，东德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了大众不满的焦点。公民按典型的就业履历享受的社会保障已被认为太低。对于一个上了年纪而又没有多少工龄的寡妇来说，那不多的退休养老金只能维持她当月的基本生活。近年来，退休金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80 年，月平均退休金为 335 马克，或者说是全民单位纳税后平均个人收入的 37%^⑩。

由于各国在义务社会保障制度、非政府退休金计划的作用、不同的老年人消费结构形成的购买力的差别、以及考察不同职业的退休金领取者所受影响的资料有缺陷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相互比较而得出的评价是极其缺乏说服力的。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内容全面的瑞典和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简单狭隘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造成鲜明对照。然而，我们现在的目的不在于对这两者做出比较，而是要把东德的社会保障制度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进行一番比较^⑪。

（1）民主德国的人口结构是极为不利的。与现有劳动力规模相比，退休金领取者的人数非常高，大约每 100 个领薪者中有 30 个退休金领取者。这个比例要比瑞典和西德高出 1/4，是美国的两倍，苏联的 4 倍。这种沉重的人口负担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大约 8%）要高于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所有欧洲国家。

（2）退休金对退休后收入损失的补偿程度（收入补偿率）明显地低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同北美差不多。

(3)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义务性的政府社会保障有各种非政府的退休计划来补充,对于那些收入超过平均收入水平的就业人员来说就更是这样。与民主德国相比,这些计划有两个作用:提高了退休收入的平均水平和加大了退休金领取者的收入差别。

(4)尽管近年来提高了最低退休金的标准,但是,民主德国退休金再分配(拉平标准)的效果没有较为富裕的国家那么大。

(5)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民主德国给予未就业的母亲们的重视,认为她们实际上担负了社会的有益工作。由于退休金的计算与工龄有关,所以,东德妇女现在可以领到证明,证实她们脱离劳动队伍抚养幼年子女的时间。

(6)民主德国社会保障的支出有大约一半是由政府基金负担的,其余部分大都由就业者和雇用者交纳的直接税均摊。这表明就业者的纳税率低于西方国家的普遍水平,同时也表明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保障份额低于东欧的通常比例。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津贴表明国家总预算中该项比例增大了(现在为18%)^②。

(7)退休者消费结构的典型特点是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住房、卫生保健和旅游的份额相对更高。东德政府花相当多的钱对这些商品和服务进行补贴,以保证低廉的消费物价。这种价格补贴行为增加了数额有限的退休金和购买力,从而也使东德退休金领取者和西欧退休金领取者相比时通常的不利地位有所改变^②。

失业补偿

所有现代国家都把失业保险作为对暂时性失业期间收入损失的补偿手段。最初,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社会保障包括极少的、约占最低工资的10%的失业金^②。失业保险总是在思想上使人反感,同时,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它也渐渐成为多余的了。这项保险金于1977年被取消。

当然,当前的工业现代化有时确实会导致私人企业中劳动力

的过剩。国家劳动法规定这些企业有责任对裁减下来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并且(或者)另行安排就业岗位。这项规定由于工会积极地参与早期阶段的现代化计划而得到了促进。被裁减下来的工人仍然拿全工资,直到被重新安排就业。如果一位工人被安排到了比以前工资低的工作岗位,那么,原来的单位就有义务补助他为期一年的两种工资之间的差额部分。这些措施与近来瑞典解决由工业技术发展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的方法相类似。

家庭补助和有关家庭的社会资助

东德社会政策的重点是作为社会组织基本单位的家庭,其出发点是取得社会效益。面对逐渐减少的劳动力,政府一贯强调家庭生育子女。全面的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旨在克服极低的人口出生率^②。同时,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加上经济上需要女性最大限度地加入劳动力队伍,又都鼓励所有妇女,包括正在抚养孩子的妇女就业。

在促进母亲们就业和减轻家庭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民主德国逐渐采用了一套先进的家庭补助和其它形式资助的计划。

26岁以下的年轻夫妇们可以享受为期8年的政府无息贷款,这笔贷款相当于5个月的综合收入,可用来购买家庭用品。他们还可以申请第二批同样数目的贷款,用来购买公寓套间或是用来凑款建造一套私人住宅。另外,随着每个孩子的出生,贷款中的一部分就能减免,如果8年中生下3个孩子,则贷款可全部免还。

每生一个孩子,家庭可得到1000马克(大约相当于一对年轻夫妇一个月的收入)的补助金。另外,社会保障计划可提供26周的照付全薪的产假,如果是2胎或2胎以上的,还可另加7个月适用于夫妇任何一方的照付工资75%的假期。从国家基金中,每个家庭还可以每月领取一次补助金,从第一个孩子的20马克到第五个孩子的70马克不等;另外,每年每个孩子还有25马克

的服装补助费。

其它家庭资助形式还有：为在校孩子免费供应午餐，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大量资助和照顾，为小学年龄的孩子提供放学后的照顾。这些公益开支中只有一小部分由政府基金支付，其余部分则由单位和(或)工会提供。结果，这些服务的效果和父母直接受益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有着强有力的工会的赢利企业中工作的父母们受益最大。

工作的母亲们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每个工作日减少45分钟。她们还可以申请扣发工资的假期来照顾生病的孩子，单身母亲在同样情况下只扣发工资的一半。

总之，东德的家庭资助制度是最全面的这类制度之一^②。虽然其它欧洲国家也提供家庭资助(有的相当慷慨)，但是，只有瑞典为如此大范围的家庭需要提供资助。毫不奇怪，家庭资助计划也许是民主德国社会政策的最大众化的方面。

卫生保健

东德法律认为，必要的卫生保健是全体公民的一项权利，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③。卫生保健由社会基金以国家医疗服务的形式提供。有96%的医生和85%的牙医在国家卫生机构中工作。将近93%的床位属于公立医院或医学院(占10%)；其余床位属于私立医院，其中大部分属于宗教团体，这些团体接受政府的医疗补贴。公民们看病不用付治疗费和药费。

一般来说，民主德国的医疗培训和医疗条件能够比得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见表5—3)。只有瑞典能够始终为全体人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医疗条件。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给东德的医疗保健造成了特别的负担，然而，较高的人口密度又使东德比美国和苏联有可能更为平均地配置医疗条件。

民主德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大多数方面都很有成效。人口平均寿命为：男子69岁，女子75岁^④。这一水平比日本和瑞典

表 5—3 每万人口拥有医生和床位的数量(1975—1977年)

国 别	医 生	牙 医	床 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0	5.0	10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1.0	5.2	118
经互会国家(欧洲)(1)	20.3	3.8	91
欧洲共同体国家(2)	17.4	4.3	98
美 国	16.5	5.1	66
瑞 典	16.3	8.8	152

(1)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

(2)比利时、联邦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英国。资料来源：联邦统计资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79年统计年鉴》，斯图加特，W·科尔海默出版社，1979年版，第675—676页。

要低，但是，却比得上大多数西欧国家和北美，而比东欧要高。在民主德国最常见的死亡原因，特别是心血管病，发病率与联邦德国和其它富裕的欧洲国家相近。但是，在民主德国，同在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来自呼吸系统。官方的资料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反映了工业的密集和工业空气污染的严重。另一方面，民主德国给母亲和儿童以最好的照顾，这个国家在降低出生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和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民主德国近来努力提高医疗卫生质量的重点也在于关心普通大众。首先，提供的医疗服务在地区分配上是不平衡的。尤其明显的是，按人口平均占有的医疗设备和医生在柏林和发展较为缓慢的北方比在工业化的南方更为令人满意。换言之，医疗卫生没有跟上人口迁移的步子。在农业地区，城市和农村在可获得的医疗手段方面有着显著的差距。其次，虽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计划的医疗卫生服务要优越于靠市场支配的医疗卫生服务，但是，民主德国并未完全避免医务人员在主要和特殊部门中医疗部门的分配不当。尽管问题根本不象美国那样

严重，但是，更多地对家庭出诊和对其它主要医疗部门补充医务人员仍然是必要的。

最后，虽然就统计意义上来说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人们一直对大量的非个人素质造成的现象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大型综合性医院中是必然会产生。病人会被突然而无礼地从一个科转到另一个科，在那里，他们的病历被拖拖拉拉地反复研究。一个病人每看一次病都会由不同的医生来诊治，从而根本得不到连续性的治疗。

虽然这种不满在许多国家都是普遍现象，但是，在国家医疗卫生制度下尤其严重。

另外一个不满的根源，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的公民来说，可能是医生性别和年龄的变化了。在柏林边界 1961 年被关闭之前，医生在移民数额中比例很高。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德国行医收入潜力要大得多。在较低的工资条件下紧急需要替代走掉的医生，就使得大批妇女进入了医学院。一个以前由老年男性从事的职业现在逐渐被年轻女性所从事。那怕在一个被认为是经历了文化变革的社会里，人们也毫无疑问会对普遍地失去“父亲般的”家庭医生大为不满。

70 年代以来，采用了两种补救方法。第一，增加工资和特殊的退休补助，使普通医务部门一般地、特殊医务部门特别地增加了吸引力。第二，综合性医院改变了老做法，只要有可能的地方，都实行“让病人选择”医生，以建立“更好的信赖关系”。近来的其它变化包括加速对医学院校和诊所的投资，完善处理急诊所需要的培训和交通运输手段。

教育和培训

社会基金支出的最大份额之一是“一体化的教育和培训制度”。无论是官方资料还是国外教育和劳动力问题专家们的评价，都对东德的这种制度广为赞赏。许多成就的确是激动人心的，同

战前时期改革的范围相比就更是如此。不过，这些年来情况却变得有点引人争议^⑨。

民主德国教育体系的核心是从7岁开始入学的十年一贯制学校。目前这种义务教育计划完成率达90%以上。(3—4岁的儿童进自己家选择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中收入了87%的适龄儿童)同战前的教育制度以及当今许多西欧国家的教育制度相比，十年一贯制学校是一种综合性学校。这里并没有对中、小学生分别教授一般课程、技术课程和高精课程。相反，十年级以前，所有的学生都学一样的课程。(美国人早就习惯于综合性学校了。)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分校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倾向，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受过教育的和富有人家的子女才能进入大学学习，而其他孩子只能从事低级的劳动。

直到十年教学大纲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开始按学习能力高低划分班次，因此，民主德国的教育者们希望给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以广阔的机会来克服文化上的障碍。在第十年中，教师从学生中挑选出有可能成功的学生进入加期中学(“Expanded Secondary School”，简称“EOS”，一种在十年一贯制之后再加期两年的中学。——译者)学习。1977年只有9%的8—9岁的学生注册进加期中学(1971年有11%)。虽然有关资料是不完全的，但是，很明显，加期中学是进入国家大专院校的最重要的途径，加期中学的大多数毕业生事实上都被大专院校录取了。结果，第十年的筛选过程对社会结构和个人事业的机会都具有深远影响。

与一般学校对应的是数目有限的特别学校(专收身心有缺陷的孩子)和专科学校(收取在艺术、体育、外语和科学上有天赋的青少年)。全部这类学校中的学生占11—17岁学龄孩子的4%。在科特布斯和德累斯顿专区，可供自由选择的学校用索布少数民族语言提供教育。

85%的18岁的青年既不是进入加期中学学习，也不是马上去就业，而是接受某种形式的职业培训。3/4的职业学校是和企

业挂钩，其余的由地方政府主办。大多数学校的课程安排是两年的课堂学习和实习，以便获得专业工人证书。对于那些没有完成十年普通学校学业的（有18%）和想取得加期中学同等学历的（有4%），教学大纲允许留级一年。在任何情况下，职业学校进行的都不只是岗位培训，其必修课还包括语文、数学、历史、管理和体育。这个教学大纲在某些方面同美国许多社区学院的课程设置相似。

较高层次的教育由233个专科学技术学校组成，这些专业面设置很狭窄的学校或多或少地是由专门的经济和管理部门为培养高技术水平的雇员而开办的。1977年，这些学校招收了51300名新生，占当年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的1/5。民主德国有5所综合性大学和48所专门学院，这些院校包括了理工、商业、医学、教育、农业和艺术等各种类别和专业。1977年，这些学校招收了32914名新生，大约比加期中学毕业生总数多9000人，占全国19岁年龄人口的12.5%（联邦德国的院校招收的新生占19岁年龄人口的13.9%）。技术学校、大学和学院的入学人数比1971年的最高峰下降了20%，当这种急剧下降是为了使培养人才与国民经济的就业需要相协调时，那么，它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除了这种基础的一体化教育培训制度外，民主德国还仿效了苏联的职工教育模式，这些职工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正常的教育。通过在单位利用夜晚和周末时间对一套相应课程的学习，许多年纪较大的工人已经完成了八年级或十年级的课程。一些非熟练工人也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专业技术人员证书。政府除了名义上负责成人教育外，还支付全部教育培训经费。政府还给大专院校的大多数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费，对那些从农村来城市上加期中学的学生也同样发给生活补助费。如果是在职工人进入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学习，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由企业和工会基金支付。

这些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大范围和高水平的资助被党和政府极力宣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虽然美国政府对教育的资助是相

当慷慨的(人均教育费用居世界领先地位),西欧也在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开支,但是,确实还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象民主德国那样广泛地提供不受家庭收入影响的教育机会。

宪法为全体公民提供了“按成绩、社会需要和人口的社会结构从一个等级的教育升到更高一个等级的教育”的权利。换言之,公民们寻求教育机会的权利并不是不受限制的。除了十年义务教育外,能否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取决于对有限位置的竞争。就业机会的分配是对持有各种教育文凭和职业培训证书的就业者计划需求的结果。粗线条的职业抉择是主观理想和现实机会相妥协的产物。和许多西方国家相比,这种做法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选择;但是话说回来,它也有助于免受个人不明智的选择——未能从事自己真正适合于从事的职业——的惩罚。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有效的就业计划减少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竞争基本上全部以学校和考试为基础。但是,不良的社会行为,包括公开地蔑视学校领导,会成为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教会人士也有报告说,参加宗教活动也是被高等院校拒绝录取的一个普遍原因。

尽管一直在努力清除由于社会阶层引起的接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但是,父母受过教育或享有特权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大得多。70年代末期,占人口总数86%的工人和农民,其子女仅占大学生人数的60%。这个比例与早年相比有了极大的改善,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也要好得多,然而,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对此仍不满意。仍然存在的不平衡状态可归于知识阶层中家长的明确态度,更高的价值追求和几乎没有为弥补家庭收入而过早就业的必要。于是,学校被授权通过放宽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学考试成绩的办法,实行“积极的待遇差别”。这些措施的总作用,用东德的话来说,是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教育制度,并成为—一个不断民主化社会的基础。

从受教育的时间来算,人们获得教育的平均水平用世界标准

衡量是非常高的，尤其对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是这样。在欧洲共产党国家，民主德国名列前茅（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⑧。虽然民主德国比之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落后一截，但它超过了联邦德国、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

但是近年来，保留意见愈来愈对教育质量表现出关注^⑨。东德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们指出了研究机构跟不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技术革新的步伐，经济、政府和社会机构中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对解决问题表现一种武断的态度。随着带有“改善”动机的自主精神再提高的实验冲击，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体制上。常见的批评认为，各类教育不当地鼓励学生学习的明确的东西和规定的答案，从而损害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既根源于以集中为特点的教育体制，又是由保证人人教育平等的愿望引起的。早期注重教师的政治可靠性也是一个因素。结果，每个年级的每个科目都是全国统一的教材。学校和教师的成就主要依据学生试卷上的分数来评价，而那些答案既狭窄又死板。死记硬背成了学习的主要方式，毫不顾及学习的主动精神。总之，学生都变成解答那些有现成答案的行家里手。

然而，一旦领导的任务或技术革新要求对显然没有前例的事情作出决断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困难^⑩。这样的缺点对一般公民来说也许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多少都是惯行常规的。但是，当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要求领导作用逐渐非集中化的时候，其影响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国内批评家公开指责大学和学院采用“小学”教育方法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

对教育质量表现出忧虑，这并非是民主德国或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现象。例如，美国正在为发现有“职业性文盲”而烦恼。而关注的焦点是相当不同的。在美国，英才教育具有最高水平，问题出在大众教育的质量和平等权利。东德恰好相反，它有理由以大众教育制度引以自豪，而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国家栋梁的

教育。

住房政策

尽管政府宣称它的广泛的住房补贴制度是社会主义最民主的特征之一，但是住房政策却是东德社会政策中最令公众不满的一项政策^④。

就积极的一面而言，民主德国的住房方面的家庭支出确实很低，同西欧、北美相比尤其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房租和公用事业支出仅占纯收入的3—6%，低收入家庭的收费更低一些^⑤。全面的房租管理使这样做成为可能，此外还有广泛的社会基金（国家、企业和工会的）补贴住房建设和维修^⑥。住房补贴计划起着有利于老年人和低收入公民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于是，在这一方面，东德避免了“住房敲榨”——对很多美国家庭的支出影响很大——的恶劣名声。

·但就消极的一面来说，东德长期以来面临着全面的住房短缺。在战后早期，住房条件从欧洲普遍水平来看是好的，事实上要明显地好于战争破坏更重和移民涌入更多的联邦德国。但是，社会主义重建的需要，加上苏联强加的战争赔款，使新的建设活动几乎完全集中到工业部门。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住房工程是在柏林和其它一些大城市完成的，而新建的步伐缓慢，改造的资金和原料供应不足，这就意味着东德的住房条件渐渐地恶化。

由于人口增长停滞，单就人均住房数量来说，民主德国似乎能够满足供应。然而，人们必须应付大多数房屋低劣的质量、简陋的设备、地理位置不佳以及不愉快的分配等等问题。

直到1972年，东德还有50%的住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修建的，22%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修建，1945年以后修建的只有26%^⑦。（而联邦德国的住房修建则分别是27%、17%和56%。）人均住房面积（7.34平方米）比联邦德国少1/4，在欧洲共产党国家中也是最少的^⑧。尽管制定了加速整修规划，但到1977年约

有一半的住宅仍然没有室内卫生设备，将近3/4没有集中供热设备。如此的住房条件明显是对日常生活质量的损害。

除了这些表现为全国性的住房问题，对有限的住房不合理的分配还给一些特别类别的家庭带来另外一些问题^⑧。虽然没有特别规定，但相当数量的住房是由老年独居者和身边无子女的夫妇占用着，相反，却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情况，多人口的家庭，或甚至两个家庭挤在一所非常小的住宅里。许多未被充分利用的住宅是郊区私人房产、房产的所有者又不能依法逐出。已经采取缓慢的、适度有效的方法，提供有吸引力的、低价的退休中心诱导老年房产所有者搬出旧居，他们住宅可供多人口家庭使用。

东德的家庭日趋小型化、核心化——这是现代社会一个突出而普遍的特点，这就同两个家庭继续住用一个住宅的需要发生尖锐冲突。还没有公开的资料来说明这种状况的发展程度，但政府已经许诺过，“到1985年，每个城市和社区都将达到每家拥有自己的住房。”^⑨

住房使用的不合理分配是与地区分布不合理密切相关的。总的来说，住房面积最大的是乡村和首先象柏林这样的“窗口”大城市。住房条件特别差的是那些中等规模的老社区。但很明显，在哈雷、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城和德累斯顿这样的南部大都市区里，高质量的住房短缺是非常严重的。有些地区恰恰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扩建、这样最需要吸引比较熟练的劳动力。工会致力于消除明显由于工人们长期报怨住房不良而造成的劳动持续不足的现象。看来许多合格的工人是不情愿拿较好的工作去换取更差的住房。

昂纳克领导集团最先考虑的事情之一就是系统地作出富有活力的回答。第一，住房支出增长率增加一倍，十年内住房支出在岁出中百分之百地增长^⑩。第二，增加了的国家贷款和企业补贴，极大地鼓励了工人住房的合作互助行动。工人们按照家庭收入水平和所需住房面积的大小购买股票和每月交纳互助金，部分

款项还可以用劳务来抵偿。原则上说来，每个互助者在三年之内都可望拥有或占用一套新住房。1971年至1973年，每年由互助者建造的新住宅从17200套增加到了32500套，而且从那时起还一直在增长^④。第三，为私人建造新房增加了许多信贷和材料分配的机会。这项政策不仅反映了解决住房紧张状态的迫切性，而且也反映了某些高收入的人在承担如此重大工程不断增长的能力。结果，由私人建造的新住宅数量从1971年的2200套发展到1975年的11200套。从那时起，私人建造的新住宅数目一直稳定地占全部住宅建设的11%^⑤。第四，建设住宅的政府（中央和地方）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着，因此，由政府兴建和改建的住宅仍占全部兴建改建住宅的2/3^⑥。

总之，非常明显，民主德国的住房条件过去由于多年的忽视而极为糟糕。然而，在最近10年，住房政策经历了一个向市场调节转变的过程。1976至1990年的长期目标预计要兴建和改建大约300万套住宅，这将对总人口的大约一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⑦。近来有迹象表明这项计划正在提上日程。

文化和娱乐设施

在东德的社会政策下，为公民提供的基本权利之一是有机会参加文化和娱乐活动。虽然文化活动的概念可以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在这里它主要是指诸如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之类的东西^⑧。其重点在于生动活泼的戏剧和音乐。这些戏剧和音乐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且也表现十个多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最为辉煌的功绩。国家对公众入场券实行的补贴明显地是旨在使文化艺术为社会各阶层服务，以便克服资本主义国家里文化上的阶级偏差。不完全的证据表明，由于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频度不同，人们在文化补贴上受益的程度事实上是不平衡的，收入较高和受过教育的人们受惠更大些。对表演艺术的资助也是旨在让人们通过对德国功绩更多的了解来加强民族意识。活跃的柏林

文化活动有利于吸引外国游客以赚取急需的硬通货。文化项目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基金帮助，保持着悠久的德国传统，这一点在今日的联邦德国也很明显。

对参加体育运动给予优惠待遇体现了民主德国对娱乐活动的态度。由于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个人喜爱和支持，民主德国很快成为了体育强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它国际比赛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发展体育最初设想用来巧妙地打破这个国家外交上孤立于许多国际组织的状态，这项选拔、训练和奖励的全面计划树立了一个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发展体育的无与伦比的楷模。

虽然政府补贴大量地流入了著名运动员的腰包，但是，国家政策并未忽视普通群众。学校的孩子们和年长的人们都有机会参加由青年组织和工会主办的各种体育比赛和体育娱乐活动。对参加体育活动的资助是很丰厚的，有时可达百分之百，这些资助大部分来自工会或主办企业。这也是为了消除在参加体育活动上的阶级偏差，但是，这种非政府性的特殊的财政资助方式意味着体育运动水平会依地区经济实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度假设施和青少年夏令营是公众消遣娱乐的一个重要方面。度假胜地和度假村归工会和地方政府管理。获得和维修这些设施的资金有大约一半是由企业基金提供的；一些大的企业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度假地。对于大多数度假者来说，住宿和补助是由他们的工会委员会给安排的。在7—8月份度假旺季，住宿总是很紧张，“最好的”工人据信可以得到优先安排。

长期以来，青少年夏令营一直是党予以优先考虑的事情，由于它有服务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大致说来，这些1—3周的夏令营与美国和欧洲的标准一样，它们与由自己选择的夏令营的主要区别在于更少的花费和更多地强调爱国主义和职业教育内容。

最近10年休假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同意把度假作为家庭活动

的一部分。实行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度假地的缺乏，而且也因为通过双方工会安排夫妻的度假日程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双方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的话）。这些年来，由自由德国工会支配的度假胜地的设施迅速增加了。另外，独自安排的度假也增加了，由于更多的家庭有了小汽车和宿营所需的装备，情况就更是如此。

由于资金来源的复杂性，要确定在这部分社会政策上花销有多大是非常困难的。官方资料估计，用于文化娱乐的社会基金（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的）支出在1971至1978年期间翻了一番，达到22亿马克^⑧。这差不多相当于家庭纯收入的8%。这方面无法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料不包括非常庞大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有关支出。

3. 消费和生活水平

尽管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认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并非仅仅是一件满足物质需要的事情，然而，国家总的消费水平和物质利益的分配则是一项领导者经常关切的问题。政府的政绩总是以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标志的，那些与公众联系最为直接的官方机构（如地方政府和工会）发现，影响物质生活条件的因素是群众不满和抱怨的最普遍根源。正如其它发达国家的群众一样，东德人倾向于相信个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自己功劳，而一旦个人的实际收入未能满足个人期望时便责备政府。结果，社会政策的物质方面代表着政治领导的主要部分，这种政治领导是为了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现代社会里，政府通过最高限价、价格补贴、货物及增值税，减免所得税等办法来改变消费结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美国人对农业补贴、天然气限价、汽油、酒和烟的税收非常熟悉。许多西欧政府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同样的做法。某些国家，如法国，政府税收的最大部分来源于增值税（或营业税），

这些税是对商品在各个生产阶段自然增长的价值征收的，这最终导致销售价格提高。产品销售税一般说来是税率递减的，这就造成了家庭收入较低的消费者纳税的比例也较大。相反，价格补贴是递增的。

在这方⾯，民主德国和其它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有下述三个特点：（1）受这些政策影响的商品的范围更广；（2）更为注意这些政策对消费的影响；（3）非常敏感于这些政策对再分配产生的影响。

价格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对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并刺激其它非必需的、但却是社会渴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②。全面的价格补贴计划是不现实的，但是，某些总的规定是可能的。对基本食品，尤其是面包和土豆的补贴上升到未经补贴的正常价格的大约23%。房租（60%）、取暖燃料（50%）、地方交通（60%）和长途旅行也都加大了补贴。国家对书籍、儿童服装和洗衣服务的补贴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以官方的粗略数字为基础来计算，“为稳定消费品（包括住房）价格”而支出的社会基金占一个典型家庭购买力的17—20%。所以，价格补贴是最大的单项社会基金支出。

另一方面，产品税（相当于西欧的增值税）又对其它多种商品的消费产生消极影响，这些商品包括大部分批量生产的日用商品、小汽车和高档食品。而事实上，产品税是最大的单项税收来源，约占全部税收的25%^③。对于有影响的商品来说，销售价格的平均56%是税收，这样的事实改变了消费。用这种方法增加的税收相当于一般家庭收入的40%还多。当然，面对产品税，“一般”家庭并不首当其冲，这种税收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较高收入的家庭。普通工人消费的一大部分被引向免税或补贴过的商品。

这种把对一些商品的价格补贴和对另一些商品的征税结合起来的⼆重价格政策导致三种主要后果：第一，所有基本必需品都得以充分供应，而奢侈商品（尤其是那些要消耗大量稀有资源的

商品)的“浪费性”消费则受到抑制；第二，这项政策成为财富再分配的一个重要过程。人们可以把由较富有的消费者在高档商品上纳的税看作是用来为较穷的消费者补贴基本必需品的税收来源；第三，这种双重价格政策扩大了由收入阶层决定的消费结构的差别。

第三点即消费结构的差别，其原因在于对不断增长的财富的消费。很明显，低收入家庭的大部分购买品是食物。当一个家庭的收入实际增长的时候，其消费目标将趋于转向较为昂贵的工业产品，如时装、洗衣机、立体声音响设备和小汽车等。这些热门高档商品的产品税是最重的，有时高达其销售价格的一倍还多。于是，一个收入即将进入中等水平的家庭（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增加对耐久消费品的购买应是可能的）会突然面临着十分高税务负担。这种“过渡型”家会感到挤进充裕的消费水平层并非易事。从整个社会来看，在那些消费方式平淡和那些克服了价格与税收障碍而取得充裕快乐的生活的家庭之间，已经出现明显的分离。

官方声称已经成功地贯彻了价格稳定的政策，对此须持一些保留态度。已公布的支持这种说法的价格是那些典型消费者“购物筐”中典型商品的价格，西方也采用这样的做法。在任何这样的范例中，把“购物筐”的效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比较会产生问题。自从1960年（该年的价格为东德的不变价格）以来，消费偏好已转向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购买，这些工业制成品并不包括原来的商品种类。即使政府补贴保证了基本食品价格的稳定，这也不意味着东德的消费者逃脱了物价上涨。

原则上说来，稳定物价的政策目的在于稳定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是，对于新产品、重新设计的产品或者是包含着越来越昂贵的进口材料的工业制成品来说，情况则有所例外。许多观察家认为，产品更新是一种“看不见的”通货膨胀，因为，在实际上提高了价格的地方很少或根本看不到产品的改进。进口原材料的成本能改变消费物价的事实揭示了一条渠道，通过这条渠道，

国外的通货膨胀可以渗透进一个或多或少封闭的经济体内。

经济学家们有时认为，商品短缺基本上等于通货膨胀，因为二者都表明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在民主德国和其它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央指令性经济缺乏西方市场经济对消费者意愿的适应和反应能力。结果，生产者常常面临处理大量积压而又无人愿要的商品的难题。比如，近些年来，某些“时髦”服装时髦得声名狼籍，洗衣机也因使用不方便缺乏吸引力而销路日蹙。短缺问题更为普遍，最严重的时候连服装和食品也要购买进口的。当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出乎意料地超出了计划生产的数量时，在中央计划控制下，生产者不能相应地增加产量。尽管私人小汽车的生产能为国家提供大量产品税，但是，产量却被有意识地控制在远低于需求量的水平。近年来少量地进口大众拉比茨小汽车并不能明显减少等待买车者的人数，而只能激起那些缺少金钱和特权来得到这种西德产品的人们的愤慨。

私人储蓄额的稳定增长是衡量富裕程度提高和消费需求过剩的一项指标。一旦某种热门货可以买到，就立即会有大批消费者带着他们的储蓄来一买而光。购到某些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在时间和地点上都赶巧的事。而在零售商店有朋友和熟人或是有着那种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出去购买东西的工作，则不失为一笔财富。

某些额外需求可以通过“外汇商店”来满足，这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的西方货币而设立的免税商店。1974年以来，民主德国公民可以合法地拥有外汇，这些外汇通常来自西德游客。今天，大量的、数目不详的联邦德国马克在民主德国流通。这样的外汇常常是通过“外部经济”活动获得，如给管道涂防锈漆或粉刷房间之类的工作。（这种临时性收入从来不申报所得税，所以，官方的国民收入资料中得不到反映。）政府允许民主德国公民在外汇商店购买东西，而不用声明其外汇来源。毫不奇怪，这种情况被认为是“双重货币”体系而引起了报纸和工会的报怨^⑤。既然一些社

会成员没有正常的方式获得西方货币，那么，人们就断言，“双重货币”体系会导致有害后果。政府因此放弃了一项扩大外汇商店的计划。

政府并不否认存在着长期的消费品短缺的问题。官方公布的国民经济情况几乎总是承认这种事态，但同时又许诺要使事情有所好转。对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计划投资和对更好地进行市场研究的鼓励措施都未能阻止1978年以来不断加深的短缺。另一方面，长期忽视的服务行业已经有了真正的（如果不是十全十美的话）改进。

消费品供给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并不能改变东德人就大多数方面来讲生活得相当好这一事实^②。从营养角度来看，食品的消费已经过剩。各种食品（肉、水果和蔬菜等）的人均消费量已相当于其邻近的较富裕的国家。土豆、面包、黄油和牛奶等东德人的典型食物的消费量要大于这些国家，而家禽、咖啡和酒类的消费量要小于这些国家。差不多100%的家庭都有收音机、电视机和电冰箱，其它家庭用品的拥有量稍微低于联邦德国。组合音响设备也越来越流行，只是在私人小汽车，当然，还有现代化住宅的拥有量上，民主德国大大低于西欧国家。但是，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两种商品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所有日常消费品种上，东德的消费价格都要高于其它欧洲共产党国家，即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也是如此，而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60年代中期生活水平都是最高的。有传闻说，东德的成就，尤其是加上瓦尔特·乌布利希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唱高调的习惯，一直是民主德国和苏联关系发生磨擦的一个暗中的根源。1971年以来，东德画报在苏联的发行量被明显削减了，这也许是因为画报描绘了一个显然更高的生活水平。

随着遍及全国的大量旅游，东德人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水平是较高的。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及政府并未因此而得到多少报偿，人民的支持并没增加。大多数人宁愿把目光放在联邦德

国的生活水平上，而不把东欧的水平作为比较对象。人们之所以把目光集中到联邦德国，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也因为联邦德国的生活经常不断地被他们耳闻目睹。每年有近200万东德人到联邦德国去旅游，有近800万西德（包括西柏林）游客前往民主德国。而更重要的是有超过80%的东德家庭收看西德电视节目。

由电视和人与人的接触所传递的信息清楚地表明，虽然在提高生活水平上东德取得了确实的进步，但它在不断地落后于联邦德国，而且落后的速度正在加快。国家统计资料也许表明，民主德国就数量而言大部分消费品可以自给，然而，这并不反映在几乎总是变化着的时尚和工艺上它也能如此。在这最直观的领域，民主德国注定只能停留在“第二个德国”的地位。

但是，同东德自己的过去或同世界一般水平相比，国家的社会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在保证就业平等、缩小收入差别、促进家庭和睦、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以及为全体公民提供良好的医疗条件等方面，这个国家创造了丰功伟绩。不足之处也大量存在，特别是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和住房状况令人反感的恶化。许多局限都来自发展计划积重难返地相悖于实际情况，来自国民经济全面的紧张状态。经济管理体制或者政治领导体制对物质进步可能起着制动作用，其程度很难说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制约作用也同样只能做出含糊的估计。

共产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在物质利益和义务方面应该提供哪些东西，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政策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将会发现民主德国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在他们眼里，消极方面肯定大于积极方面。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毫不奇怪，它为世界人民提供了许多教益。

【注释】

-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新党章》，《德国文库》第9卷第7期(1976年)，第750页。
- ② 彼得·C·卢兹：《党内精英的变化》，科隆：西德意志人出版社，1968年版，第294—323页。
- ③ 冈特·曼兹，琼娜·温克勒等：《民主德国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柏林：学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0页。
- ④ 中央统计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柏林：国家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 ⑤ 于尔根·斯特拉斯堡：《新工资政策的实验？》，《德国文库》，第9卷，第9期(1976年)，第950—958页；迪特尔·海伯尔：《论民主德国工资体制的重新调整》，《德国文库》，第10卷，第11期(1977年)，第1226—1228页。
- ⑥ 哈特穆特·齐默尔曼：《民主德国工资制度的改革》，《源泉》，1977年，第3期，第114—117页；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237—238页。
- ⑦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240页。
- ⑧ 同上。
- ⑨ 齐默尔曼：《民主德国工资制度的改革》，第114页。
- ⑩ 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05页。
- ⑪ 同上，第322页。
- ⑫ 社会保障管理署：《1981年全球社会保障计划》，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社，1982年版，第88—89页。
- ⑬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68页。
- ⑭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05、206页。
- ⑮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250页。
- ⑯ 同上，第256页。
- ⑰ 同上，第347页。
- ⑱ 各种社会保障权益的资料均出自同上第362—374页。
- ⑲ 威纳尔·鲁斯：《民主德国的退休金》，见《德国文库》，第14卷，第1期(1981年)，第53页。
- ⑳ C·布雷德利·萨尔夫：《东西欧社会保障政策的相互联系》，《国际政治科学评论》，第2辑，1981年第1期，第57—72页。又见国际劳工署编的《社会保障费用，1975—1977年》，日内瓦：国际劳工署，1981年出版。
- ㉑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63页。
- ㉒ 同上，第254—256页。
- ㉓ 国际劳工署：《社会保障费用》，第18页。
- ㉔ 有关家庭支助政策的资料均引自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126—133，421—429页。
- ㉕ 吉瑟拉·赫尔威格：《论民主德国家庭教育的优先地位》，《德国文库》，第12卷第12期(1979年)，第1311—1315页。

⑳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第2版；科隆：科学与政治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484页；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20—326页。

㉑ 联邦统计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1年统计年鉴》，斯图加特，科尔海默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638—639页。

㉒ 同上，第689—691页。

㉓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第482—484页；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26—331页；康斯坦丁·普利策：《两个德国健康医疗方面的集中与分散》《德国文库》，第14卷第12期（1981年），第1284—1296页。

㉔ 除注明出处的以外，所有关于教育培训制度的资料均引自《民主德国手册》，第294—316页。

㉕ 联邦统计局：《德意志联邦德国1980年统计年鉴》，附录，第27页。

㉖ 格特-乔基姆·格拉西纳：《经济与教育计划》，《德国文库》，第11卷第9期（1978年），第937—956页。

㉗ 吉瑟拉·赫尔威格：《培养坚强的战士：论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关于高等教育的决议》《德国文库》第13卷，第5期（1980年），第462—463页。

㉘ 除注明者外，关于住房的资料均引自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24—130页。

㉙ 同上，第214—215页；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00页。

㉚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01—302页。

㉛ 同上，第303—304页。

㉜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27页。

㉝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04—305页。

㉞ 同上，第107页。

㉟㊱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30页。

㊲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15—316页。

㊳㊴ 同上，第312页、第306页。

㊵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第632—634页。

㊶ 曼兹·温克勒等：《理论与实践》，第377—389页。

㊷ 同上，第246页。

㊸ 赫尔威格·E·哈斯：《民主德国经济不断加重的资金负担及其对国家预算的影响》，见《德国文库》，第13卷第12期（1980年），第1277—1281页。

㊹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178—182页。

㊺ 汉斯-迪埃特·舒尔兹：《速取钱，快购物》，见《德国文库》，第12卷，第5期（1979年），第451—453页。

㊻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18—223页；又见约亨·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奥布拉登：莱斯克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319—353页。

六、一体化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东德的社会政策是由各种各样的方案构成的，这些方案旨在全面提高生活水平，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物质利益，消除由不同收入和阶级出身派生而来的生活抱负实现的障碍。为了这样一些目的，民主德国提出的目标显然也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追求的。同这些社会福利国家相比，民主德国既显得更雄心勃勃，又有点成就不佳。

但是，东德社会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告诫人们，要警惕从纯粹物质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政策的倾向。人类的生存已远远不是仅仅满足物质需要，它还包括生活的知识与精神方面，即对自尊、理解、归属感和创功立业的需求。据说，正是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它真正的优越性。甚至象美国这样强硬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在满足人民物质需要方面取得了尽管不稳定，但却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资本主义在物质方面的成就据说只能导致在人们之间，在那些由于拥有经济特权而享有人生自由的人们和那些由于经济上的从属地位而致使人格发展不充分的人们之间，造成加深分歧和对立的后果。东德社会主义经过对比认为，经济发展和人格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人的存在是多方面的，它体现在家庭生活、工作场所、日常社会交往的过程以及在地方和国家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等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首先是“社会”动物，他只有在有其他人的存在的社会中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因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摧毁一切阻碍人们交往的经济和文化障碍，这些心理上的隔阂和对立是资本主义社

会的产物。

如果说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作用的多样化和组织机构的复杂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细入微而使得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组织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人们在交往联系和相互团结的思想观念上却遭到了相应的失败。共产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旨在通过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崇尚集体利益和反复灌输以合作而不是对抗为基础的价值准则来挽回这一失败。在承认个人需要和能力有差别的同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社会政策把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社会宣布为自己的目标。

1. 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准则

民主德国创建初期，政治领导人们广泛发表讲话，号召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即一场同心协力的斗争，用更有益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代替资产阶级的社会价值准则（利己主义、实利主义、社会歧视等）。在那个时代的精神下，这场斗争带有明显的好战色彩。人们不应忘记，当时经济管理、政府部门、法律部门、乃至教育部门的许多领导职务都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占据着，缺乏经过训练的社会主义干部使人事政策上的这一让步成为必需和迫不得已的事情。客观力量逐渐使这场斗争中的利害关系尖锐化。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政府的代理人要求拿出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亲西德集团公开鼓动东德人摒弃他们的新政府及其政治哲学。人民的情绪无疑倒向后者一边。

只要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前途仍处于捉摸不定的状态，大部分公民就不会接受它的统治主张。由于移民们处境困难，明显的反对态度是危险的，于是，当时对政权的拒绝一般只是表现为对官方宣传的社会价值准则的强烈抵触。人们无视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任何内在优点，他们嘲弄这一思想仅仅因为它是由被苏联扶植起来的政治领导层提出来的。

在短期内，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层对于引导人民通过参加游行和其它鼓动活动投身于文化斗争这一或多或少成功的努力感到满意。显然，某些领导人过于乐观地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了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准则转变的证据。他们对发生于1953年并在整个50年代里持续不断的各种形式的强大反抗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只是到了1961年永久关闭了柏林边界的时候，人民群众才开始接受新政府的永久地位，也只是从那时起，文化变革才算严肃认真地开始。

在这一转折点之前和以后，关于社会价值准则斗争的主要观点基本未变。第一，新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现着德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伟大的进步性转变，这个转变从本质上说不同于以往任何转变。苏联的干预使这一革命性转变成为可能，要深深地感激苏联。第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这些敌人主要是联邦德国的统治阶级和美国，他们不择手段地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进行暗中破坏。胜利地制止这些威胁实际上不仅仅是造福于东德人民，而且也保证了欧洲的和平。第三，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建立在全体劳动人民平等的基础之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人都不得利用集体力量来剥削他人或破坏集体财产。第四，除阶级敌人外，所有的阶级和社会成员都在新社会的建设中起着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虽然个人的贡献大小和报酬多少会有差别，但是，这些差别丝毫不侵害不分性别、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全体公民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这些差别不是社会歧视的根源，相反，它们是相互尊重的焦点。第五，每个公民都对自己和社会负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特别要指出的是，个人报酬和社会发展取决于每个人利用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的积极性，这些教育和培训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成为优秀的社会生产者。懒散马虎和放荡不羁将毁掉自己的人格并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第六，每个公民都要在道德的制约下为国家和周围人们的幸福承担责任。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

心和对国家大事持消极态度被认为是个人软弱的表现。参加旨在改善个人工作条件和住宅区群众生活条件的活动则被看作是完善人生的必要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观点的相对强调之处都发生了变化。例如，被渲染的外部威胁的迫切性已不那么肯定，一般说来已逐渐趋于消失。把苏联的功绩置于首要地位的做法也有了变化。特别是在乌布利希时代的后期，在民主德国对自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感到光荣和自豪的情况下，苏联的作用明显地黯然失色了。一些次要的论题也产生了变化，诸如竭力称许社会变革的“科学性”（乌布利希的又一个热衷点）；节俭和诚恳这样的个人美德的价值；建立牢固的家庭关系的必要性；以及社会和谐对不同观点——产生于起不同社会作用的人们——广泛理解能力的依赖。

2. 儿童社会化

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社会的努力依赖于传导适当价值准则的结构。社会化结构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但往往没有明确的图案。主要的社会化影响通常产生于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家庭权力关系和模仿父母对外界的行为及态度，建立起与政治相关的价值准则。显然，父母对这一过程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形的。在一个领导者要实行社会变革的社会里，家庭社会化——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当推行现代化政策的政治统治集团面对非常传统化的人民大众时，就尤其是这样。这种情况已经最为生动地表现在苏联和后来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里。另一方面，在较为稳定的社会里，家庭社会化对于保持社会秩序又是无价之宝。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社会化都是引起公众关注的事情，因为，家庭社会化会使青少年形成某些后来可能导致对社会造成破坏行为的价值准则。减少这种潜在消极因素的一个方法，是鼓励或要求

青少年上公立学校或接受学前教育。这样，把孩子们置于公共权威之下，就有可能消除家庭社会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教育者拥有和实践一套共同的价值准则所达到的程度，以及文化的同一性程度，都能为下一代提供保证。在今天的民主德国，全面的教育培训和统一准备的教材，为同心协力实现官方的社会化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幼儿园的高入园率和托儿所的高入托率则是又一有利条件。

学校的正式课程是为服务于这种社会化而特意安排的。历史和社会学科的教学充满着鼓舞人心的民族英雄的轶事和这个民族解决人类问题的优越能力的大量事实。在这方面，东德的做法与西方民主国家大同小异。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这些课程中收编自另外一个国家，即苏联的英雄人物及历史事迹的比例是很大的。此外，其它科目，包括数学、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也被巧妙地插入了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数学问题被用来描述资本家如何计算他从工人那里偷来的“超出”工资以上的价值。许多体育训练也体现为准军事性质，为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准备。研究表明，在民主德国，和在其它地方一样，为教育青少年树立指定的政治态度所做的种种努力并未取得特别的成功，而从幼儿园到十年一贯制学校期间的全部教育大概才是意义重大的。

对于大多数7至14岁年龄的孩子来说，参加少年先锋队是全部学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先队活动以爱国主义、文化活动、体育活动、职业训练、公共服务为主题。少先队是一个有指导、有组织的集体，它在维护学校纪律，保证学校性质方面承担了某些责任，是一个适龄人都期望加入的组织。

这些官方规定的社会化实践的效果经常遇到问题。虽然很明显，孩子们功课都很好，但他们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离经叛道的能力。换言之，他们懂得如何不用树立人们所期待他们树立的价值观就回答出人们期望得到的回答。既然在不可捉摸的公共交往中人们期待的回答是由老生常谈和不痛不痒的词句构成的，那么

知道人们所愿意听到的回答当然就是重要的。孩子们也发展了把人们(如教师和团体中的领导者)奉为现实的和潜在的权威以及忍让顺从的技巧。

由于所有年轻父母本人都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以,他们给自己的子女树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榜样,而这些子女正需要学会判别公私价值标准。诚然,任何生活于现代社会的父母们,包括自由民主国家里的父母们,都起着相似的作用。他们也懂得在一定情况下虚伪谨慎的重要性。比如,他们也会精明地依从自己所讨厌的上级,也会对无能的老师礼貌地加以溢美。但是,对于东德人来说,上述的“一定情况”则要广泛得多,而且错误的判断所导致的后果——从给自己学术和事业上的雄心壮志所造成的损害来看——要具有潜在的、大得多的严重性。

3. 大众传播媒介

相当大的报纸发行量和几乎普及了的收音机、电视机使大众传播媒介成为社会一体化的重要手段^①。全国有38份日报,总发行量为830万份。统一社会党地方和中央的报纸(包括《新德意志报》)占总发行量的大约2/3。青年组织主办的《青年世界》占大约10%;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办的《论坛报》占大约5%。4个非共产主义党派主办的报纸的发行量都低于总发行量的5%。另外,还有500多份月刊杂志和周报,从带插图的妇女周刊《为了你》到供各级党的官员阅读的《团结》。许多期刊杂志都集中反映不同职业集团的特殊兴趣和利益。政府播放2个彩色电视频道,每天播放时间合起来有19至20个小时。

民主德国非常严格地限制西方出版物,比匈牙利和1981年以前的波兰还要严。一般说来,这样的出版物只允许党政、经济和教育机构使用。来自东欧和苏联的出版物可自由发行,但是,除了那些感到起码要有一份苏联期刊杂志才算谨慎小心的知识分子外,很少有人购买这些出版物。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时候,

人们对捷克报纸的狂热兴趣曾导致政府对这些报纸的短期禁运。

无线电传播媒介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于西柏林的电台、电视台位于德国的中部，所以，除了南部山区以外，整个民主德国全境都能收到西德的收音机和电视节目。（要想效果良好地收看彩色频道需要有一个差转器，这可以在外汇商店买到）。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禁止观看西德电视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的广播电视是东德政府高级官员们新闻和娱乐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中许多人是国际辛迪加美国节目的热心观众，这些节目由西柏林电视台译制，最通常的内容是犯罪和西方戏剧）。

于是，电视成了了解联邦德国高水平生活的便利工具，这也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世界重大事件的各种不同观点。对公众进行的调查表明，东德人似乎对西德政治家而不是自己的领导人更为熟悉。在最近 10 年里，西方电视已成为民主德国本身政治和经济情况的越来越密切的消息来源。当 1971 年末电视记者被首次正式允许进入民主德国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被人们认了出来。东德公民甚至在大街上走上前去要求他们对专门问题进行报道。

西方传播媒介的这种渗透给统一社会党的官员们带来了特殊负担。对无线电和出版宣传的审查制度仍在实行着，比如，不得传播某些经济、社会和军事资料及消息，不许对东德或苏联领导人进行直接的批评。然而，为了对西方电视的报道做出回答，许多难堪的事情也会予以播发。所以，民主德国的电视尽管仍然有明显的倾向性，但却已经逐渐转向更为客观公正地报道的方向。东德电视记者已经确切地觉察到他们正面临着为争取本国电视观众而展开的竞争。努力发展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报道形式，努力反映公众意见和情绪是记者职业骄傲的源泉。民主德国的记者们在争取更高的职业水平方面要比东欧和苏联的同行们走得更快。

4. 文学和艺术

在任何社会里，社会价值准则和民族特性都能通过文学、音乐，表演和造型艺术表现出来。统一社会党文化专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艺术形式无不打上深深的阶级烙印。“最优秀的”艺术家很显然地被统治阶级支配着，而为人民大众的艺术却是令人乏味和逃避现实的。正如前章所叙，社会主义民主德国不断努力使所有形式的艺术为社会各阶层服务，同时，使文学艺术更加符合普通群众的现实生活。

在早期的民主德国，党同作家、艺术家的关系特别紧张。在当时斯大林主义的要求下，作家和艺术家被责成进行创作，作品的目的在于通过塑造普通工人的杰出成就来激发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态度。作为对苏联“现实主义”的这种原始做法的尖锐反应，东德作家抗议说他们不会“根据计划进行创作”。由于发现自己作品的大部分都被出版社打回，很自然，许多作家实际上确实只能根据预定的公式来创作“文学”，塑造肤浅的公民形象，这些人暂时的困难和麻烦总是通过正确的“社会主义”行为得到克服。

由于受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文学政策的影响，东德作家们不断试探统一社会党的政策限度，但并未取得持久的成果。1963至1965年，出现了几部主要作品比较坦率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困难。虽然在政策上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但是，有关的出版部门在做法上出现了松动灵活的迹象。

1971年，埃里克·昂纳克对众宣布：“一个人如果从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那么，在我看来，文学艺术领域对他就可以没有禁区。”至此，他便在文化政策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第二年，统一社会党主管文化和科学的书记库尔特·黑格表示了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为了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我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发展多种多样的风格与形式。他说：“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者，我们懂得，矛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污点’，而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动力。”黑格反对文学艺术上的纯客观态度，而赞成“党性创作原则”，即“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从思想和感情上自觉地全力去解决矛盾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答案”。^②

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发生了根本变化。作家们不再被告知他们必须写什么，而是应当由他们去努力满足“不同的文化和艺术需要”。当然，禁区仍然存在，文学不许攻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和国家现任领导人或苏联及其盟友。

民主德国文学上随之而来的变化表现在引人注目的文学形式的实验以及对生活中心理和精神上的更为复杂的冲突的描写。事业的挫折和性生活的混乱被大量描写。在许多小说里，劳动人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逃兵。有些小说甚至以悲剧为结尾。然而，所有作品都道出了某些社会真实，至少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仍在感染着众多的人们。这股最新的文学艺术浪潮也许不会总是表现为毫不含糊的社会主义价值准则，但是，它确实为更多的读者再现了他们共同生活状况。就这一点而言，它毫无疑问地产生了更为广泛的一体化影响。

5. 有计划的社会一体化的各种危险

统一社会党所设想的一体化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最注重处于个人和全社会之间的社会结构形式。人们远非一个一致的群体，他们或构成集团，或构成集体，各自有着某些不同的需要和能力。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步骤是：首先，在一些最小的集体里建立纽带关系；然后，在一些较大的集体里建立联系；最后，发展超越职业和阶级差别的社会一体化观念。实际上，这个一体化逻辑顺序不是按时间排列的，其发展过程证明，三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的。

按这种方式有意地改变社会面临三种风险：第一，负责实施和评价一体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可能会只注意一体化运动的表面现

象。“自愿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数目，在夜校注册学习的工人数目和参加为邻居打扫卫生活动的青少年数目——所有这些按数量计算的参与程度受到党的干部高度赞扬。由于党的工作中明显的官僚主义，无穷无尽的报告文件必须被集中并向上级组织传送，最终送至中央委员会各个部门和书记处。负责基层集体化运动的干部会夸大报告中的数字或者诉诸赤裸裸的高压手段迫使人们就范。这样，全面集体化的过程将变得充满高压手段和不信任情绪，这与社会理论家的愿望恰恰相反。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都追求个人的明哲保身，避免任何不满言论，结果以致于放弃为使本单位的工作搞得更好而应承担的责任。集体里的人们见面时往往只是说些空洞客套和与他们共同的工作没有关系的话。这种冷漠和虚伪也以更广泛的形式染及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活动。在这种极端的压抑下，人们体验了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令人精疲力竭的分裂。

由于不久前经受了第三帝国的专制统治，领导集团及其负责的领导成员经常重演这种压抑性的统治形式并不令人惊讶。在短期内，这种压制性手段卓有成效地保证了社会秩序并揭露了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许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顾问的主要目的。但是，对群众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讲，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而又影响深远的。

然而，这种导致集体分裂的情况远非普遍的。在社会的许多部分中，已建立的集体纽带被证明是很富有弹性的。这样，就产生了新政权的第二个风险。为了长远需要，集体中的成员会同意形式上的顺从而在实际上却保持自主的生活。另外，虚伪之风逐渐盛行起来，集体成员正是在这种虚伪之风下才得以互相支持。

尽管这种状况是比较普通的，但也是有害的。集体准则逐渐变成抵制任何可能被认为支持新秩序而又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例如，学生们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们在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义务性课程的学习上只求取得最低的及格成绩。企业

单位力求保持最低水平的工作实绩。这些集体中不愿随大流的成员则被当作“滚到了另一边”的人而受到排斥。这多少也是一种压制行为。

在某些较大的工作集体中出现了不同的结果，那里的前纳粹工会成员形成了核心。在那里，工人们在等待苏联军事占领结束，期待社会民主国家出现的同时，也愿意为国家的重建主动做出贡献，为个人所得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当然，他们的期待是毫无希望的。幻灭逐渐在这些集体中蔓延并于1953年爆发了罢工。

在“最低纲领派”和“社会民主主义”占上风的集体里，名义上的领导干部不能完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些干部本身就是蒙骗上级的积极同谋；有些则被证明是领导无能之辈但又企图对上级掩盖这一事实。

同计划性社会一体化相关的第三种风险来自前两种危险和党的领导人常常提到的“不当的干部工作”。由于没有干部提供的真实可靠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对社会一体化的真实程度总是不能正确地把握。如果低估人民群众已经接受期望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程度，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可能会保持对社会活动过分集中的控制，这样，就会使国家失去个人和集体完成复杂的任务和推动社会发展所应有的积极主动性。最悲观的领导人会通过反对大部分的社会改革并建立庞大的警察力量来揭露暗藏的“敌人”（这是非常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以求把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正是斯大林的模式，他对社会发展的全部信条就是：怀疑。如果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一体化的程度，领导人会鼓励公开主张不相容的要求，由此便会导致广泛的社会冲突并有可能危及领导制度本身。1956年匈牙利事件最为生动透彻地说明了这类错误。

东德共产党人喜欢为找到了最佳结合点，为决定了变革的正确步骤而自我庆幸。据称，民主德国在最小的社会动荡下取得了最大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对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探索“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做出非正式评价的时候，这种夸口就鼓吹得最为

活龙活现。有迹象表明，统一社会党并不反对人道主义的目标，事实上，民主德国曾比其邻国更好地避免了斯大林主义的最严重的影响。但是，很可惜，误入歧途的捷克改革者由于“走得太快”而危害了其长远目标。

确实，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也有过错误时期。最明显的表现是整个50年代同工会的对抗以及大量人口流往西德。但是，到了60年代末，乌布利希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人民大众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上的统一在不断增长。”^③同时，党的其他领导人却对这个问题持明显的审慎态度。自1971年昂纳克上任以来，更加强调的是社会一体化的不足和在“各阶级与阶层联合稳定的社会”里逐步克服“各种非对抗性矛盾”的必要性^④。

6. 共同计划 共同工作 共同管理

在现阶段，即昂纳克所称的“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主义”阶段，德国统一社会党显然是在对过去的成就和目前的现实进行头脑清醒的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的。在追求社会一体化目标时矫揉造作的做法已经少得多了。特别是在主观努力方面，往昔尊崇科学的激情已显著地消失了。党和其它社会团体组织的干部已不再被教以控制论的基本知识，相反，他们瞩目的是个人品质的进步和把“人的工作”做得更富于感染性。

这样的事实引起了人们特别的注意：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念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那么，即使用各种最复杂的手段——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学艺术——来传播这种观念，它也会被很快摧毁，如果同“冷漠无情的官僚主义者”相遇已是家常便饭，那么，人民几乎不可能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而予以接受；如果政府官员和工厂经理们“只是形式主义地”履行他们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么，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就很难兴旺发达，富于活力；如果工人们提出的问题遭到奚落，工人们提出的建议被不做解释地加以拒绝，那么，他们在计划过程中主动承担责任的：

主人翁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富有意义的社会一体化不仅仅是通过学习和标语口号产生的，而且是通过实际参与，通过承担并履行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某些方面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产生的。干部工作不应当只追求参与者的数量，而应当特别强调保证参与活动的实质内容和效果与社会主义目标相一致，这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东德的这种要求公民们“共同地计划、工作和管理”的体制在过去 20 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制包括三种形式：政治党派、社区团体、职业和利益集团。

政治党派

统一社会党拥有影响巨大的、独占的政治权力。它是所有其它组织形式的核心与关键，因而，它在性质上也是与众不同的。虽然统一社会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但是，其成员资格的要求是很严的。而所有其它组织对任何符合其一般成员条件的人都是开放的。

作为原来在苏联占领的最初时期实行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部分，其它 4 个政党的存在受到了支持。这是联合不同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国家重建斗争的一项努力。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是从希特勒统治之前延续至今日的。在向统一社会党统治日趋明朗化过渡的战斗性时期，坦率直言的两党领导人遭到有意地排斥。今天，这两个政党的党员大部分来自中等资产阶级、专业人员、店主和个体手工业者，换言之，来自在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之外就业的人员。尽管这些人通常情况下不可能被吸收到“工人阶级政党”里来，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圈里常常起着重要作用。

在统一社会党严密监督下，基督教民盟和自民党被允许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公职，并成为其成员的特殊利益的代言人。事

实上，这两个政党是对话的主要渠道。比如，虽然两党被迫赞同1972年政府把大部分半私有企业收归国有的决定，但是，在对企业所有者进行赔偿的细节上充分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基督教民盟被官方认为是东德基督教社会的政治代表。这个党在保证修改有关学校课程和兵役的立法中，以及在修改1974年宪法涉及到宗教信仰的条款中起到了有益的作用。1972年，2/5的基督教民盟代表投票反对堕胎法，这是人民议院仅有的一次未能一致通过议案的记录⑥。

德国自民党的党员数目一直停滞在大约7万5千人左右⑦。这个党在人民议院和国务委员会(各党都可以参加)中都有席位，该党的一位领导人现任司法部长。基督教民盟党员数目在过去的10年里增加到了大约14万人。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和邮电部长是该党成员。

国家民主党是为了争取前“小纳粹”加入社会一体化过程和吸引前第三帝国士兵们的国家主义感情而创立的⑧。该党成员已逐渐下降至大约8万人左右。它的一名成员现任国家合同法庭的首脑。

德国农民党在吸引集体农庄社员参与政治方面并不完全成功⑨。它的党员数目增长到大约9万2千人左右，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以前的城市居民，他们是取得了农学和畜牧学学位后才从事农业的。

社区参与

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和住房面积尽力公平分配方面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明显地打破了以往按收入差别形成居住区域的格局。今天，除了少数高级官员外，有着不同社会和职业出身的家庭在同一个居民区住着同样的公寓建筑。因此，居民协会为建立一体化联系提供了机会。

全国阵线(见第二章)的区委员会必须保证每个居民区或公寓

群有一个志愿代表。这个代表的理想人选应是非全日制工作的并且不在任何政党或社会团体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一个居民协会成立后，就要象其它任何社会机构一样，正式地负责照管居民的全部利益。但是，它的实际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居民协会通常只是打扫一下卫生，布置一下每年一度的国庆节（10月9日）活动，推举可靠的出庭陪审员和为5年一度的选举列出本区投票人。除此之外的其它活动则依社区不同而明显地不同。较大的居民区都有托管孩子和娱乐的设施，那里的居民协会就要负责看管这些设施。在住着许多老年人的居民区里，居民协会就要相应地负责照顾他们的健康和社会需要。

总的来说，居民协会对促进社会一体化没起多大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大多数公民在工作单位里已经参加了过多的集体活动而不愿再把业余时间花在有组织的活动上去。大多数就业女性认为，晚上和周末必须得做家务杂事。最意味深长的是，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业余时间花费在看电视上。

较有意义的社区参与形式出现在地方政府的公民委员会里^④。每个城市、城镇和镇产生8—10个与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相关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地方政府和政党（统一社会党和其它政党）的官员组成，他们负责有关政策和来自有影响的行业部门和居民区代表工作。处理具体社会政策的委员会是最能发挥作用的委员会。如住房、零售商业、卫生、教育、青年和体育、文化、交通运输等委员会。

大多数委员会至少一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评价满足公众要求的工作情况。尽管某些浮夸的形式主义尚难避免，但是，民主德国的宣传机构和外国观察家都认为，公职人员的批评是常见的。由于议论的问题并不涉及政权的完整性（如，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统一社会党的作用、外交关系等），所以，讨论往往是非常开诚布公的。负责的官员被提醒注意自己的缺点并保证克服它。公民们一般都懂得政府中央集权制对地方官员的限制，所以，人们主

要关注的是官员在对公众要求做出反应时的诚意。一个总是不能赢得公众信任的官员可以被换掉，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市长和统一社会党地方组织第一书记的态度以及能否找到合适的替代者。

公民委员会中的参与远远不是普遍的。其中掺杂有大量的自我选择。参与者几乎都被限定为“超出一般”的人，其中大多数人在各自的工作中表现出色，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公民委员会在分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些公民委员会也许是东德努力发展的、被西方人作为政治民主加以接受的最突出的一种民主形式。

司法管理方面有明显的共产主义社会参与形式。民主德国鲜明地奉行马克思列宁的原则；社会主义法律起着深远的教育作用。虽然欧洲总的法规传统被遵循了，但是在实施法律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加强社会主义秩序，允许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结果，司法过程包含着明显的“教育”成分，从这里可以看到具体案件与有关的主要社会宗旨之间的联系。

公民参与还通过社会法庭制度得以保证，社会法庭是仿效苏联的“同志法庭”，最早成立于1953年，当时称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劳工纠纷。1963年以来，农村地区也成立了社会法庭。法庭的权限已经延及包括范围广泛的不当行为：较小的民事纠纷、工人提出工资和奖金方面的要求以及不正当的解雇、有关其它的管理，如逃学。工作单位会议或社区选出人组成社会法庭，其方针由自由德国工会联盟或司法部制定。社会法庭由8至15名非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组成，然后，在公共礼堂里和没有专业司法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庭。

粗略地比较起来，东德的社会法庭颇似早年美国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地方官主持审判的法庭，那时的司法审判带有更多的朴素和民粹主义的特点。社会法庭采用的是社会标准，这是由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决定的。由于避开了审判程序上的形式主义的规

则，所以，无论什么问题，只要对于确定案件的事实和被告的动机以及其它与最后判决有关的因素(包括工作表现和阶级出身)来说是需要的，非专业的陪审员们都可以提问。还经常向同事和邻居了解情况。可能的判决包括公开谴责、赔偿、为公众服役和罚款，但是没有监禁。

社会法庭受专业司法人员的严格监督。在确定哪一级案件应由社会法庭受理的准则时，最高法院起着主导作用。地方法院是上诉的渠道。最重要的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检察机关监察社会法庭的所有判决，而地方检察官则有权起诉，组织审讯，甚至否决社会法庭的判决。早年的社会法庭常常出现对“阶级敌人”“特别宽大”的例子。如今，国家检察官大有可能通过列举社会法庭依据的未经证实的判断或不注意缓和事态，对社会法庭的判决作出有利于被告的改变。社会法庭被不断告诫不要毁掉与社会疏远的公民，并且还被要求加强通过各种途径对那些只是暂时违犯公共秩序的人给予集体的帮助。

对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社会法庭似乎是把公民纳入一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准则的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

职业和利益集团

为了一定的目的，把东德的人口划分成阶级，或者按区域划分成选区选民是有用的。但是，一个更为显著的观点是按人的社会功能不同来划分的。阶级合作主义的社会观点认为，不同的社会功能说明了社会各部分对社会总实绩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贡献。与保守的阶级合作主义哲学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力求缩小人的社会功能差别并否认这些差别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心理上的后果。然而，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的社会功能的差别确实地存在着。统一社会党社会一体化政策把现实存在着的人们社会功能的差别体现为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个主要基础。

最重要的社会团体组织是以职业为基础形成的，这一点合乎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决定因素的观点。这些团体组织中最大的是自由德国工会联盟，它的发展目标包括所有国营经济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⑩。只有集体农庄社员、个体职业者和现役军人除外。目前它的会员总数超过 820 万人，大约相当于合乎入会条件人数的 97 %。与某些欧洲和美国的工会不同，自由德国工会同盟是按经济部门而不是按职业组成的。所以，它有 8 个产业工会，另外还有食品和商业、政府和公共部门、国营农业、卫生、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军队中的文职雇员等工会。

每个工会都是该部门全部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部门主管人员和各种技术等级的工人的代表。这样的构成目的在于消除企业或机关中各职业阶层的差别并激发合作和集体意识。过去，这种构成曾被用来反对非体力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傲慢与偏见，然而在今天，地位等级仍然存在。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指出。

由于自由德国工会联盟是直接地“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它的任务非常艰巨。它所要做的工作简要地列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促进全体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地参加增产节约，提高效率和开发新资源；（2）使全体工作人员熟悉生产计划并通过管理人员与工人联合委员会参加制定和评价年度计划；（3）领导工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更大成绩；（4）保证工资和福利规定的遵守；（5）保证管理人员认真地处理工人的建议和付给适当的奖金；（6）维护工作纪律和防止专断的管理行为；（7）促进工人的培训和个人事业的发展；（8）实施有关劳动保护法；（9）帮助决定文化基金和社会基金的使用；（10）维护会员住房和消费方面的正当权益；（11）管理社会保障体系。工会和其它社会政治组织机构有着重要联系。政府的各级代表会议中都包括着一个实质上的工会代表团，统一社会党各级执行委员会也都包括一名工会联盟的代表。

按照统一社会党自己的定义，它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

的先锋队”，因此，作为自己成员“利益的代表”的工会联盟的存在确实有点例外。虽然事实上工会联盟的差不多各级官员都同时又是统一社会党党员，但是，民主德国（事实上其它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表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工会与执政党之间的对抗。近些年来，工会联盟的地位已被明显地提高到了超过其它社会团体组织的程度。新宪法赋予工会特殊的权利。1976年的工资改革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工会联盟执委会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的合法产物，这意味着一种党——工会——政府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①。眼下，还没有理由不把这种变化看作仅仅是有名无实的。不过，工会联盟看来确实社会一体化计划中体现着独特的机会和问题。

与工会并存的是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团体组织。工业技术俱乐部^②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团体，其成员有27万人，来自工会联盟的各个分会。这个团体的目的在于鼓励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技术革新。由于大多数工业技术俱乐部成员拥有大学或工学院的学历，他们也许在各自所在的地方工会里形成了半精英的亚群体。

其它社会团体组织都是职业知识分子的，它们有律师联合会，记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作曲家和音乐家协会、电影电视工作者协会和作家协会。这些团体组织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们的成员是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工作的，还因为他们的成果对统一社会党的文化变革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出于对作家和艺术家的重视，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允许他们比其它社会集团有更多的团体自治权利。结果，在这些协会和统一社会党文化专家们之间不时地发生争论。

第二个最大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德苏友好协会^③。大概550万名成员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组织可以对他们追求的学术、职业和政治的发展大有好处才加入它的。由于德苏友协小组主要是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组建的，所以它有双重的职责：宣

扬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领袖的苏联取得的成就和德苏同盟的好处，与相同的苏联小组交流经验。这第二个职责包括学习苏联出版物和到苏联访问“兄弟工人队”。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⑭无论从社会一体化还是从政治领导层的后备力量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的组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有大约 220 万名成员，约占 14 至 25 岁年龄人口的 70%。绝大部分成员来自 14 至 16 岁年龄组（占 96%）和军队（占 86%）。农村青年的代表严重地不足，来自大学的成员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多，但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普遍的看法认为，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积极成员的记录是被加期中学和以后高等学校录取的先决条件。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发展了日益丰富多彩和富有吸引力的活动。当然，其基本目的还是一样：促进人们追求如本章开头所概括的那种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体育比赛、文化和政治培训、专业咨询、夏令营和公共服务。在爱国主义的庆祝活动中，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小组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参加者。在选举日，还要靠他们来提醒选民们参加投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领导是工厂青年人（52%的是工人或学徒工）和地方政府部门青年人的代表。据信，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性道德上持越来越“现实”的态度，并且越来越快地发展了迪斯科夜总会和其它现代娱乐方式。

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有 140 万名会员，约占女性人口的 16%^⑮。尽管集中全力在非就业妇女中吸收成员，但是，家庭主妇入会的仍不到其总数的 1/5。近 10 年来，妇联领导人不断地直言呼吁需要拿出办法来解决有工作的母亲所承受的特殊负担。这也是工会联盟妇女委员会所强调的一个问题。最近，妇联开始为妇女提供包括婚前和离婚咨询在内的社会服务。

另外三个利益集团组织也值得提及。德国体育运动联合会^⑯促进了多种多样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其中包括足球、体操、游泳、钓鱼、马术、摩托车和汽车赛等。它有 280 万

名会员，大约有一半年龄在18岁以下。并非所有的体联活动都是娱乐性的，体联成员的许多成果都为促进世界水平的比赛做出了贡献。文化协会是一个有21万名会员的社团组织，它旨在促进人们对表演、绘画、雕塑及写作艺术的欣赏和参与^①。

乌拉尼亚(Urania)^②是专业知识分子的团体。它的36万名成员通过杂志、电视和讲学为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做出了贡献。

7. 参与层序

我们前面所探讨的社会一体化过程和社会组织只不过是指出了东德社会理论家和政治领导人为建设一体化社会结构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这些努力及其结果对人们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很难予以评估的。但是，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观察有助于证实这样三个概括：

第一，虽然所有社会团体组织的成员总数非常之大，事实上已超过了民主德国的人口总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真正的参与者。相反，这成员总数中的大部分是按人口的小集团来计算的，而小集团中的许多人具有多重社会身份。比如：一个男性插图画家有可能同时属于工会(艺术家工会)和德苏友协团体。由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仅仅完成自己日常的专业工作，所以，他还可能加入文化协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如果他有社会活动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并因自己的工作出色而受到重视，那么，他所在的地方工会就会帮他在市议会文化委员会获得职位。他的业余活动不仅为他提供了个人满足，而且还显示出他的公民倾向，也是职务提升的有用途径。同样，一个青年建筑工人可能属于工会联盟、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体育联合会。在较为少见的情况下，一位化工厂实验室的女技术员可以同时是工会联盟，妇联、工业技术俱乐部和德苏友协的成员。他同样可以是工会妇女委员会成员和实验室“社会主义竞赛”的领导。

人，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作者和模范公民，她甚至还有可能是一名统一社会党党员。

第二，在很多情况下，参加社会团体组织只意味着最低限度的参与。对于参加多重团体组织的人来说，现实的时间限制使得他由于忙于更偏爱的一些团体中的活动而不能履行对其它一些团体的义务。另外，任何团体组织都不鼓励正式结束成员资格的做法，实际上，这样做会招致不愉快的查究。人们加入这些团体组织只是为了获得好处，满足工作的愿望，或者仅仅是为了一个同某团体组织主管成员发展个人的关系而已。当得不到这些好处时，成员便离去。不过，他们的名字仍然被组织的领导人保留着，领导人想以此作为成绩的证明。纯粹名义成员的数量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可以肯定，在那些最大的组织里，其数量也是最多的。

第三，十分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参与层序，它与社会地位和升迁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每个人都属于两个“基本”组织——自由德国工会联盟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之一。有升迁愿望的人必须在这一基本层次上起到某种领导作用，并被鼓励加入另外的社会组织，至少是德苏友好协会。每一阶段的进一步升迁都需要获得另外的组织成员资格，各种组织越来越专门化，要求越来越高。组织成员资格的扩展是与前途相关的：一方面停滞也就意味另一方面的停滞。停滞出现或许是出于自愿，或者是相反。无论是哪种情况，个人都继续保留自己的组织成员资格，尽管它会逐渐失去许多实际内容。

把这种团体组织之间交叉重叠的网络结构主要看成是由特意安排的统一社会党干部们监督人民群众的一种体系，这样的观点在西方学者中曾一度风行。在民主德国初期，把当时的情况想象成有组织的控制显然有其正确性。但是，30年来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的社会化教育的成就，使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控制作用大大地减轻了。

今天，社会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参与的实在报酬，提供了党政领导与具体社会部分对话的渠道。但最主要的是，社会组织网络——参与层序——的存在，留出了社会地位和报酬。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机会，这不可能完全真实，但是大多数公民只要通过等级层序努力奋斗，就可能获得有影响的社会地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在每一层次，都有许多人被抛置在一边，一些人感到满足，一些人却深感失意。即使在地方社区获得重要影响的也只是少数人。

社会学家们也描述了西方民主国家中类似的社会地位等级层系和升迁阶梯，但是在民主德国，社会升迁在重要方面是不同的。民主德国不同于一些比较多元化的国家，它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个人社会发展的道路，教育、就业和社会与政治参与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中起着作用。结果，只有一条道路。大多数东德人在生活的早期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尽最大努力向前迈进。当要求变得太高以至难以达到时，他们便会在一个舒适的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可选择的道路，几乎没有机会日后再去追求生活的实际变化。

8. 一体化与选择

民主德国的社会一体化过程是全面而彻底的。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播媒介和有意识地利用文学艺术等途径，年青的东德人很容易适应于普遍的社会价值准则。但是，直接来自父母和周围人的实际感受保证不了普遍的价值准则同典型人物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价值准则完全一致。

只是在保证大多数公民对社会地位升迁的规则和个人进步的优势有共同的认识方面，依靠参与政治、职业和利益组织而促进一体化的努力才算有了成效。诚然，许多人的进步可能不会遇到资本主义社会常有的一些障碍，特别是产生于地位和父母财产的一些不平等障碍，然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一体化的意义还局限在

一些最小的集体里。

民主德国遵循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报酬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正如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坦率承认的那样，这个原则——通常被称为“成就原则”——产生着它自己的社会差别形式。在致力于建立一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了，而选中的则极少。

〔注释〕

①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科隆：经济政治出版社，1979版，第372—376页，第858—860页。

② 沃尔克·格兰肖，《民主德国的文化政治》，西柏林：沃尔克·斯皮斯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267页。

③ 摘自赫尔曼·埃克森，《民主德国充满自信地大踏步前进》，见《德国文库》，第14卷，第12期（1969年），第1404页。

④ 奥托·莱因霍尔德，《根据纲领草案形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统一》，1976年，第8期，第286—287页。

⑤ 《民主德国手册》第926页。

⑥ 同上，第665—666页。

⑦ 同上，第761—762页。

⑧ 同上，第247页。

⑨ 同上，第445—446页。

⑩ 关于工会的讨论主要引自C·布雷德利·沙尔夫，《民主德国社会中的工会组织》，又见《民主德国手册》，第351—362页。

⑪ 《民主德国手册》，第697页。

⑫ 同上，第576—577页。

⑬ 同上，第467—468页。

⑭ 同上，第362—367页。

⑮ 同上，第249—250页。

⑯ 同上，第258—259页。

⑰ 同上，第626页。

⑱ 同上，第1110—1111页。

七、社会政治差别

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谈到当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时，往往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再许诺，“要逐步克服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同化各个阶级和阶层。”^①

前面各章论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旨在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纲领和党的政策。本章拟就带有 80 年代东德社会特征的社会政治各阶层作一概述。这里，首先讨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划分的三类主要社会成员：合作社农民、工人和职员以及知识分子。随后一节的基层“干部”与上述三类成员有交叉关系，这些人在其所在的工厂和团体担任特定的领导职务。一小部分社会名流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与这个按等级排列的社会结构相并立的其他两类社会成员——宗教界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也有专门讨论的必要。

1. 合作社农民

合作社农民约占东德农业劳动力的 2/3 (1965 年占 3/4)^②。其余的农业劳动力通常是国营农场或者食品、肥料、机械、牲畜防疫和良种培育等国营单位的工人和职员。这些国营单位的职员参加了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农业分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与工业工人相仿佛，因此，他们被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一批农业合作社是 1945 年至 1949 年土地改革时期建立起来的。当时，许多农民第一次获得了“所有权”。对于某些人来说，集体共享贫乏的资源是最公正的生存之路。以后的 10 年，在

经济上采取了少量补助以吸引农民，但是，集体化的速度依然相当缓慢。最后，1959年至1960年，统一社会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集体化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通过不让个体农户获得种子和饲料的办法实现的。自然，当时许多待种的土地只有任其荒芜，许多饥肠辘辘的牲口只有牵向宰场。尽管东德避免了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曾经发生的大量暴力和对肉体的折磨，但是，这次冲击还是给大多数农民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记忆。

今天，合作社农民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他们的收入起伏不定，仍然依赖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但是，他们至少可以获得相当于工业工人的收入。他们在合作社工作而获得的基本报酬大大低于城市工人^③。然而，他们的家庭收入却往往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家庭养殖、种自留地（人均3/4英亩至1英亩）和到城里帮工获取外快。那些自愿将土地献给合作社的以前的土地的主人还可以有少量分红。

尽管集体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但是，他们还是时有怨言。由于维持了农产品价格，合作社的收入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逐渐增加机械设备投资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作建筑开支。他们急需建造房屋以使新设备免遭日晒雨淋。他们的牲口棚、仓库和民房都已经年久失修。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当长，有些合作社农民平均每年加班加点达三百个小时^④。

大多数合作社农民都住在私人住宅里。尽管他们的住房比城里宽敞，但是，一般都缺乏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大家庭屡见不鲜，老年人显然不愿意离开土地。集体农民不象工会会员，他们没有文娱津贴，退休金也相当有限。在农村中消费品的短缺尤为普遍。然而，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电视机，他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生活与外界不同的生活作比较。

青年人大都随自由德国青年旅行团到过柏林，他们特别意识到了城乡生活的差异。许多青年渴望进城工作，但是，有才华的青年除了上农学院，很难获得深造的机会。从农学院毕业的学

生，大都要回乡当农技师。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在城里找到了工作的人又不愿忍受城市社会对乡下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在苏联也同样存在。

合作社农民在政治上也受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尽管一部分是由于农民自身的因素，但是，严格说来，在统一社会党党员中，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合作社都没有自己足够的代表。即使是党和政府主管农业的最高级官员也缺乏农村生活经历。对农村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反映了统一社会党干部政策的长期影响，他们的政策常常是把能力较低的干部派到乡下去。难怪许多干部力图通过专横跋扈来掩饰自己的无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发言人曾经承认上述缺点，并且说，一定要加强集体农庄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

1977年，修改了合作社条例的总则部分。显然，这次修改加强了对合作社的领导，扩大了干部队伍。这次修改也促进了工作任务的进一步专业化，促进了各个农业单位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协作。显而易见，专业技术人员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来回奔波，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燃料。另外，农民们还抱怨说，频繁的会议除了使相互依赖的单位易于推脱失误的责任外，不解决任何问题。

2. 工人和职员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习惯用语给我们描述东德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困难。根据东德的思想意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社会差别。所谓非体力劳动者，又包括服务行业的熟练职工和不熟练职工以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即“白领”阶层）。这样，大量参考材料交杂在一起。例如，有关家庭消费的材料，“工人和职员”就混杂在一个标题之下。由于“工人”一类既包括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又包括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职员”实质上包括了剩余下来的许多不同职业，所以，上述

习惯说法掩盖了社会分工的本质。

最近10年，东德的社会科学家对这个包罗广大的“社会阶级”的工作生活状况所进行的研究是有限的——有时，甚至对这个阶级内部不作任何区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1975年以来发表的研究材料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详细材料较少，同时，不愿意得出整体上与既定政策不符的基本结论。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到昂纳克的断言，他说，科学家——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泥坑，已经严重地脱离了党的“现实社会主义”实际政治利益^⑤。

然而，只要把已经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和其它各种材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外国旅游者的观感）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能够得出关于这个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初步结论。

官方资料表明，工人和职员阶级有770多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89%。如果从中减出知识分子人数，那么，就只剩下了大约63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73%。在这些人中，有40%已经完成了“专业技术工人”课程^⑥。尽管官方报纸对于获得这个文凭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个文凭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必然联系。

关于这个成分复杂的社会阶级，前面的章节已经谈到。工人和职员家庭毕竟是“具有代表性”的家庭，大多数社会政策都是针对他们制定的，他们代表了“共同的”利益。是他们构成了大量社会组织，特别是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大多数。

由于每个人的家庭条件、工作地位和个人经历不一，所以，这个阶级内部出现了重大差异。上述各种因素形成了一部分人的优势，同时，这些人又要花时间应付竞争。

东德的资料把两个父母都工作，并且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作为典型家庭。没有迹象表明，对于不准备要孩子的父母存在歧视现象，但是，这种选择也不受社会的赞许。同性恋家庭在人口统计时不被承认。单身成年人总是假定为丧偶的人或离了婚的

人。文化准则和官方政策大力鼓励结婚和养孩子。

妇女们日益热心于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再加上现代的节育方法，这就逐步推延了年轻夫妇们要第一个孩子的时间。孩子对家庭生活会产生深刻影响。有时候，父母们为了保证他们的孩子有更好的住房条件，或者更加便于抚育，他们会更换自己的工作。年轻父母敏感地意识到了教育程度和良好的“社会经历”（如，参加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没有违法行为）对于孩子的生活的影晌。他们尽可能地增加与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时间，例如，利用法定的照看孩子的假日。同时，大都认为，年青人是否能够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们是否能够克服一些必须与当局打交道的小困难，基本上受其父母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因此，父母们力图保持良好的工作履历，他们设法参加自由德国工会联盟，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地帮助他们的孩子。

双重的责任——更多地关心孩子和花更多的时间于工作和社会活动——使父母们非常紧张。尽管最近对劳动法进行了修改，减少了劳动时间，工人们一般还是每周工作42小时，某些工种甚至工作44小时^①。由于没有明确规定许多西方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简便手续，时间的不够愈加严重，因此，方便食品大受顾客欢迎。早些年，政府强调大型的、位置适中的超级市场的作用，现在，作为补充，在其周围渐渐地恢复了零星的日杂供应点。熟食品和省时省工的家用设备也非常畅销。为了洗一件衣服和修理一件电器而长时间等待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自7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已经承认私人企业对于满足人们上述需要的关键性作用，为了实际需要，已经放弃了进一步减少自由市场和服务性企业的政策。

只要有孩子在上中学或者大学，父母们就有责任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尽管孩子们有助学金，可以免除学费，在大学里还有生活津贴，这些都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一旦孩子们正式就业，尽管他们还可能继续在家里住几年，但是，对于父母来说，生活

却发生了变化。这时，父母们很容易获得去国外旅行的机会，尽管这种旅行通常只限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时，祖父母照看家庭花园的负担也会得到减轻（德国人习惯于在无人利用的空地上，如公园边，铁路边，开辟小花园。）

但是，这一时期的生活也很容易变得十分单调，尤其是大多数人在此以前很久就达到了事业上的稳定期。只有较为年轻的、能更好地胜任工作的人才有提升的机会。尽管其所在单位有责任让他们接受成人教育，但是，参加成人教育几乎没有什么报酬。由于父母的社会地位对成年子女的生活影响很小，所以，父母们失去了承担额外义务的刺激。父母双方工作负担的突然减轻也可能毫无价值。许多人在50岁时发现自己的生活并不理想。无怪乎，他们通常对自己的生活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对于那些比自己更为成功和更有特权的人，表现出愤愤不平。

上述概括是有一定根据的，它既适用于工人，又适用于其它各类职员。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肩负着特别繁重的负担。例如，许多工人的工作都有生命危险。60年代后期以来，工会集中精力抓了这个问题，现在，某些工业部门的故事率已经低于西欧^⑧。不过东德工人要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空气污染、噪音和有机的化学物质的危害。对于从事生产的工人来说，时间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和办公室职员相比，他们不仅每星期要多工作2—4小时，而且，下班以后，还要承担更多的参加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的负担。另外，大约100万工人是从事两班倒或三班倒生产^⑨。尽管轮班生产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都稍微短一点，但是，这不足以弥补打乱正常的家庭生活所带来的不利。最后，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没有条件——许多办公室工作人员具备这个条件——偶尔离开一下工作岗位到附近采购货物。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它有助于减轻家务负担，有助于买到短缺的商品。

在谈到东德工人阶级——即工人和职员阶级——时，有必要

强调指出，这个阶级内部逐渐扩大的生活水平的差异直接与事业上的成就相联系，而事业上的成就又取决于教育程度，取决于在某一组织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是，整个职业结构起到了筛选的作用，这个筛选过程所带来的不同阶层的差别总是不令人愉快的。

在以往的斯大林时代，人们必须防备国家安全警察。无论是别人无中生有的诬告，还是与旁人的一次偶然的交往，都可能引起警察的横蛮干涉，同时，还可能带来事业和前途的毁灭。现在，国家安全机构依然存在。——而且相当明显，人们还是会遇到安全机构和其它公共权力机构的麻烦。但是，今天，这些机构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制约。任意伤害人的情形大大减少了。

今天，人们至少知道了要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成功，必须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因此，那些错过了生活中的机遇的人——考核不及格，工作上出现疏忽，或者无谓地得罪了领导——都可能产生自责。大量注重心理描写的东德小说反映了这种综合症。有时候，这种失落感非常深刻，甚至引起酗酒、夫妻不和、离婚和自杀。

对于前途暗淡的人，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安全警察打交道。一些枝节问题，如工作中的冲突，可以通过调换工作来解决。但是，调换工作往往不太容易。调换工作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事业的继续发展，还不如说是为了情绪的放松。从一个工作调到另一个性质不同的工作，其间很少有一个过渡。

确实，比较而言，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也存在事业的羁绊，而且日趋严重。尽管西方各国政府并不经常宣传社会政策的成就，但是，以物质积聚为基础的文化水平，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势力和社会特权的分配，对于同等程度的成功和失败，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当然，由于事业上的挫折而带来的心理分裂症并非是东德社会主义的专利，但是，其间有着重大差异。与东德社会不同，

在自由民主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和社会组织，人们由此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自信，再者，除了美国的“道义多数”之类的运动，对于在生活上标新立异的人，社会很少谴责。

统一社会党的宣传机构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这个社会在财产继承和社会权利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一部分人逃避了社会责任。他们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由参加社会建设的人们组成，所有的人都在基本相同的环境下从事他们的事业。

如果我们仅仅集中分析东德的工人和职员阶级，就会发现，统一社会党的“机会均等”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也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前面谈到了合作社农民的不利地位。下面再讨论一下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优势。

3. 知识分子

在现代东德的习惯用语中，“知识分子”并非就是有知识的人的同义语。这个称号并不说明一个人的才能和生活方式。它仅仅是已经在大学获得了学位者的统称。从传统和现状来看，德国人都把获得学位证书看作是相当体面的事情，知识分子都具有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某些特征。

统一社会党的文件强调，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和工人、职员具有相同的所有权关系。然而，知识分子通常又被当作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当作工人阶级的一个分支。1983年，东德的知识分子大约有150万人，这些人都拥有学位证书，拥有科学家（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医生、教师、工程师、艺术家、作家等头衔^①。

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东德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在向西柏林开放边界期间，知识分子曾先后设法向西德迁移，为了赢得这些高级人才的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向他们提供优

越的薪金和住房待遇。今天，在物质上，对知识分子继续采取了优待政策。知识分子的收入一般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三倍。尽管知识分子表面上不享有住房分配的特殊待遇，但是，他们每个人在知识分子圈都有一个社会关系网，这个关系网能够确保他们在分配住房和购买紧俏商品时受到优待。

即使是同一个企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即使他们属于同一个劳动集体，除了工作时的联系，彼此也很少来往。不过，城市工人清楚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工人。知识分子的家庭布置和工人有显著差别，他们大都拥有私人汽车，他们的雅致的乡村别墅——周末休息场所——在郊区随处可见。工人只有省吃俭用才有可能一年去一次高级餐馆或酒吧间，而知识分子却是这些场所的常客。

祖辈们的一种信念稍微缓解了工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特权的^不平，这种信念认为，有知识的国家领导人“理应”有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统一社会党的教导又大大促进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消除。工人大都意识到，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工人地位低下的讽刺意义。

统一社会党当局认为，知识分子自然形成的优越性并不证明他们就高人一等。他们认为，工人的劳动成果和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同等重要。就社会出身来说，今天，确实有许多知识分子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因此，根据官方的观点，谁在社会管理方面负有特别责任，谁就应该获得特别的报酬，对谁都一样。

当然，还可能有另外的观点。有充分证据表明，知识分子的孩子更容易再成为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父母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图书资料，他们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他们的孩子更容易到最好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就读。知识分子母亲很容易找到非全日制的工作，这样，使她们有较多时间辅导孩子。考虑到这些差异，工人出身的学生上大学有一定的优先，但是，这只能勉强降低知识分子的孩子在整个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在招

收的新生中，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成绩偏高。

在一个鼓励人们不断攀登事业高峰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的不满实际上可能就是对那些达到了人们渴望达到的目标的人的嫉妒。虽然决定谁上中学和大学只取决于极微小的分数差和偶然的主观估计，但是，实际上，能否上学所带来的后果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在一个“工人国家”里，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是由这个人摆脱当工人的能力来确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个“工人国家”的本来意义了。

4. 干部

官员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在欧洲日常用语中，这个词仅仅指政府官员或者履行公务的人。德国统一社会党有一个类似的概念，那就是“干部”。所谓“干部”，是指那些“因为其政治才能和专业特长而担任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行政人员和专家职务”的人^①。在第三章已经提到，统一社会党的一个基本职能是在社会各个行业中选拔干部，确保他们得到严格训练，并把他们安排在行政、经济、教育和所有其它主要社会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希望社会由有才华的人来管理。因为社会包罗万象，所以，干部遍布其他各类社会成员中间；又因为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担任了干部职务。

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想主观地、粗略地将干部划作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任何复杂社会都必不可少的领导者。这些人承担着管理职责——领导着生产企业、产品销售企业、学校、军队、警察、工会和许多负责税收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的行政性单位。通过培养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些干部——“管理”干部——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领导专门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性工作所必需的广博知识和决策才能。

尽管信息系统和奖励制度不健全，管理干部还是要对自己的领导工作负责。例如，党政机关负责人、企业职工和消费者都可

以监督一个企业经理的工作成效。工作条件的优劣、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其它各种管理效果都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同样，医院院长要对卫生工作负责，工会主席要对安全生产和改善工作条件负责。

实际上对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者几乎没做什么处置。但这种缺陷的存在并没有改变管理干部依据工作性质对实物产品负责的情况。

与管理干部相比较，我们可以区分另一种类型的干部，我们把他们叫做“政工干部”。政工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给人们灌输集体协作精神、社会自豪感和对国家的忠诚，促进社会一体化。事实上，每一个部门都有政工干部。其中有一些容易辨别，如负责文化工作的企业联盟领导人，主管宣传工作的市委第二书记。另一些政工干部的头衔不太明显，如负责公共消息的企业副经理和医院副院长。

所有政工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企业或者机关的具体工作明显相脱离。他们很少参加产品生产和服务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制订口号和召开会议，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强调尽职尽责的必要性以及贯彻统一社会党关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决议。政工干部的某些工作也许确实会带来有益的效果，但是，无法确定他们的工作对于社会一体化是否有积极影响。

有必要补充一句。显然，社会交往并不只是政工干部的任务。管理干部也常常承担这个任务，他们或者以此作为他们主要工作的副产品，或者以此作为一项附加义务。如，演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普通职工也可能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促进社会交往。造成政工干部与管理干部以及普通工人相脱离的是他们的基本的、或者说特定的工作性质。实际上，政工干部是职业“啦啦队长”。

政工干部的另一个特点是，很难衡量他们的工作的预期成果。诚然，人们可以计算一下墙上的标语和出席企业会议的人数，然

而，对于传播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基本目标来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由于这个问题，政工干部实际上无法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负责。这样，他们是否能够保住职位和得到提拔，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赢得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相应的宣传部门的上司的信任。

难怪他们的同事都把政工干部看作拍马屁的人。人们普遍认为，能成为政工干部的人都是平常工作相当糟糕的人，这些人试图通过“拍马屁”来获得他们本来无望获得的东西。大多数工人认为，政工干部是生活中的一种严酷的事实，是一种必须忍受的现象。而一些职员坚持认为，尽管有政工干部存在，他们还是形成了完美的社会主义集体。应该避免与政工干部的公开对立，因为，这可能阻碍事业的进展。

在某种程度上，政工干部被认为是施展手段的人，是些不受欢迎的人。由于他们谋取了利益，人们怨恨他们。尽管他们担负的实际职责与管理干部有明显差异，但是，许多政工干部的级别都与管理干部相同。这样，他们被任命担任特定的社会职务，获得额外的职务补贴。这些补贴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造成了他们所在单位的工资负担，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

5. 社会精英

上面对三类主要社会成员——合作社农民、工人和职员、知识分子——以及与这三类成员有部分重复的干部作了详细阐述，下面再进一步讨论东德社会的上层。与前面不同，这一节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推断性。东德新闻界和官方文件很少披露社会精英人物的情况；社会科学家甚至断然否定这一社会阶层的存在。但是，根据个别交谈和个人观察，证明东德社会确实存在一个人数不多的、享有特权的社会精英阶层——大概不到 500 名重要人物及其家属。这里无法作详细描述，所以，下面仅仅提供一个大致轮廓。

东德精英人物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党政要人。据粗略估计，这一部分人包括 213 名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其中首先是统一社会党书记处成员，中央各重要部门负责人，部长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和党的各区区委第一书记。在第三章已经提到，由于每个人都主张把自己负责的部门作为社会政策的重点，所以，在这些人内部必然存在意见分歧。同时，柏林的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不同观点。然而，总的看来，中央委员会成员资格是公认的地位象征。拥有这个职位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

至少中央委员会也包括其它各界的精英名义代表。但是对于其它社会精英人物，有必要与中央委员分开叙述，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不是中央委员。

据估计，经济界的精英人物大约有 40—50 人，主要是经济企业，特别是大型工业联合企业的经理和厂长。军事安全部门的精英人物大概有 30—50 人，他们是人民军和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军官。学术界大概有 150 名精英人物，他们是科学院院士。全国 40—50 名著名作家和艺术家构成了文艺界的精英。

如果我们对这些精英人物进行全面地社会学研究，那么，大概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

1. 只有个人成就和私人关系(有人庇护)的结合，才能成为社会精英，而后者尤为重要。一些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认为，统一社会党的某些高级干部，个人才华并不出众，他们只是由于别人的庇护才达到了显要位置。昂纳克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的妻子是社会教育部长，内弟是中央对外情报部长，岳父是自由德国工会联盟负责西方国家关系的代表。

2. 社会各界精英内部都有庇护关系网的存在，这些庇护关系网从社会各界精英延伸到知识分子阶层，将各种社会精英人物联结在一起。当然，与党政要人相联结的关系网最为有用。很明显，统一社会党的高级领导人通过从事作家，和学者生涯，有时

还通过与作家和学者建立直接联系，甚至私人交情来获得个人的满足。当作家和学者的某一件文学作品或者学术著作受到另外某一个领导的批评时，他们就会发现这种私人交往的巨大价值。

3. 在柏林和地方之间，社会精英人物的相互联系或许有些差别，但是，这种相互联系对于召集各种社会精英代表共商公共事务，或者说社会事务，不是没有益处的。人们也许会发现，统一社会党的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某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共饮鸡尾酒，而这个领导又曾在党报上批评了这个作家最近的小说。问题是，尽管其内部存在差异，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精英还是形成了某种稳定的社会集团。

4. 这种“社会”特征的形成，部分地是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历着社会学家称之为缓慢的“社会精英循环”期。许多在过渡时期兴起的社会精英，现在在专业上依然很活跃。例如，在库尔特·哈格 1955 年担任统一社会党负责科学文化工作的书记以来，小说家斯特凡·海姆一直是文艺界名流。由于文化政策的不断变化，这两个人有过多冲突。无疑，他们都熟练地掌握了先发制人的手段。尽管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层的一致努力能够最终使某人失去社会精英地位，但是，象斯特凡·海姆这样的例子也说明了社会精英体系的稳定性，说明了才华与庇护相结合的实际效用。

5. 所有社会精英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具有相当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个人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好多倍。另外，许多社会精英都特别获得了一项或者更多项的社会名誉——国家服务勋章和突出专业成就奖，有 2000—20000 马克的奖金^②。文艺界名流一般主要通过版税取得最高收入。除了个体的表演艺术家和作家，社会精英人物都在党政部门或者其它公共机构中拥有高级职位。因此，他们都享有大量优厚的个人待遇。例如，他们都配有家庭服务员，可以到特设的商品供应点购买货物，可以单独使用文化娱乐设施。而且，社会精英人物没有普通公民的种种麻烦，例如，他们不受关税法、交通法的限制，没有日常的行政约束。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能够将这些优越待遇扩展到他们的孩子身上。至少，社会精英人物的孩子在学校具有优越性。他们也能够建立起重要的社会关系网。

6. 最后，很明显，社会精英统治了东德社会。他们握有巨大的权力，对于有志青年，他们能够在事业上提供重大帮助，也能够设置令人难以忍受的障碍。

6. 各阶层社会地位综述

通过对当代东德社会的全面考察，我们看到，极少量社会精英人物的社会地位高于三个基本的社会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比较复杂，他们不到人口的1/5，构成了社会的中上阶层。工人和职员差不多占人口的3/4，他们属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人数不多的合作社农民实际上被当成了社会下层。一般说来，国营农场职工和少量的个体农民大致相当于社会的中下阶层。自谋职业者大约占全国劳动力的1.6%^③，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因为，从勉强糊口的小店主，到富裕的大作家，都可以称作自谋职业者。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国家。首先，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之间财产差距较小。这里，不存在象美国农业季节工人一类的赤贫阶层。同时，也找不到西方社会的“大富翁”。即使最大的社会精英人物，他们的消费水平也很少超过美国的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由于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差距不大，所以，各个阶层的两极交界处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各个阶层的生活类型却有明显的差别。成年人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基本社会地位，同时，他们还感到，要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从而更接近上一个阶层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比较而言，美国人一般认为，要登上社会的上一个阶梯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就业人口日益向服务部门的专业化方向转变，这也许会导致对各阶层社会地位的进

一步研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

在东德，社会地位的变动——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有相当严格的限定。所有现代社会都把教育程度作为提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减少教育程度与社会出身之间的联系方面比西方社会走得更远。在东德，只有极为有限的社会精英家庭的孩子能够凭借家庭地位来弥补教育程度的不够。想当“官”的人可能勉强享有个人特权的优越性，但是，这种特权很少能够转变成实际的晋升。事实上，个人社会地位的一切变化都是在14岁至30岁这段时间由社会甄别的结果。这个时期所经历的挫折——学习成绩低劣或者与当局发生冲突——都会产生长期影响。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享受的特权就越多。由于大多数特权都与一个人的工作直接相联，所以，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尽量避免可能影响到他们工作地位的任何行动。这种状况使他们深深地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被号召在处理生产或者管理问题时发挥主动性，而发挥主动性就可能意味着要批评他们的上司——他们的上司拥有取消他们的物质特权的权力。

7. 宗教界

宗教界所反映的是与上述阶级和阶层不同的社会分化。事实上，大量的教会成员形成了打破阶级划分的垂直的社会联系。这样，教会既可以看作社会分化的机构，又可以看作社会一体化的机构。这里当然是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言。

一般西方人士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是和宗教相对立的。尽管在教会和政党的关系史上存在大量例证可以说明这种观点，但是，这还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加以澄清。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马克思的许多人道主义目标都可以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范围内找到明显的

根源；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大量描述——平等、友爱、团结——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早期基督教社会。马克思并不直接反对宗教教义，而只是反对19世纪欧洲的教会组织，这些教会组织在穷苦的人民大众中鼓吹忍让精神，要求他们接受“上帝安排的”现状。

20世纪，共产党和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部分地由两个因素决定：教义中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成份；教会是否愿意承认世俗的国家权力，是否愿意否认神权的世俗代表，如罗马教皇。教会在战后东德的命运不只是统一社会党不愿意与信奉宗教的人口的大多数处于对立状态的问题，它还是这些教会先前的倾向性和它们与新国家的特定目标和需求的一致性的结果。

因此，极为有意义的是，东德的主要教派正是那些最“世俗的”、在社会上最活跃的教派。长期以来，福音（路德）教派一直是社会改革鼓吹者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导者的根据地。很久以前，这个教派就与世俗政权达成了妥协。同时，路德教派的领导人也不时指责政府的某些具体作法，他们指责政府为了抵抗纳粹主义而使许多人牺牲了生命。与其它东欧国家的宗教领导人不一样，德国的路德教徒没有被轻易地指责为法西斯主义的同伙。除了罗马教皇权力的一定范围的运用引起了东德政府的强烈反感以外，上述情形也同样——尽管或许不太明显——适应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罗马天主教。总的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宗教组织比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宗教组织要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也许应该把波兰的罗马天主教除外。

今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估计拥有790万福音（路德）派教徒^①。这个数字相当于总人口的46%，同时也相当于全部教会成员的86%。象其它主要教派一样，福音派教徒的人数正在以每年大约2.5%的比例下降。这个教派代表了相当普遍的一部分信教公民。尽管在统一社会党党员、政工干部和其它干部中很少有信教者，但是，在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中，却有许多人是宗教教徒。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宗教是东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多

数社会部门都可以感到宗教的存在。

福音(路德)派教会创办了51所医院,还创办了上百个疗养中心、敬老院、游乐场和托儿所。这些设施的赞助人,大量是统一社会党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在各个教区里,这个教会拥有15000多名雇员。1946年以来,他们的礼拜仪式一直由电台广播,60年代以来,又由电视台同时广播。1978年以来,政府允许该教会广播重要时事、每月新闻概要及其评论。宗教宣传能够达到这种程度,是东德比其它东欧国家更早地、更明确地实行政教和解的反映。目前,福音教派在全国有5个周报。除了极少数例外,教会使用的宣传媒介通常不需要接受检查。当然,宗教仪式或者主教偶尔写给教会会众的公开信也无须检查。

教会的社会服务事业由国家财政补助,尽管新设施的建设不给补助。小型教区收入微薄的牧师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国家劳动法有一部分是由教会针对自己的雇员而撰写的专门章节。每5所主要大学中就有1所设有神学系,负责培养新的神职人员。神学系的学员可免交学费。

福音派教会拥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中没有受到影响。近些年来,建造新教堂所需要的土地,就是通过用教会的农用土地和国家的城区土地相交换的办法获得的。有几个历史悠久的教堂是民族的象征,国家已经投资修复使用。

教会的收入来源是:社会成员义务捐献的“教会税”(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再替教会征税);政府用于社会服务事业、神学教育事业、对神职人员的收入补贴和教堂建筑方面的费用;教会租给农业合作社的土地的地租。教会的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姊妹教会”的资助,这笔收入通常超过总收入的1/3。这些外援实际上大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欢迎,因为,这能够增加外汇,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上面从整体上描绘了福音(路德)教派的相当清晰的社会轮

席，描述了政府对这个不属于统一社会党创办的社会组织的相对宽容的态度。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教会组织相比，甚至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较小的教会组织相比，上述情形反映了福音教派的特殊地位。

为了协调政教关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基督教联盟，包括福音(路德)教派，卫理公会(37000 会众)，浸礼会(30000 会众)和 6 个小教派。东德的罗马天主教拥有 120 多万会众，在这个联盟中具有观察员的身份。东德的俄罗斯东正教的会众很少，而且没有具体人数。有些难以理解的是，1960 年，柏林竟然被定为中欧国家俄罗斯东正教的领导中心。

象在其它许多国家一样、耶和华见证会这个很小的宗教团体没有获得合法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它拒绝世俗政权的领导。耶和华见证会在组织上并未受到迫害，但是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拒绝参加平民义务军训，因此他们偶尔会受到指控。

犹太教的会众也很少，而且正趋于消失。1946 年，全国有犹太教徒 3100 名，到 1981 年，下降到了仅仅 750 名。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方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但是，政府并不公开歧视犹太人。许多犹太人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获得了社会安全补贴。最近，国家还投资重建了几个犹太教堂，并建立了几个新的犹太教堂。但是，目前东德没有培养犹太教士的学校，1969 年以来，犹太教士已经绝迹。

在东德，主要通过统一社会党宗教事务部和路德教、罗马天主教领导人之间的意见交流来发展政教关系^⑤。象路德教一样，罗马天主教也积极创办社会服务事业，在处理与统一社会党关系的问题上，这两个教派共同分担责任。统一社会党和两大教派交流意见时，通常在下列四个方面产生矛盾。

第一，尽管统一社会党对宗教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但是，他们的长期政策是要促成宗教的最终消亡。宗教的衰落应该归结于宗教人员日常生活的逐渐世俗化和“科学的”文化的传

播——这个演变过程与其它现代社会相类似。但是，统一社会党采取了审慎的步骤来加速这个过程。50年代，政府逐步废除了以前在中小学进行宗教教育的德语练习课程。并且，关闭了教会主办的青年俱乐部，迫使孩子及其父母抛弃了洗礼、坚信礼、教堂婚礼和葬礼，以国家提倡的相应的仪式取而代之。对青年的宗教说教只允许在教堂进行。近10年来，又限制了青年宗教活动的范围，如夏令营是不允许进行宗教活动的。

僧侣一定程度的许身寺院的誓约和他们生活的世俗化并行。但是，早些年，统一社会党和宗教界之间还是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常常引起政教对抗，使某些宗教人士遭到逮捕和流放。

第二，在教会权力和领土主权问题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与路德教、罗马天主教进行了长期斗争。多年来，西方各国政府追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否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合法地位。在他们看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苏联的军事占领区”。所以，在争取国际外交承认的斗争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东德的路德教与西德的路德教组织正式分离，要求罗马天主教的教区界线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界线相一致。直到1969年，东德的路德教才同意与西德教会组织分离，以作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部扩大宗教活动范围的交换条件。罗马天主教却一直不愿满足政府的要求。1972年，柏林管区最后脱离了波兰教会的管辖范围，西里西亚被正式承认为波兰教区。但是，罗马教廷仍然通过西德教会当局管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的宗教事务。罗马教廷对东德天主教的长期的、明显的影响，与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相联系，激怒了东德领导人。结果，罗马天主教领导人失去了他们的路德教同伴那么多的自由权力。特别是他们试图会见其它国家的天主教徒时，会受到政府的干涉。

第三，教会方面认为，政府歧视宗教界人士。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歧视与恢复行政领导的地位有关。除了少数例外，行政职务一般都由统一社会党党员担任；统一社会党和宗教界都普遍

认为，统一社会党党员和教会会众是不相容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来，宗教歧视的问题容易引起争端。一些教会领导人主张，参加宗教教育的青年不应该再接受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有一些报道谈到，宗教界以宗教歧视为由控告教育当局，并赢得了起诉。但是，宗教歧视是微妙的，很难加以证实。1976年8月，一名路德教牧师在公共场所自杀以抗议“对青年的镇压”。路德教会就此对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提出了严厉控告。事后，开展了广泛的政教协商，昂纳克一再强调，要确保全体公民的机会均等，并广泛宣传了加速教堂工程建设和与教会有关的社会服务设施建设的计划。

第四，教会充当了社会政策批评家的角色。部分地由于教会权力的扩大，由于教会和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定期磋商，一些宗教团体——特别是福音(路德)教派——取得了“忠诚的反对派”的地位。1978年3月，昂纳克和路德教主教阿尔布雷希特、舍恩黑尔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会见，这次会见可以解释为统一社会党对路德教的这种地位的心照不宣的承认。许多路德教徒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教会组织”的积极合作，一方面又希望和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保持“必要的距离”，保持对党的政策可以随时批评的姿态。近些年来，教会领导人一再强调，他们对于新的人工堕胎法，对于把军国主义作为社会教育的重点，持保留意见。这两个问题引起统一社会党讨论教会事务的兴趣。1980年，路德教主教的公开信和教会的舆论工具都提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认为这是对世界和平威胁的例证。在这个问题上，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宽容。他们审查了教会的报纸，并拒绝批准路德教会派代表团参加西德的宗教会议。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对抗，双方都决心达成长期妥协。路德教会完全卷入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充分利用社会批评的机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也承认该教会的存在是日常生活中无可辩驳的事实，他们希望尽可能多的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同时，统一社会党给了路德教会广泛的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有许多附加条件，当教会领导人超越作为反对派的可以容忍的界限时，统一社会党就会使用这些附加条件。

8. 持不同政见者

由于种种原因，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能算作单独的一类社会成员。首先，实际构成不同政见的特征和行为不很清楚。几乎和其它所有国家一样，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法将反社会行为与反政府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譬如，学生们破坏公共财物，这是否因为其损坏国家财产而看作是持不同政见的表现呢？袭击一个政府官员，是否一定要解释为政治行为呢？或者，是否有可能仅仅是某一个怪异的人想通过此举而使自己臭名远扬呢？其次，如果对不同政见加以区分的话，它有根本不同的表现形式。罗伯特·哈韦曼教授的非难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论文几乎不能和墙上的一条标语（俄国人滚回去！）或者和一位穿着印有“美国海军学院”T恤衫的少年相比较。最后，由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毫无联系，彼此互不承认，所以，不能说成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类别。

然而，把那些自觉采取和统一社会党的原则不同的政治态度的人从各主要社会阶层中再区分开来是十分有益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宗教界领导人有意识地就某些观点和统一社会党保持“必要距离”以外，另外三类社会成员中也明显地存在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是：青年；作家和知识分子；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遭到挫折的人。

青 年

虽然许许多多东德青年通过学校教育和参加自由德国青年的活动掌握了成功的标准和社会的规范，并匆忙走上了职业和社会活动的正路，但是，有些青年在生活早期就对社会与政治准则产

生不满。有两类青年特别易于产生不满倾向：那些由于中学成绩低劣而在高考中累次被淘汰的青年；那些出身特权家庭的不同寻常的孩子，他们很容易看到无知的“官僚们”是怎样愚弄老百姓的。这两类青年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联邦德国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公认差别在加剧。

青年人表达不满情绪的方式往往没有一定的常规。例如，许多年轻公民竭力模仿美国和西德的音乐、衣着和谈吐方式。这种倾向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他们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追求；这很可能仅仅是赶时髦，或者是一种向成年人的生活准则挑战的表示。

7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不同政见的民歌手沃尔夫·比尔曼赢得了大量青年追随者，他通过他的歌声揭露当代社会的虚假的承诺。据报道，1975—1976年，有几个东德城市建立了青年讨论小组——有的是利用的教堂设施。这些小组研究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研究东德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撰写的、被禁止流传的政治论文。后来，有些小组发表公开信抗议对沃尔夫·比尔曼的不公正待遇。因此，这些小组的领导人被指控为叛国分子，并“自愿”去了联邦德国。

有时候，青年人也被卷入自发的社会骚乱。这种骚乱的最明显的例证是1977年国庆节。当时，警察提前解散一个摇滚乐音乐会，青年们由反感而愤怒，以至毁坏了节日宣传标语牌，并高呼反对俄国人的口号。在随后的一些年，关于青年与警察的小规模冲突的报道又时有出现。

作家和知识分子

近些年来，东德作家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不满情绪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但是，并未形成气候。他们通常最反感外行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对文学创作标准和学术研究重点的确立横加干涉。在某些政治阶段，这种反感导致了统一社会党书记处领导人作为一

方，作家协会或者科学院各部门作为另一方的对话和磋商。1972至1975年昂纳克执政初期，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磋商阶段。

有些时候，作家和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对他们发挥专业作用有影响的问题，他们还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开展广泛的批评，这时，他们的行为更加符合一个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这样的批评通常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从更权威“或者”“更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攻击现行社会制度；另一些人联系现实提出了反官僚主义，或者说，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

70年代中期出现的两件触发事件，对这种批评基调形成公认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起了推动作用^⑩。第一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接受了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议案。这项议案包括涉及公民自由和家庭团聚的主要条款，这些条款主要是针对东德公民的。第二件是1976年6月的柏林共产党会议。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几个西欧的共产党采取了断然态度，毫不掩饰地攻击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残余，攻击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表面上要求团结，而在形成会议文件时又无所作为。

东德的知识分子以这两件事为由，要求毫无保留地给公民以自由，建议采取与西欧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更加一致的政治路线。持这种主张的人有许多是有身份的统一社会党党员。为了平息这场风波，统一社会党书记处剥夺了几个叫得最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权，并解除了他们在文艺和学术团体中的领导职务。但是，上述措施引起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极大反感，促使了他们的进一步联合。

罗伯特·哈韦曼和沃尔夫·比尔曼重新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核心露面了。哈韦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由于他在一系列的演讲中坚持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存在社会主义，1964年，他被免除了亨博尔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开除出统一社会党。他

曾经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⑩。同样，由于沃尔夫·比尔曼在诗歌中攻击现实社会，也被禁止参加演唱。在以后的12年，哈韦曼和比尔曼都在西德报刊发表文章，从而在东德拥有一批追随者。

1976年12月，经正式批准，沃尔夫·比尔曼到联邦德国开始巡回演出，在此期间，他被剥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权^⑪。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哈韦曼和几个曾经获奖的小说家，都严厉指责政府的这种不讲信用的不合法行为。于是，哈韦曼遭到软禁。有几个作家被开除出统一社会党和作家协会。少数几个人加紧进行有组织的对抗活动，遭到逮捕。其他人几乎没有超越法律界限，被“鼓励”迁移联邦德国。

然而，对于大多数不同程度参加了这种对抗性活动的全国闻名的作家、画家、作曲家和演员来说，监禁和流放并不是十分合适的手段。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不愿意失去整整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因此，统一社会党文化当局采取一种令人困惑的、在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们给某些不怎么顽固坚持不同政见的人以特权，而给另一些人以惩处或者流放^⑫。显然，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欢迎通常的强迫移民政策，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诚的公民。但是，移民政策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那就是使持不同政见者能够通过西德的宣传媒介向更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传播他们的观点。

在比尔曼事件之后，又进一步发生了两件事情，从而，给统一社会党内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火上加油，1977年夏天，统一社会党党员鲁道夫·巴罗通过一个西德出版商成功地出版了一本政治研究专著^⑬。这本名叫《抉择》的专著尖锐地、而且从学术的角度，批评了民主德国和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⑭。巴罗以“煽动反政府情绪”而被关进监狱。1978年1月，一家西德新闻杂志发表了“德国民主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⑮。这个宣言的匿名作者们自称是东德持不同政见者的地下阵营。这个“宣言”谴责了“官僚

政治”的腐败和苏联干涉带来的后果^③。

到1980年，知识分子中这种最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言辞已趋于平息。尽管统一社会党的高级舆论工具加强了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军事威胁的抨击(作为东西方关系全面恶化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都恢复了以前的专业地位。鲁道夫·巴罗在1979年10月大赦获释后，移居联邦德国。1980年，又有两个作家被指控企图在西德出版“敌对宣传品”^④。现在，有时，仍然允许愿意离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移居西德。但是，目前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都避免与政府进行直接的、公开的对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集中力量探索各自专业范围内的自由的界限。

遭到挫折的普通公民

在谈到持不同政见者时，如果不提及一部分无名的普通公民，那是不全面的。这部分普通公民感到，现存政治制度已经变得与他们作起对来了，因此，他们也站到了现存政治制度的对立面。有些东德人努力争取事业上的成就，但是，由于政工“干部”和其他社会当局的专断行为而使他们的希望遭到破灭。西方人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非官方报道。这种与政府的对抗并非偶然，公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

例如，当局可能要求某个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教授协助国家安全部工作，或者，可能要求某一个公民放弃对一个腐败警官的控告。谨慎的公民知道如何采取“合作的”态度。但是，公民们并非总是那么谨慎。结果，他们事业上的抱负破灭了。由此看来，根据大量历史事实，人们面临着抉择：或者屈从命运，或者奋起抗争。而后一种选择可能导致政治上与政府彻底对立，最终导致判刑。

无法确定有多少人选择了这条导致政治对立的前途渺茫的道路。这些人只可能兴起小小的波澜，他们决不会成为西方报刊的头条新闻。根据《国际大赦报告》估计，民主德国有3000至7000

名政治犯^③。1979年10月，有21000多名犯人在大赦中释放；根据西德非政府的“八·一三劳动组织”的说法，其中大约有1500名政治犯。作为由西德政府给予大量经济支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一部分，许多以前的政治犯最终被允许移居联邦德国。

当然，大多数公民决不会达到持不同政见的程度。他们已经学会用极大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来看待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有点自命不凡的抱负。如果特权的不平等分配远远达不到统一社会党的许诺，大多数公民都会找到合适的、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表达挫折的方式。总之，东德人可以看到生活中有大量美好的东西。他们可以注意到，尽管他们的社会进步缓慢，但是确实在进步，而且他们可以自慰的是，某种程度的自夸和虚假，实质上是世界上各国政府的共同特征。

〔注释〕

- ① 《统一社会党新纲领》，《德国文库》，第9卷，第7期（1976年），第761页。
- ② 约亨·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奥普拉登，莱斯克，1981年，第96页。
- ③ 同上，第99页。
- ④ 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英国，西来德，萨克森出版社，1979年，第136—143页。
- ⑤ 引自奥托·莱因霍尔德《根据纲领草案形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统一》1976年，第8期，第287页。
- ⑥ 《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柏林：论坛社，1982年，第43—44页。
- ⑦ 同上，第29页。
- ⑧ 同上，第16页。
- ⑨ 同上，第21页。
- ⑩ 京特尔·埃尔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奥普拉登，西德意志人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 ⑪ 京特尔·埃尔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科隆：西德意志人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
- ⑫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科隆：经济政治出版社，1979年，第115—127页。

⑬ 中央统计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0 年统计年鉴》,柏林:国家出版社,1980 年,第 86 页。

⑭ 关于所有教会的材料都引自《民主德国手册》。第 586—596 页。

⑮ 吉泽拉·黑尔维希,《我们必将高举我们的旗帜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福音教派的现状》,《德国文库》第 14 卷,第 4 期(1981 年),第 345—347 页。

⑯ 卡尔·威廉·弗里克,《在屈从与自主之间》,《德国文库》第 9 卷第 11 期(1976 年),第 1135—1139 页。

⑰ 罗伯特·哈韦曼,《关于社会主义和自由》,《德国文库》,第 9 卷第 8 期(1976 年),第 1105 页。

⑱ 曼弗雷德·耶格尔,《文化政策的终结:以孔策和比尔曼为例》,《德国文库》,第 9 卷,第 12 期(1976 年)第 1233—1235 页。

⑲ 哈拉尔德·克莱因施米德,《在西方发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知识分子的对抗》,《德国文库》,第 10 卷,第 10 期(1977 年),第 1011—1017 页。

⑳ 伊尔莎·施皮特曼,《巴罗事件》,《德国文库》,第 10 卷,第 10 期(1977 年),第 1009—1011 页。

㉑ 曼弗雷德·赫特维希,《对鲁道夫·巴罗的〈抉择: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评〉一书的评论》,《德国文库》,第 10 卷,第 10 期(1977 年),第 1093—1098 页。

㉒ 彼得·本德尔,《插曲还是给昂纳克的警钟?对“明镜宣言”的考察》,《德国文库》,第 11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113—116 页。

㉓ 《“明镜宣言”与民主德国的反应》,《德国文库》,第 11 卷,第 2 期(1978 年),第 199—219 页。

㉔ 哈拉尔德·克莱因施米德,《“错误是必然的”,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80 年下半年的文化政策》,《德国文库》,第 14 卷,第 1 期(1981 年),第 39—44 页。

㉕ 《国际大赦报告,1980 年》伦敦:国际大赦报告社,1980 年,第 269—272 页。

八、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

许多西方人——特别是在军事和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如美国——长期以来，习惯于认为对外关系是和普通政治行为无关的事情。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外交政策可以归纳为一个简单的目标，那就是“保卫自由世界”。由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技术和秘密的情报间谍活动，所以，美国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注意采纳专家的意见，并坚持“两党协商”的原则。但是，大批美国公民卷入越南战争，加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所带来的日益明显的后果，近来给美国人补上小国公民早已上完的一课：对外关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努力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整个社会行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历史背景

没有一个国家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样如此明显地将内政外交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国家，有一点大多数西方人也许无法理解：许多涉及国家的合法性和人民生活方式的事关重大的问题都取决于有些矛盾的对外关系原则的不稳定的平衡。

东德的外交政策必须首先考虑三个前提：（1）强调统一社会党统治的合法性，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2）一旦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发生公开战争，免遭某种程度的毁灭性打击；（3）通过扩大和调整对外贸易，确保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一般说来，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一系列相似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东欧国家——首先是民主德国——的特点，在于世界政治经济结盟给追求基本目标造成两难境地的程

度。

我们可以通过对两个德国的情形加以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至少在建国后的头 20 年，联邦德国能够在美国充当军事、经济和政治盟主的广泛范围内，追求自身的合法地位、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种倾向受军事占领环境的制约，人们的亲美反苏情绪大大促进了这种倾向的形成。尽管在开头发展缓慢，但是，西德采取依附于美国势力范围的态度获得了足够的报偿。由于承认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明显因素，由于实行符合美国投资利益的经济政策，由于开展以美国为模式的政治改革，新生的联邦德国获得了美国外交影响的有力支持。这种支持使联邦德国得以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使它得以借助于美国军队和核武器的威慑力；使它得以获得了某些经济利益，如为援助欧洲工业重建而提供的马歇尔基金；使它的出口商品得以进入广阔的美国市场；使它得以加入从不发达国家到美国的工业盟国的广泛范围的西方原料交换网。

上述依附姿态没有一个意味着联邦德国纯粹成为了美国的“卫星国”，也并不表示波恩政府以某种方式背叛了德国人民的利益；现在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最明显的是，无论如何，美国强大的财力物力允许西德在一个同盟体系中实现其所有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与美国的结盟并未使联邦德国陷入深刻的两难境地，与西德的各个目标并不相违。波恩的早期领导人并没有为了军事安全而不得不牺牲经济利益；并没有为了国际声望而不得不损害在国内的合法地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政府的情形则迥然不同。除了苏联的军事占领对新政府的明显限制作用以外，历史的教训表明，只有尊重俄国人的盟主地位，东德的军事安全才能得到保证。波兰一再为相互竞争的列强所瓜分的悲惨遭遇足以使他们放弃保持瑞士式的中立的奢望。随着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影响的加强，这个结论变得越来越明确了。

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苏联，使他们随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历史上对俄国人的普遍反感，对于战争的后果，反应尤为强烈。早些时候，就有关于苏联虐待国内操德语的少数民族的传说，后来，又有关于红军野蛮对待德国战俘的报道。再者，许多德国人意识到，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俄国人不负责任地毁坏了许多德国城市。纵然是在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苏联军事指挥部的强制占领政策似乎也有些过分。他们将德国的工厂设备拆卸下来，运往苏联，将一些残存工厂的全部产品拨归苏联使用，这种作法带有极大的惩罚性和浪费性。

一般认为，与苏联结盟带来的是明显的牺牲，而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在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看来，与苏联结盟意味着国家安全和国内合法地位之间的交换。另外，与苏联结盟也是为了满足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需要。莫斯科的外交影响只局限在一小部分附属国家，无法与美国抗衡。所以，到1950年，还只有11个国家与民主德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直到1968年，也只达到13个^①。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德国和美国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面前：是选择同哪一个德国（而不是两个）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显然，大多数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更愿意和联邦德国打交道。通过这条途径，波恩政府“代表整个德国说话”的要求得到了国际上的正式承认。

在缺乏广泛的外交承认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在大多数国际论坛上被降到了“苏联占领区”或者“所谓民主德国”的地位。一些西德机构大肆炫耀他们的外交优势。例如，民主德国公民收看西德电视新闻时，看到的是根据1939年的国界线绘制的“德国”气象地图——只当民主德国根本不存在！苏联同盟集团遭受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挫折，是他们在促使民主德国加入国际组织时的无能为力。从1956年开始，东德被允许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只作为西德队的分支扮演不起眼的角色。直到1972年，东德运动员才被最后允许作为一个独立的代表队打着自己的国旗参

加比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它在国民中缺少支持。因此，寻求外部承认成了提高国内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尽管东德领导人没有太多的对策，但是，他们还是对否认他们合法地位的外界势力作出了强烈反响。由于联邦德国在这些努力中最为突出，所以，民主德国政府使用了最有效的武器——控制西德和东柏林之间的联系——以惩罚波恩政府损害民主德国国际地位的行为。有时，他们力求谋取苏联对此的支持。但是，苏联的对策也很有限，而且，苏联的支持也不一定可靠。

如果苏联同盟集团对东德争取合法地位的工作施加反面影响，其经济后果将更加难以预测。当然，恢复时期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工业重建的基础。但是，自1954年以来，民主德国找到了与苏联同盟集团的共同经济利益。特别是，事实证明，苏联是民主德国工业制造部门的可靠的原料和能源供应国。整个60年代，苏联供应的原料和能源一般都低于世界的价格。反过来，苏联为东德的成品开辟了巨大而可靠的市场，尽管东德产品的质量有时不及西方工业国家的同类产品。民主德国与苏联同盟集团其它国家(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贸易关系也大体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只是其规模要小得多。

民主德国作为东欧主要工业中心的稳定地位对于东德经济的发展，对于东德达到东欧国家的最高生活水准，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也需要承担经济学家所说的较高的“机会成本”。就是说，通过长期订货的方式将大部分出口商品交付给苏联和其它东欧伙伴，民主德国失出了在西方市场出售这些商品的机会。在西方市场，这些商品可以换取西方货币。西方货币能够用来加速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反过来，西方的设备和技术能够用来提高东德的工业生产率。实际上，现在，民主德国加入苏联同盟集团的经济一体化体系，既避免了世界市场的竞争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又排除了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可能性。

早在1963年，民主德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就认为，寻求更广泛地参与西方市场经济会获得更多的实利。然而，苏联的优惠条件，加上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阻碍了较大范围的贸易转向。最主要的是，东德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经济势力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可能成为拥有较大国民经济势力的国家手中的政治武器。联邦德国和美国都已经表明，他们希望利用贸易交往作为控制附从的贸易伙伴的手段（苏联也在他自己的同盟体系中使用了类似手段）。尽管民主德国采取了明显的经济措施以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但是，他们不愿意使自己的经济受西方摆布。

因此，与联邦德国不同，民主德国在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时，面临着严重的两难境地。尽管只要与苏联紧密地结成联盟，就能保证国家安全，但是，这种联盟实质上损害了东德内部和外部的合法地位。通过引进现代技术和扩大与资力雄厚的市场的贸易往来，可以最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而这两个方面在美国—西德同盟体系中最容易实现。但是，与这个同盟体系的更密切的联系包含着贸易劣势和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于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军事经济同盟的结合处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对双方都同时吸引，又同时抵制。

2. 社会主义外交政策

统一社会党的官方文件几乎完全根据东德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位置来解释其外交政策。苏联、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蒙古一起代表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同盟”^②。在所有公开言论中，这个与苏联的同盟都作为“伟大的革命成就”，作为“牢不可破的友谊”而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

与苏联结盟是名义上一致的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其目标是保卫和发展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并创造有利于其它国家产生社会主义的条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外交政策决不预示着利用军队侵略别国。诚然，他们认为有必要维持庞大的、现代化的

武装力量，但是，这仅仅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据说，这种野心在美国和联邦德国表现得最为露骨，这两个国家的当权阶层为他们对不发达国家的武装干涉辩护，妄图扑灭为争取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奴役下获得解放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他们看到，更加危险的是西方资本家企图利用经济影响和不言而喻的军事威胁诱使东欧国家走上重新依附于资本主义势力范围的“中立”的道路。换句话说，民主德国和其他苏联同盟集团国家把自己看作是制止战争的因素；他们试图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抵消西方的军事力量。他们预计，在军事对峙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必然在没有武力干涉的条件下和平实现。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主义的军队决不用来传播社会主义，而只是用来保护已经扎根的社会主义。

外界观察家很难理解上述对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官方阐释。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民主德国）的军队和装备部署似乎往往要超出形成世界军事均势的需要。苏联同盟集团追求的是军事优势，而不是简单的平衡。如果要作出较公正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另外的两个因素。第一，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承担着防御外来侵略和维持国内秩序的双重职责。与西欧和北美各国相比，东欧各国政府面临着更加明显的、严重的内部骚乱的威胁。因此，在谈及他们扩充军队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军队具有国内警察的职责——这样，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拥有较多的军队。第二，在争取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苏联同盟集团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影响相对有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苏联同盟集团不仅要依靠军队来保卫国防，而且要依靠军队来弥补对世界事务的经济影响不够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个基本轮廓看来，我们无法找到民主德国和苏联外交政策的明显差别。事实上，民主德国关于外交政策的大量论述连篇累牍地引用苏联的观点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外交政策的一致性起源于基本利益的一致

性，另一方面。显然民主德国通过公开充当苏联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而获得了利益。有理由认为，有时候，莫斯科坚持让它的同盟者公开表明其依附态度，作为交换，同时也作出某些额外的让步。

苏联和东德的外交政策目标并非总是一致。正如埃德温娜·莫尔顿已经充分说明的那样，这两个国家在对待德国的四国共管、东德主权界限以及如何对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往往有分歧^③。在下面叙述民主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时，这些问题都将提到。

3. 华沙条约组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政策是以参加华沙条约组织为转移的^④。在西德加入美国发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后，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建立。8个月后，民主德国正式加入华沙条约组织。这个组织的另外7个成员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61年以后，阿尔巴尼亚不再是实际成员国。）民主德国的这一行动标志着这样一个持续发展时期的结束——在这一时期，苏联一再建议，两个德国在一个全欧防务体系中联合起来。

自此以后，民主德国可以全权处理除涉及柏林问题以外的所有对外关系问题，因为，四国条约规定苏联对柏林负有责任。由于柏林东部事实上已经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这个例外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民主德国的待遇与华沙条约共同防务条款的其它签约国不同，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其它成员国可以自行作出适当的反应，而民主德国的反应程度必须由整个华沙条约组织来决定。这种从属地位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民主德国与其它东欧国家不同，它直到1964年才与苏联签订双边防务条约。直到1967年才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类似的双边条约。随着罗马尼亚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些新的双边条约

的签订构成了东德在柏林问题和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谋取盟国的强有力的支持的一部分。

1972年，东德和罗马尼亚最终签订了一个相当勉强的条约。这个条约只就两国的主要方面达成了协议。东德的国防利益具体体现在它与苏联(1975)、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1977)的双边条约网中。民主德国一再利用统一的华沙条约组织，并作为对西德施加压力和阻止东欧内部其它国家“不承担责任”的行为的工具。这样，民主德国领导人对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和1980—1981年的波兰工会改革进行了最直率的批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拥有大约167000武装部队(陆军116000；空军37000；海军14000)。他们的军队大略是西德的 $\frac{1}{3}$ ③。按照武装部队与总人口的比例，民主德国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排在第5位。1962年，民主德国采取义务兵役制，服役期为18个月——除了罗马尼亚，比所有其它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都短。民主德国的人口约占整个华沙条约组织的4.5%，而它的武装部队只占整个华沙条约组织的3.3%。

如果说民主德国的武装部队数量不大，在质量上却是相当可观的。这支部队的特点是有一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受过优良训练的步兵。民主德国的海军大都配备了较新式的军舰。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民主德国拥有第二大舰队。民主德国的空军部队较少，但也足以保卫国家不受侵犯。

苏联驻军大大有助于民主德国的国防和国内治安④。估计苏联在德国的驻军有380000。(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驻军大约有80000，在匈牙利大约有65000，在波兰大约有40000。)这样，苏联驻军和东德的军队总数略少于西德、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它成员国在联邦德国的军队的总数。但是，如果加上中欧地区的所有军队，华沙条约组织各国在人员和常规武器方面都拥有明显的数量上的优势。苏联军事人员对民主德国的军队实行广泛的控制，与其它盟国不同，民主德国的军队随时都受控于华

沙条约组织最高统帅部。

4. 经济互助委员会

东德努力通过扩大对外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这种努力受到了制约^⑦。经互会是1949年由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建立起来的。1949年至1962年，阿尔巴尼亚是该组织的成员。1950年，民主德国也正式参加这个组织，随后，蒙古于1962年，古巴于1972年，越南于1978年也成为正式成员。南斯拉夫是该组织的非正式成员，这种关系与它同西欧共同市场的关系相类似。北朝鲜、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南也门在该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只是与该组织进行协商。经互会的中心也就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7个国家——基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战后头些年，东德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除了沉重的战争赔偿和苏联想插手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以获取经济利益和加强外交影响以外，美国同盟集团的贸易歧视也引起了贸易关系的突然中止。但是，经过一个最初的动荡阶段以后，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贸易在经济互惠的基础上得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换句话说，目前，与苏联和其它经互会邻邦的高额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意义。

50年代后期，苏联占民主德国总贸易额的一半以上^⑧。1974年，一度下降到30%。现在，苏联在东德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又超过了40%，这个增加额的大部分是苏联石油提价造成的。（1981年，购买苏联石油花费民主德国向苏联出口商品收入的1/3；而1971年，只花掉8%。）这两个国家各自都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苏联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占苏联对外贸易总额的1/6。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民主德国是高技术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苏联是最大的原料供应国。各自都为对方

提供了最需要的东西。

尽管苏联的大部分经济基本上不怎么依赖对外贸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合作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目前，东德从苏联购进大量原料，如无烟煤、焦炭、黑色及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棉花、肉类、植物油脂，它很难找到另外的可靠的原料供应国来替换苏联。同样，民主德国又是苏联许多必需品的的主要供应国，这些必需品包括农业机械、机床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科学仪器、火车、轮船及装卸工具、化学制品和合成纤维。这种伙伴关系的瓦解就意味着对两个国家的贸易和消费的严重打击。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分别是东德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东德与这三个国家的贸易占东德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一多^①。（联邦德国是东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后面将要讨论。）东德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古巴的贸易，尽管也不是微不足道，但是，仅相当于东德总贸易额的约5%。东德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大体上都遵循其与苏联贸易的相似的模式：用工业品交换原料。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交往中，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煤炭和匈牙利的食品的大量进口，同时，从这两个国家进口的汽车和机械产品也慢慢地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合作不同于所有其它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极其相似。每一类型的商品（原料、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农产品），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各自向对方出售同等的数量。这种状况反映了更为精细的劳动分工。同时，为了确保柏林和布拉格都能获得相当的利益，也就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工作。于是，这种合作关系使双方都能够从同一种类型的、可靠的专业分工中获利，从而，带有西方工业国之间强化贸易的特征。

总的看来，经济互助委员会已经越来越使东德大失所望。尽管苏联在1960年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经互会从未超越一

系列相互联系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界线，这些条约只是就有限的产品设计和产品标准化达成协议。这样，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具备的超国家的特性，经互会无一具备。

特别是由于未曾达成专业化生产的协议，民主德国大失所望。这些协议是为了将某些商品限制在拥有较多生产率优势的少数国家生产。这样，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民主德国就要保证增加某些产品的生产量，作为交换，其它国家也要答应不从事竞争性商品的生产，而是签订购买更多的民主德国产品的合同。大体上说，那样民主德国能够通过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其它国家也将通过以比国内自己生产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产品而获得利益。

尽管专业化生产的概念适用于任何经互会国家，但是，最早签订的协议都把专业化生产的特权给予了民主德国或苏联。以罗马尼亚为首的欠发达的经互会国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的协议只会促成现存的发展水平的差别永久化。尽管确实签订了一些有关专业化生产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并不曾导致低效率的生产设备的拆除。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协议对任何经互会成员国的投资决策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由于罗马尼亚的反对，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经互会的合作措施仅仅对“感兴趣的国家”生效。换句话说，各成员国可自行选择自己赞成的一部分条款。这种意见的不一致性，大大妨碍了向有机的一体化迈进的步伐。象国际经济合作银行（1963年）和国际投资银行（1970年）这样的经互会分支机构从来就不曾发挥其潜力，即使最热心的发起国——包括民主德国——也没有完全支付这些机构的最初投资款项。东德不怎么大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苏联总喜欢将国际投资银行的投资主要引向欠发达的经互会成员国，包括古巴和苏联自己的大量不发达地区。

今天，东德政府官员仍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经互会的进一步一体化。然而，东德在一体化方面的大量工作采取的是以新

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相当狭隘的形式。例如，民主德国和波兰签订的几个合作协定涉及的是波兰工人在东德工厂就业的问题和共同利用波罗的海港口的问题，甚至还涉及到联合经营波兰的纺织厂的问题。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签订了一体化的生产协定，包括来自两、三个国家的零部件装配。民主德国和苏联也签订了许多这样的协定。但是，必须强调，这种一体化的程度与西欧共同体或者美国跨国公司所达到的多边一体化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一直采取超越经互会正式组织而安排联合投资工程的方式促进更广泛的相互依存。到目前为止，民主德国一直是除苏联以外的这些工程的主要参与者。这些工程的大部分是用来生产苏联的轧钢产品和开发苏联的能源储藏。1979年建成的奥伦堡天然气管道是其中的最大工程之一。东德和其它东欧投资者都可以保障在将来获得这些工程的产品的一部分。在民主德国的贸易衰退阶段——原料进口价格比成品出口价格上升快——这种联合投资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极好途径。

另一方面，将来分多次支付的一次性资本投资给目前的东德经济造成了额外的负担。特别是工业生产率必须在短期内获得巨大增长。整个70年代，东德的战略一直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促进生产率提高。技术引进的资金来源于向西方扩大商品出口和向联邦德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借贷。简言之，这种策略的成功要求推迟支付大部分西方债务，直到民主德国和苏联的联合投资工程初见成效，以至可以获得低价的原料和能源。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等于是让东欧国家向西方借钱，反过来解决开发苏联自然资源的资金困难。

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某种程度上参与了 this 战略的实施。以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为例，引进西方技术都带来了工业生产率的巨大增长。但是，总的说来，东德最为成功。衡量成功的大小不仅仅依据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生产率增长

速度更快)，而且还要看生产率增长和累计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换句话说，东德通过技术引进所增加的产量的价值几乎等于所借贷款的自然增长的利息；而罗马尼亚，尤其是波兰，由于借贷的利息较高，所要支付的利息大大超出了生产增长的价值。当然，后一种情况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无力支付。现在很清楚，西方债权国显然不愿让波兰这样的国家达到无支付能力的地步。于是，他们采取特殊步骤重新整理这些债务。同时，苏联也害怕它的较小的盟国陷入无支付能力的境地，所以，它也采取步骤减轻波兰的经济压力。

我们知道，只是在波兰发生深刻的社会动乱之后，苏联才开始试图拯救波兰。东德领导人最热切地希望避免这样的内部动乱。实际上，他们正在孤注一掷，他们的经济学家已经准确地测算出现行投资策略和发展的极限。由于在西方银行迅速提高民主德国所欠大笔债务的利息之前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问题变得特别严重了。1981至1982年，民主德国突然缩减西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进口，以勉强转移财政危机，尽管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

5. 其它一体化措施

除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极明显的相互依存，民主德国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以促进与东欧邻邦的一体化。其中最突出的是鼓励人们旅游。自1972年以来，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可以不用签证在这3个国家自由旅行。这样，人们可以享受到西欧人早已享受到的自由流动的权利。于是，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一日游高潮，同时，也带来了始未料及的对餐馆和零售商店的需求。特别是来到民主德国的波兰游客突然搅乱了东德几个城市的消费品供应市场。因而，对每一次可以带出国境的个人购买量进行了限制，并禁止投机性的大批量购买。另外，在1982至1983年波兰危机期间，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还加强了

“临时性”限制。

总的看来，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东德人最喜欢到国外旅行。每 100 人中，每年去国外旅行的达 75 人次^⑩。这些旅行，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两个“兄弟”国家的最优惠的目的地。官方政策鼓励这样的旅行，以作为淡薄德国人的西方中心的传统观念的手段。尽管东德观光者对他们的斯拉夫邻邦的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的邻邦有时也对过多的东德人的流入和东德人的傲慢态度表示不满。加在一起，东德每年有 900 多万人次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而从这些国家来东德的观光者每年大约有 850 万。

学术交流代表了另一种重要的一体化措施。每年大约有 6500 名来自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员在民主德国学习，作为交换，东德也派出同等数量的留学生到这些国家学习。东德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大约有 $\frac{2}{3}$ 是在苏联学习^⑪。广泛的人才交换、学术会议和共同承担科研项目是对互派留学生的补充。此外，工会、友谊协会和青年组织也促进了工作经验的交流和一般旅游活动。

上述各种形式的交往带来的渐进影响是很难估价的。人们可能认为，近 20 年来，无论就国家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言，可以看到的共同的利益都有了相当的增加。在东德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苏联同盟集团所有成员国都有着共同的命运。然而，这种认识并不一定会导致官方文件中所乐观地描述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文化的融合和感情的一致。特别是东德人很能够用冷静的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必要的相互依存。现代多民族国家和多国共同体的历史表明，接近并不一定减少文化交往的障碍；实际上还可能增加障碍。

每当涉及到东德人时，一体化成果的不确定性就特别成了问题。由于相对缺乏国际合法地位，在某些以民族自豪感著称的东德人中，产生了对抗情绪。经济上的成就和体育方面的霸主地位有时被解释为文化上优越于斯拉夫民族的确实证据。同等重要的

是，这些成功也可以用来说明东德人和西德人“一样优异”。

联邦德国经常被作为一个参照标准——有时甚至被作为仿效的榜样——或许是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大家庭更进一步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民主德国的亲东方倾向并非排它性的，无论是对政治领导人还是对人民来说，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一直是休戚相关和相互影响的主要对象。

6. 联邦德国和西柏林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有几个层次，而且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细微的差别，都可以作多种解释。

1949年这两个国家正式产生——可以延伸到1954年正式获得外交事务自主权以前，这种关系是根据条约规定通过四个占领国的官员进行的。尽管各占领区的政治领导人就前途和现状问题表达了最终重新统一的愿望，但是，这些愿望很少具有直接价值。然而，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个德国的领导人都试图把另一个德国描绘成某一个大国的不民主的工具而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都各自提出了作为整个德国新民主制度的基础的改革方案和新宪法。

这一时期，除了有限的、必要的贸易联系，两国人民的来往和通信联系实际上已经中断。但是，柏林的地理环境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问题。柏林座落在民主德国境内，离联邦德国90多英里，而又保持着临时被占领城市的地位。联邦德国通往这个城市的道路在形式上被控制了，但是，这个城市西半部和东半部之间的来往并没有控制。由于东半部渐渐变成了民主德国事实上的首都，这个城市本身成为了大量移民的主要通道。1949年至1961年，有260多万人离开东德，其中大部分途经西柏林^②。这些人中，有的是政治歧视和宗教歧视的受害者；有的是试图摆脱经济困境；另一些人是为了家庭团聚；还有的仅仅是追求事业上的机遇。但是，大量移民是统一社会党的统治缺少合法地位的一个可靠标

志。

由于民主德国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尚未确立合法地位，所以，他们在两个德国的内部舌战中明显处于守势。1957年，由于苏联实际上放弃了重新统一德国的想法，统一社会党的瓦尔特·乌布利希提议成立一个德国联邦，这个联邦由两个德国政府协商组成。因为乌布利希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成果，波恩拒绝了这个建议，并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其意图是为了使统一社会党作为东德人民的合法代表的领导获得正式承认。

为了取得华沙条约国家的全力支持，民主德国于1961年8月果断地封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柏林墙的修建，不仅结束了东德劳动力外流的状况（平均每月有2万多人移居联邦德国），而且对民主德国处理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影响。

尽管西柏林由一个受四国监督的半自治的参议院管理，但是，联邦德国早就跟这个城市建立了广泛政治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就象民主德国控制柏林东半部一样，违反了战后临时条约的原则。由于西柏林的位置和这个城市在呼吁东德公民时的象征性作用，民主德国把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之间的密切联系看作是对东德主权的侵犯。现在，这种联系更加成了责难波恩的口实，因为民主德国开始利用对柏林边界线和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交通的控制作为斗争的手段。

在苏联的明确支持下，民主德国追求的主要外交目标是：民主德国获得国际社会的完全承认和西柏林的正式自主。次要的和有时相互冲突的目标是：发展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确保整个德国为无核区；要求联邦德国明确解决邮政和运输事业的资金问题；支持西德政府的“民主”改革。

在1962年古巴的苏联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和苏联看起来都渴望减少超级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他们首先重点考虑的是柏林和德国的某种程度的“正常化”。所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不

得不放弃他们的虎视眈眈的态度，开始了某种形式的对话。

随着康拉德·阿登纳总理的下台和维利·勃兰特的上台，西德政治发生了变化，一向公认的为全体德国人说话的主张渐渐让位，向东方发动了新的经济攻势。通过对苏联和东欧作出经济上和外交上的让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的明确目标就是削弱华沙条约国对东德关于立即进行德国内部谈判的要求的支持。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 1967 年签订的条约表明，为了从西德获得经济利益，一个社会主义盟国有可能贬低民主德国的外交主张。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改革和改善同联邦德国的贸易关系联系起来，从而，统一社会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在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有效地对同盟集团内部（除罗马尼亚以外）的外交政策实行了调整。但是，作为新的团结的代价，民主德国感到必须作出让步，在两个德国争端的主要问题采取随和的态度。

1969 年 9 月，勃兰特担任总理以后，形势迅速发展。1970 年 8 月，勃兰特和民主德国总理斯特卡在爱尔福特（民主德国）会晤，5 月，又在卡塞尔（西德）会晤。4 月，两国政府签订了临时通邮协定。8 月，苏联与联邦德国签订了一个重要条约（采取了适当的经济引诱）。在西德和波兰的缔约会谈进入最后阶段时，1970 年 11 月，两个德国开始了最高级会谈。

年底，西德政治家坚持主张在西柏林召开主要党的代表大会，从而，又一次引起了民主德国的抗议，并截断了西德和西柏林的交通。1971 年 1 月，东西柏林之间的直接电话在中断十九年之后第一次接通。但是，由于外交注意力转向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新的四国会谈，两个德国的谈判处于停滞状态。显然，对于柏林问题的决议，对于民主德国得到完全的外交承认的要求，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意见不一，这是五月间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辞职的原因之一。

9 月，四国就柏林地位问题签订了一个新的条约，苏联没有

满足东德最早提出的任何这样的条约必须以首先在外交上承认民主德国为前提的要求。这时，民主德国被剥夺了大部分讨价还价的本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又恢复了谈判，并签订了交通条约（1971年12月）、基本原则条约（1972年12月），达成了互派仅次于最高外交大使地位的常驻外交代表的协议（1974年3月）。尽管联邦德国没有抛弃它的为德国人民的最后统一而努力的目标，但是，它确实放弃了代表全体德国人说话的要求。虽然经历了这样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关键性的让步还是带来了全世界对民主德国的接连不断的新的外交承认，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荷兰、卢森堡，1973年5月）的第一次承认和最终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9月）。1973年9月，两个德国都被联合国接受为正式成员国。到1981年，民主德国与13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总的看来，1974年以来，“德国内部”的关系一直保持稳定发展。两个政府的合作范围逐渐扩大，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问题，扩大了东西柏林之间的交往，达成了有关改进水陆交通的联合投资、互派新闻记者和许多其它问题的协议。所有这些协议的最主要的成果是在其它领域残存着大量争端的情况下，打下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最近，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争端分成三个大的方面：苏美双方竞争而引起的问题；直接影响两个德国交往的问题；有关东德的人权和政治稳定的问题。

超级大国的影响

由于两个德国在各自的同盟体系中都起决定性作用，所以，两个德国的关系必然直接反映美苏之间的关系发展过程。有时，柏林的地位问题和德国的其它争端问题本身就是苏美对抗的主要问题，象50年代中期苏联竭力阻挠德国重新武装一样。然而，德国的环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这里比其它东西方热点，如加

勒比海、中东、南亚和西南部非洲要稳定得多。所以，有时，两个德国的关系由于受其它地区的影响而变得比较恶化。大概最引人注目的例证是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柏林加强了军事活动。

近些年来，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和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的连锁反应产生了积极作用，美国对缓和的赞同和苏联想通过赫尔辛基条约使欧洲现状获得承认的决心，有助于消除改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的障碍。

根据目前两个德国交往的复杂结构，某些观察家把责任推到苏联领导人身上，他们认为，基于不一定与苏联利益一致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两个德国有可能发展某种特殊关系。两个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明显希望维持 70 年代的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尽管美国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尽管西方国家联合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尽管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对苏联的军事势力忧虑重重，但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首脑会晤还是安排在 1981 年初。由于双方对于波兰团结工会和政府的冲突存在戒备，埃里希·昂纳克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会晤在两次推延以后，终于于 12 月在波兰宣布军事管制法的前夕举行。在这次会晤中，昂纳克宣称，两个德国的关系将受美国和西德对于削减欧洲核导弹的态度的影响。他还否认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有可能成为“缓和的孤立地区”的说法，以消除苏联的忧虑。

两个德国的直接关系

除了起因于各自同盟集团的纠纷，两个德国还面临着大量的直接争端。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不严格执行关于柏林问题的 1971 年四国条约坦率地表示了不满，他们坚持严格地解释柏林西部“不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并不再由联邦德国管辖”的条款。这样，在西柏林举行的某些政治活动，如西德各政党代表大会，遭到了民主德国的强烈反对。同时，民主德国又尽力实现对柏林

东部的统治的合法化，1981年6月在东柏林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一行为违反了西德对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条约的解释，他们认为，虽然这个条约没有对东柏林作专门说明，但是，作为一个整体，适用于整个柏林。

昂纳克宣称的阻碍关系改善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西德的国籍法。今天，联邦德国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律，把民主德国的所有居民都看成是西德的公民。不足为奇，东德认为这个法律侵犯了东德的国家主权，是波恩拒绝建立完全平等的关系的标志。

两个德国关系的一个较为积极的方面是贸易领域和有关的经济问题。以1951年的柏林商业条约(1960年修改)为基础，东德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一直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⑤。除了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短暂下降，两个德国的贸易一直稳定增长。尽管在东德国内经济困难时期有偶尔的停滞，但是，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一直与民主德国整个贸易增长率齐步前进。10多年来，东德与西德的贸易额一直保持在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仅次于对苏贸易。

虽然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远远超过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按照绝对经济尺度，还大有潜力可挖，民主德国进口大量的煤、有机化学制品、轻工业机械、机床和布料。它向联邦德国出口烟煤、轧钢、塑料、机床，各种家用设备和其它消费品。同时，由西德、民主德国和西柏林构成的三角贸易，对于这个城市的必需品供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与联邦德国的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西柏林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严重降低了这个城市在整个德国内部贸易中的地位。

由于两个德国的经济结构相当类似，因此，两个德国有潜力建立具有相当优势的良好贸易体系和迅速发展大多数主要商品的贸易。但是，两国的贸易额一直受到民主德国僵化的集中管理

体制的限制，受到某些东德产品的较低的市场要求的限制，受到民主德国可兑换货币的长期短缺的限制，受到西德在各类商品中的贸易优势的限制^④。东德一再表明，他们的目标是减少对其“敌对”邻邦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在 60 年代初的“消除骚乱”的运动中表现很明显。然而，从此以后，由于民主德国寻找扩大从联邦德国的进口的途径，这个目标又明显地放弃了。

免除民主德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商品的关税，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个德国的贸易发展。这种优惠起源于共同市场早期对联邦德国的特许，当时认为，两个德国的贸易是一种国内商业。（带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优惠给东德带来的经济利益与他们的一贯主张，即两个德国的关系必须当作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对待发生了矛盾。）另外，联邦德国还向民主德国提供无息贷款，这些贷款相当于每年两个德国贸易总额的 10—14%^⑤。在 1982 年关于恢复无息贷款的谈判中，施密特政府提出了各种政治的和关于人道主义的附加条件。由于其中一些条件没有被民主德国接受，联邦德国在 1985 年底之前，逐渐减少了 30% 的无息贷款。1983 年 3 月，波恩政权转移到了基督教民主党的手中，这就引起了东德对两个德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忧虑。然而，两国的贸易关系继续发展，由于西德银行由联邦政府担保向民主德国提供了 100 万马克的新的贷款（1983 年 6 月），两国贸易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促进^⑥。

人权

两个德国争端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民主德国的政治自由和人权。当然，东德政府往往认为，这些问题是内政问题，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尽管这种观点严格说来是对的，但是，它忽略了这个问题与许多西德人休戚相关的一面，因为，他们关心住在东德的亲友的生活状况。这个最明显的问题涉及到两国公民的私人联系。自 1971 年四国条约和随后两国间的一系列协定签订以

来，发生了许多有利的变化。现在，西柏林市民也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获得了进入民主德国的权利。（实际上，他们比经互会国家的旅游者受的约束要少。）另外，东西柏林之间的电话联系已经恢复，联邦德国和柏林之间的交通管理已经简化，并且在促进家庭团聚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结果，来自西德和西柏林的游客增加了3倍多，1980年，大约达到了800万人^①。

尽管民主德国通过西德货币涌入量的增加在经济上获得了利益，但是，两国公民之间私人联系的扩大也给东德的治安部队增加了负担，同时，抑制了向人们灌输独立的民族特性之基本政治目标。对此，东德官方采取的一个对策是制定法律，禁止处在“敏感”工作岗位上的东德人与“潜在的外国势力”私人接触。由于敏感的工作岗位和潜在的外国势力的含义非常广泛，所以，给大量民主德国公民都带来了麻烦。1981年10月，民主德国还大大提高了旅游者入境兑换货币的最低量。在某种程度上，这项措施是为了减少在西柏林银行按非官方汇率兑换的民主德国马克的流入——这是一种有潜在破坏性的货币投机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有减少一日游观光者的附加作用。（对多日游观光者来说，最低量兑换未必具有限制性，因为其数目少于一般餐宿费。）在联邦德国，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好象是与其它领域里的对话相抵触。

西德人也关心民主德国公民的公民权，他们特别关心那些因持不同政见或者想迁居西方而遭到工作歧视或监禁的人们的公民权。除了正式犯人交换，包括定罪的间谍，联邦德国还以支付现款来换取政治犯的释放。因为民主德国要求保密以作为这项交易继续下去的条件，所以，人们很少知道细节。据非官方消息，这项“赎金”交易每年有10多万马克。这笔令人不快的生意，与柏林墙、铁丝网和沿国界线的雷区一起，代表了目前两个德国关系的恶化的方面。

但是，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现实。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关系的变化可以看作是近十年来东西方关系的最有建设性的发展。历史的错误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已经大部分消除，紧张局势已经缓和，现实人们的福利已经得到改善，两个关键性国家之间的关系网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两个德国远远不只是东西方对抗的绊脚石或对象，它们可能还具有对于欧洲的稳定作出自主贡献的潜力。

7. 欧洲中立国家

民主德国从最初正式行使主权的年代开始，就一直指望欧洲中立国家成为取代业已破坏的贸易格局的工具，并作为对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外交孤立政策的途径^⑩。

虽然芬兰是欧洲第一个与民主德国缔结政府间正式贸易协定的非共产党国家，但是，民主德国与芬兰的贸易从未超出民主德国贸易总额的 0.6%。而且，芬兰接受东德关于建立贸易关系的提议并未发展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前给东德以外交承认。到目前为止，芬兰所不同的仅仅是与民主德国缔结了一个普通条约（1972 年 12 月），同时，获得了贸易最惠国待遇（1976 年 3 月）。

一直注意与西德发展关系的奥地利甚至更为保守。初期，奥地利和东德的贸易发展相当缓慢，而且，仅仅通过半官方渠道。和瑞士、瑞典一样，奥地利是第一批与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正好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签订基本原则条约的那天。随后，奥地利参与了民主德国的联合投资工程，但总的经济卷入的程度相当有限。1980 年 11 月，奥地利成了第一个接待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纳克来访的西方国家。东德当局认为，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双方签订的领事条约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同意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⑪。尽管东德与瑞典、瑞士的贸易在渐渐扩大，但是，东德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相当冷淡。特别是瑞士，还一直要求东德赔偿被这个社会主义接管政权所没收的瑞士财产。

简言之，民主德国已经采取大量外交手段以便与这4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作为其它国家遵循的榜样。就芬兰和奥地利而言，某些目标已经达到。但是，离总的策略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8. 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本

一般说来，所有西方盟国处理与民主德国的关系都与美国和西德亦步亦趋^②。英国和法国（除了很短一段时间，戴高乐采取了独立姿态）都一直是波恩的特别热情的支持者和东德政权的尖锐的批评者。大多数西方国家都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通过半官方渠道渐渐扩大同东德的经济交往；另一方面，又以对任何其它共产党政府都从未采用的严厉言辞谴责东德。现在，英国和法国已经成为民主德国的第九、第十大贸易伙伴，分别占东德贸易的将近2%。荷兰和意大利各占东德贸易的1%以上。

东德和西德签订基本原则条约（1972年12月21日）以后，首先在外交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北约国家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75年8月，加拿大最后承认民主德国。北约国家中，有许多迟迟没有在东柏林设立大使馆，与民主德国签订领事条约的国家几乎没有，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德国国籍限定问题发生争论。对民主德国来说，国籍问题极其重要，因为，它既是一个实际问题，同时又将影响到最终与联邦德国达到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地位。

或许更重要的是，东德渴望迅速发展与工业化的西方的贸易关系，结束关税歧视（如获得最惠国待遇）和取得进口西方工业技术的贷款相当明显，美国已经成为民主德国实施这一基本策略的主要目标，这一点从民主德国小心翼翼地奉承戴维·洛克菲勒和其他著名金融家，从他们选派外贸专家担任美国大使可以看得很清楚。民主德国在增加美国食品购买量和与美国的化工及石化公司签订长期合同方面，已经取得某些成功。1980年，美国将东德列为第十九大贸易伙伴。这一年，迅速增长的粮食进口给民主德国

带来了5.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以后的两年，由于担心美国有可能利用其贸易影响，民主德国大幅度地削减了粮食进口量。

不过，华盛顿仍然拒绝给东德以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要求东德赔偿以东柏林现在管辖的地区逃离法西斯迫害的美籍犹太人的损失，要求赔偿东德所没收的美国的财产。美和国加拿大一样，也迫切要求东德给予希望和北美的亲属团聚的东德人移民权。现在，在家庭团聚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而赔偿的要求一直遭到东德的拒绝。

日本的巨大经济势力使它成为了民主德国的另一个主要贸易目标。尽管这两个国家在1973年中期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当时与日本的贸易仍然不到东德贸易总额的0.03%。1977年11月，东德政治局经济专家京特·米塔格访问东京，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和文化交流协定。从1976年至1979年，东德与日本的贸易增加了8倍。日本在东德投资建立旅馆和化工厂，并为东德购买尖端技术设备提供贷款。1981年5月，昂纳克访问东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不赞同民主德国关于国籍问题的立场，但是，双方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了重要突破^④。

总的看来，东德打入资本主义同盟集团内部的尝试已经产生了综合性的效果。在欧洲，比、荷、卢三国（比列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加上英国、法国，已经成为东德的重要产品供应国，但是，这些国家都坚决拒绝政治上的让步。虽然美国和加拿大也看到了与东德改善关系的明显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最强硬地坚持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日本也许要追求更大的经济灵活性和寻找更多的外交途径，已经相当多地接受了东德的改善关系的建议。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上述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民主德国从西方债权国（包括西德）积聚了800多万美元的不定期的大笔贷款^⑤；另一方面，又确保了西方投资和技术的源源不绝地引进，因为，西方商业界迫使他们的政府保证已经获得的市场。只

要高失业率的阴影伴随着西方经济，东德的计划部门大概就可以指望获得更多的信贷。同时，民主德国正在准备发挥自己的更加积极的市场主动性：1981年的贸易机构调整就是为了鼓励在寻求硬通货销路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④。

9. 中东和北非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得到大约一百个发展中国家的正式承认，但是与这些地区的重要交往相当有限^⑤。而且，民主德国在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别。其中有三类国家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中东和北非。

东德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就象与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一样，紧步苏联的后尘。在苏联扩大了对几个关键性的反以色列（也就是反美）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以后，民主德国也可能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以换取某种国际地位。以埃及为例，这种交往变成了相当稳定的贸易模式和半政府性质的关系。有许多年，埃及是民主德国在不发达世界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虽然政治关系急剧下降，与这个国家的贸易还是排在不发达世界中的第二位。

对于某些政府严厉对待国内共产党组织的行为，东德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就使它得以与整个这个地区发展文化和经济交流。东德人坚持这种态度，终于获得了报酬，1969年中期，伊拉克和叙利亚成了第一批在外交上承认东德的非共产党国家。最近，除了支持苏联的战略意图，民主德国一直寻求扩大出口市场，寻求可供选择的石油资源。由于苏联已经表明无法保证东德的石油消耗，现在，从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进口的石油占民主德国石油进口量的大约10%^⑥。东德也从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购买少量石油，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愿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显然，他们更愿意外交自主和加强与西欧的经济联系。

10. 第三世界独立国家

对于较小国家来说，应该考虑到维持对外经济关系的管理成本。所以，民主德国并不选择追求一切贸易伙伴，而是集中力量于那些在近期内有最大的贸易发展潜力的国家^②。这样的国家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2）以现代生产技术和广泛的交通、通信网为前提的不断发展的经济；（3）足以吸收耐久消费品的大量的中等收入阶层；（4）具有出口食品、原料和半成品的能力；（5）愿意表示某种程度地脱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治经济独立。

50年代后期以来，印度成为了这类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民主德国和苏联同盟集团其它国家一道，渐渐建立了与这个南亚大国实行互惠贸易的基础。60年代，巴西也希望贸易关系多样化，这一步骤正好与民主德国第一个贸易发展基本纲要相一致。现在，巴西和印度是东德在第三世界的第三和第五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个国家一起占东德贸易总额的0.8%。有一些年，东德通过出售车辆、机械和化肥，能够确保贸易平衡和必要的货币回笼。

70年代，其它成功了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愿意与东德交往，一半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一半是由于民主德国结束了外交上的孤立而带来的反响。阿根廷、秘鲁和哥伦比亚都与民主德国建立了一定的贸易关系。1981年9月，墨西哥邀请昂纳克访问，双方表示，要巩固和发展友谊，共同反对军备竞赛，并展望了双方贸易的光辉前景——以东德在墨西哥的农业中投资，墨西哥尽可能在东德的石油冶炼业中投资为特色^③。

上述与第三世界“独立国家”的关系发展决不意味着有任何争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胜利的政治意图。实际上，东德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极端实用主义的。民主德国出访的政府官员和宣传媒介一方面高度评价这些国家的每一点“进步的”社会政策；另一方

面，对于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剥削和对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严重依附，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11. 贫困的非洲

民主德国在考虑对外关系时，经济利益并不总是起决定性作用^②。虽然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东德还是参与了苏联在南部非洲和西印度洋导演的战略性上的和意识形态的攻势^③。

苏联和苏丹和索马里遭到不幸以后，民主德国加强了对埃塞俄比亚和也门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技术援助。这两个国家地处红海入口处，为印度洋航行提供港口。尤其是也门，在某种程度上列入了民主德国的专门援助计划。上千名东德人在那里训练警察和军队、经营旅馆、设计和实施农业工程。民主德国对也门的政治渗透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东德顾问甚至要求参与修改也门的1979年宪法。

再往南，民主德国与两个先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发展了友好关系。这两个国家和赞比亚一起，形成一条分割带，将非洲南半部分割开来。苏联、古巴和东德对这个地区提供系统的援助：苏联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古巴提供军事技术人员；民主德国再集中力量为这几个国家的管理和经济打基础。

上述两组国家都可能被作为战略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桥头堡”。这几个国家都充当苏联同盟集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链环的保护色，这比得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为装饰品。对民主德国来说、这些广泛的作用所带来的利益主要是象征性的。毕竟，承担这些义务是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的明确证据。因为也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四个国家平均起来，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80美元，他们几乎没有经济支付能力。东德向这几个国家提供的商品和建设项目都是采用长期的、低利率的贷款来支付的，这些贷款也许永远无法偿还。这几个国家的能源和矿物资

源本来就不多，况且，由于频繁的社会政治动乱，根本没有得到系统的开发。

12. 小结

最近1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外交孤立期的终结并没有带来统一社会党国内合法地位的明显提高，但是，大大促进了与外国政府和商业界的广泛联系，扩大了与在经济上值得注意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改善了西方信贷和技术的引进方式。与联邦德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并没有充分满足民主德国的完全平等的要求，实际上，这些协定使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更加激化了。在某种意义上，两个德国的现有关系可以确保因为国家分裂而受到影响的家庭保持良好联系。但是，随之而来的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特殊性的干涉导致了对某些公民自由的进一步限制。或许最重要的是，两个德国之间对话对偶尔加剧的苏美紧张气氛起了缓和作用——从而，成了一种附加的防务手段。

如果说东德的外交政策利益通常是对苏联的补充，那么，东德义务维持苏联在古巴、越南、东非和南非这样一些陷得很深的地区的利益就可能构成令人不快的负担——因为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和外交利益可图。这些海外冒险活动，加上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是民主德国加入苏联同盟集团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注释〕

① 彼得·C·卢兹等：《民主德国手册》第2版，科伦：政治经济出版社，1979年，第286页。

② 《统一社会党新纲领》，《德国文库》，第9卷，第7期（1976年），第747页。

③ 埃德温娜·莫尔顿：《东德和华沙同盟集团：缓和政治学》，科罗拉多，博尔德：西方评论出版社，1978年。

④ 这一部分材料出处同上；参见格哈德·未蒂格：《苏联、民主德国与德国问题：1965—1976》，斯图加特，博恩·阿坎图尔，1976年。

- ⑤ 《军事平衡，1983—1984》，伦敦：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1983年，第21页。
- ⑥ 同上，第16页。
- ⑦ 约亨·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奥普拉登，莱斯克，1981年，第167—178页。
- ⑧ 多丽丝·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英国，西米德，萨克森出版社，1979年，第244—245页；玛丽亚·亨德克—霍佩，《民主德国对外贸易新构想》，《德国文库》，第16卷第4期（1983年），第378—385页。
- ⑨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45—248页；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第173—178页。
- ⑩ 中央统计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柏林：国家出版社，1980年，第329页。
- ⑪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0年统计年鉴》，纽约：联合国统计局，1981年，第511—531页。
- ⑫ 《民主德国手册》，第400—401页。
- ⑬ 科内尔森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手册》，第249—256页；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第161—165页。
- ⑭ 霍斯特·兰布雷希特，《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见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编《民主德国外交政策三十年》，慕尼黑：奥尔登堡，1979年，第453—472页。
- ⑮ 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第161—162页。
- ⑯ 伊尔莎·施皮特曼，《百万信贷》，见《德国文库》第16卷第8期（1983年），第785—788页。
- ⑰ 彼得·约亨·温特斯：《两个德国的关系，1981》，《德国文库》第14卷第12期（1981年），第1133—1236页。
- ⑱ 贸易数据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第235页推算。
- ⑲ 哈拉德·克莱因施米德，《大桥与小桥，关于昂纳克访问奥地利》，《德国文库》第13卷第12期（1980年），第1236—1239页。
- ⑳ 贸易数据根据《民主德国统计年鉴，1980》第235页推算。
- ㉑ 约翰内斯·库佩，《昂纳克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德国文库》第14卷第7期（1981年），第673—679页。
- ㉒ 贝特克哈根等，《民主德国和东欧》，第309页。
- ㉓ 玛丽亚·亨德克·霍佩，《民主德国对外贸易机构的变化》，《德国文库》第14卷第4期（1981年），第378—384页。
- ㉔ 贸易数据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第235页推算。
- ㉕ 玛丽亚·亨德克·霍佩，《民主德国对外贸易新构想》，见《德国文库》第16卷第4期（1983年），第380页。
- ㉖ 贸易数据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第235页推算。
- ㉗ 约翰内斯·库佩，《关于昂纳克对墨西哥的国事访问》，《德国文库》第14卷

第10期(1981年),第1022—1026页。

② 贸易数据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80年统计年鉴》第235页推算。

③ 迈克尔·索德罗,《民主德国和第三世界:哀求者和代理人》,载迈克尔·雷多,编《东欧与第三世界》,纽约:普雷格,1981年,第106—140页。

九、结 论

在某种意义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把自己看成是评价共产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的标本。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和亚洲的其它大多数共产党政权都是在传统的、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国度中进行的“工人革命”，这些革命给人以虚假的外表，所达到的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目标。与这些国家相比，东德拥有许多与比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相符的经济社会前提：主要是坚实的城市工业基础和一支庞大的、熟练的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当然，所缺少的是广泛的民族特征和一个拥有基本主权的政府。而这两点在马克思的浪漫主义设想中都没有突出提到。

我是通过观察下列四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来全面探索东德的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1）东德历史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准则和社会财富遗产；（2）苏联渗透程度，在渗透过程中，莫斯科的安全需要和意识形态目标塑造的东德国家机构和内外政策；（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采用，为经济变革提供帮助，也带来缺点；（4）城市工业集中带来了人类、自然和国际相互依存新模式，也出现了新的生态问题。

在评价东德的各项成就和缺陷时，人们总喜欢将某些成就归功于上述一个或几个因素，而将缺陷归咎于另一些因素。当然，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倾向于把东德生活中的所有“积极”方面都归功于德国的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进步。而“消极”方面自然就归咎于苏联的存在和社会主义的约束。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方法论上的三个关键性障碍。第一，任何将民主德国的变化区分为积极和消极方面的人，都假定自己

的评价标准带有普遍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普遍性的评价标准。尽管西方文化传统，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准则体系，都把个人自由、社会平等和物质丰富这一类目标摆在首位，但是，关于这些价值准则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最佳分布以及对各个社会目标之间的不一致性的推测程度——必要的权衡——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第二，无论是对于苏联的渗透，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要想分别单独作出结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个因素都不是单独起作用。不仅东德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影响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而且，二者对东德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作用还受东德大量其它环境变化的制约。换句话说，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还是关于苏联渗透的特定结论都没有一成之见。在民主德国历史的每一阶段，这两方面的影响对于应付外部势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具体的意义。例如，苏联诱导的东德政治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应该与西方国家的敌意表示和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的内部分裂联系起来理解。同样，如果不承认西方贸易歧视政策的影响，就很难理解东德在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

最后，要确定民主德国是真正代表了德国的传统，还是对过去的某种背离，没有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对照物”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只有民主德国能够和另一个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实例(对照物)比较时，外界影响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到衡量。这种观点在有些社会科学家看来，也许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西方作者往往绝对地——同时也是错误地——主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该作为这样一个对照标准。因为它一直是沿着一条更为“自然的”德国道路发展起来的。我的观点很简单，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达到目前各自的发展阶段，都包含了大量外部因素的作用。而且，第八章已经提到，这种外部因素的不同作用使联邦德国明显地占了优势。

1、社会进步和民族特性

在谈到有关方法论的几点看法以后，仍然需要对上述四种因素各自在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反映作一概括，以作为本书的结束。

德国的传统

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大量经济遗产和人口遗产，民主德国还体现了许多被认为是典型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德国特征。首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大地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个人主义意识和广泛的进取精神。由于重新调整了改变社会地位的途经（特别是人人都有了接受教育和改进工作能力的可能性），许多人跃跃欲试——主要是追求较多的物质报酬。这个过程导致了人们生活机遇的真正改变，同时，也导致了人口素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明显改善。同时，对于社会地位的外部标志，如官衔、文凭的常规性调整，导致大多数人开拓前进以实现晋升并获取上述外部标志的抱负。换一句话说，人们努力循着前进的法则而前进，不存在人民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波动。

东德的另一个特征是对文化艺术的持续欣赏，这反映在人们广泛参加政府支持的振兴表演艺术、绘画艺术和文学艺术的活动。再者这种对文化的特别依恋是和一种过分自信的民族主义和偶尔表露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长期形成的德国的民族性在面临苏联文化的侵蚀和“西方”实利主义的渗透时得到了加强。东德人对民族艺术的相当普遍的注意，进一步表明了他们要证实这种所谓的优越感的愿望。

最后，德国的传统留给东德人的是对俄国人和其它斯拉夫人的很少掩饰的轻视，同时，这种传统还导致东德人固执地以工业化西方的水平来衡量国内的成就，当然，首先是以联邦德国为参照标准。

苏联的渗透

苏联的军事政治影响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东德的政治结构都详细模仿苏联。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的缩影。除了名义上的立法机构的组成有微小例外，民主德国的政府机构完全是苏联的翻版。大体上，民主德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由相当狭小的集权制到政治局指导下的稍微广泛的专家群领导——也重复了苏联的类似经验。诚然，60年代瓦尔特·乌布利希统治期间，曾经显示了不完全与苏联模式一致的思想革新和经济改革因素，但是，这些有限的偏离随后又被纠正过来了。

东德不可避免地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带来了经济上的广泛的相互依存，东德从这种相互依存中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而付出的代价是明显的。再者，外交上的依附严重地约束了民主德国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苏联驻军有助于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但是，为此付出了经济上的极大代价，牺牲了国内合法地位。近年来，与苏联结盟又导致东德拿出相当多的物力财力支持经济上处于困境、政治上脆弱的非洲政权。

最后，苏联的无所不在为东德人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把子。几乎所有不顺心的事情，从消费品的短缺到高价汽油，从“浪费的”对外援助到统一社会党宣传喉舌的单调枯燥，都可以归咎于苏联的干预。

社会主义

东德社会主义，实质是用中央计划和国家所有代替市场资本主义机制，这样，大大改变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状况。最明显的是，这种社会主义减少了经济上的最上层和最下层之间的收入差别。同时，这种社会主义也有助于消灭财产积累所起的维持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在东德，家庭出身仍然可以提供勉强的文化优势，

可以提供有用的社会关系。然而,对成功尺度,如学校成绩和其它就业文凭的一致强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以往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的平等机会。

虽然依旧保持收入差别以刺激事业上的进取,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工资能够确保所有公民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普遍的食品和住房的低价格可以保证老年人和其他低工资家庭维持最低限度的安逸生活。尽管东德把繁重的经济负担加在有限的劳动力身上,但是,他们各式各样的教育基金、健康保险、娱乐疗养和对各个家庭的渐进支持计划完全可以和西方富裕国家的大多数社会政策比美。

同时,用来贯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庞大的、往往是专断的管理机构,又以低效率和对群众的需要反应迟钝而闻名。在东德,住房面积严重短缺,工业生产无法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薄弱的财政基础妨碍了国家投资,极不方便的、重复的交通网导致了交通拥挤和劳动的浪费。东德的经济在持续增长,东德的生活水平在苏联同盟集团中仍然名列前茅,但是,东德国民经济潜力的完全发挥有待于采取新的措施,允许更加合理的价格计算,对不断起伏的全球经济的需求作出更加灵活的反应。

城市工业生态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东德的整个社会政策是为了减轻在一个现代的、相互依存的社会中生活的经济负担而制定的。然而,象众多的西方“后工业”社会一样,东德也正面临着出乎预料的现代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后果。人口的不断集中,加上工业生产的过量发展,以噪音、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形式对人类健康产生了威胁。积聚物质财富的压力和强调事业上的进取,日益要求个人和家庭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和娱乐机会以达到心理和体力的恢复。在一个如此一贯忽视住宅投资和其它不直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设备的投资的国家,这一点很难达到。

而且，城市工业生活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就普遍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人们愿意孩子少些，偏爱核心家庭，这意味着劳动力减少，也意味着需要改变住宅和娱乐设施的分配。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对信息媒介的越来越多的注意，导致了公民用更加苛刻的标准评价政府的政绩，要求更多的物质利益、更多的参政途径、更加严格地坚持法律原则和社会平等原则。

2. 今日东德的特性

相当明显，今天的东德生活是受上述四种主要因素影响的奇异的混合物。民主德国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同时也是受苏联渗透的混合体。这四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与另外几个因素发生冲突，有时候，还很激烈。而且，每一种因素都包含着自身所固有的矛盾。那么，不足为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真正特性令人不可思议。

长期住在民主德国的西方记者和其他人士报道说，大多数公民对于民族特性问题都善于思考和表达。大多数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长处和短处都有相当的认识，对于外部世界都有明智的理解。有些人愤愤不平、玩世不恭，少数人甚至与现存政权明显对立。许多人自称不关心一切政治问题，他们只注意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获得更多的报酬和个人的业余追求。另一些人，通常是年轻的成年人，他们坚持乐观主义地看问题，他们相信——因为他们毕竟是德国人——一定存在某种方法使他们的制度得以向前发展。